目 次

武夷文化研究

传统与现代建盏的审美文化探析
…… 李修贤，汪晓东（1）
当代视域下的闽北民间舞蹈创新发展
…… 姚明君，潘舒娴（7）

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 张 娴（12）
习近平关于美好生活重要论述的生态向度
…… 任 静（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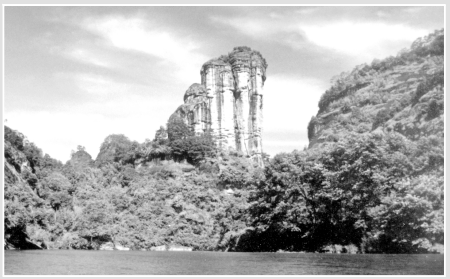
旅游·经济研究

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综述及启示
…… 李泓沄，万 泉，徐 洪，王兰兰（23）
森林康养背景下三明市体育旅游的成效、困境与优化路径
…… 张凌阁，马荣超（31）
企业内员工沉默与组织承诺的关系 …… 林思荻（36）

语言·文学研究

官方媒体话语中新冠疫情报道的篇际互文策略
…… 杨 欣（41）
清高宗禁毁钱谦益著述续考 …… 翁 晖（46）
“霸朝”的史诗：《北史演义》叙事中心的选择
…… 江恺杰（51）
伪本如何进入经典——《四部丛刊》影印缪氏抄本《慎子》
始末 …… 李 艳（58）

武夷学院学报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4-210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5-1293/G4
第 41 卷 第 10 期 总第 216 期
2022 年 10 月（月刊）

编辑委员会

顾 问：付贤智 黄汉升 兰思仁 杨江帆 李宝银
主 任：吴承祯
副 主 任：郑细鸣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道明 刘卫群 任宇红 许亦善 李宝银 李远华 吴承祯 陈 铎 沈慧芳 杨 昇 张品端 张志雄 张乔根 张国林 郑细鸣 姜景莲 姚进生 赵升云 郭翠莲 梁丽萍 雷能忠 廖 斌

编 辑 部

主 编：吴承祯
副 主 编：郑细鸣 沈慧芳 陈 果
责任编辑：叶丽娜 白 琳 魏 琛 聂传朋 白 晔 黄 超
英文审译：魏景春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武夷学院学报

2022年第10期 (总第216期)

目次

CONTENTS

艺术研究

用西洋乐器讲燕赵故事
——钢琴版《燕赵故事》的演奏分析 …… 张雅婷（65）
浅议工业产品互动参与式设计及应用的新途径
…… 陈建伟，黎江能（70）

高等教育研究

高校文科类课程翻转课堂适用性的实证研究
…… 陈翠微（74）
混合式对分课堂教学法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 …… 赵海荣（80）
大学生金融素养现状调查及路径探究 …… 张　佳（85）
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及路径分析
…… 利亚欣，陈　萍（93）
高校基层党组织创建标杆院系的实践和成效
——以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党总支为例
…… 郑雪琴（100）
关于高校保卫处改为安全处职能转变的思考
…… 潘志光（106）

期刊基本参数：CN 35-1293/G4*1982*M*A4*109*ZH*P*¥8.00*600*19*2022-10

传统与现代建盏的审美文化探析

李修贤，汪晓东

（集美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建盏是产自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的黑釉瓷茶盏，从社会影响、工艺美学、思想理念三个角度来探究建盏审美文化的形成原因，以及传统建盏发展至现代建盏过程中的审美文化有哪些相同和变化发展的特点。唐宋时期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大交流使传统建盏工艺开始萌芽，宋代斗茶文化和现代的茶文化习俗更是直接提高了建盏的实用性社会价值。陶瓷工艺的发展赋予了建盏充满意境的釉色斑纹；时代美学的特征构成了建盏极简的风格；宋代理学的自然观成为建盏审美文化的内核。探究建盏审美文化形成和衍变有助于指明建盏文化的未来发展道路。

关键词：建盏；传统；现代；审美文化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01-06

建盏是现代对建窑黑釉瓷茶盏的词称，可划分为传统建盏和现代建盏。现代建盏主要指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域内的黑釉瓷盏，而传统建盏包括整个南方地区的黑釉瓷茶盏，传统建盏只是黑瓷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建阳区的建窑黑釉瓷是现代建窑建盏的前身，但是追溯现代建盏的传统历史和文化就离不开整个南方地区的黑釉瓷系。唐宋时期，建盏作为手工艺制作的饮茶器具，具有一定的社会实用价值，延承了古代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凝聚了唐宋两代的审美文化影响。古代建盏的审美文化又沿着时代的脉络融入现代建盏，现代建盏的审美文化透露着新时代的审美文化特征。审美文化依赖人类和社会而产生，并反作用于人类和社会，推动其发展。建盏的审美文化最能体现人为了创造、欣赏美好事物并进行视觉改造的意识活动过程，建盏审美文化与社会环境形成了互相牵引的关系。

一、社会环境奠定建盏审美文化

唐宋的社会环境奠定了传统建盏的审美文化，传统建盏的审美文化发展至今成为现代建盏的审美文化基调。古今建盏审美文化有赖于开放、交流的社会环境和艺术文化氛围，唐朝盛世的局面为陶瓷工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唐宋两代都属于“开放国家”，积极地与他国进行经济、政治和艺术文化的交流，宋代经济的发展和斗茶文化的氛围让宋代建盏登上时代工艺类别里的顶峰。

（一）开放包容的社会和建盏文化传播

唐朝伴随着合理的政治管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文化的繁荣和财力的雄厚给予了工艺和文化最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形成了包罗万象的社会风气。唐朝常常以金碧辉煌的工艺审美来彰显国家的实力，黑釉瓷虽不如其他五彩斑斓的瓷器受欢迎，但是因为开放包容的社会大环境，也有不少唐朝人能够体会和欣赏到黑釉瓷的艺术审美，因此唐代烧制黑釉瓷的窑口并不在少数。据调查，在陕西、河南和山东三个省的七个县发现了唐代烧黑瓷的窑址，以河南为

收稿日期：2022-06-21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21B177）。

作者简介：李修贤（1997-），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艺术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研究。

通讯作者：汪晓东（1973-），男，汉族，教授，主要从事艺术设计学环境设计研究。

多,有五处瓷窑发现黑瓷[1]。唐朝的开放包容体现在与他国的海外交流当中,唐朝允许日本、南诏、波斯等国家来唐学习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传统建盏对日本的陶瓷文化和审美产生极大的影响,日本称我国传入的黑釉瓷茶盏为“唐物天目”,日本自己烧制的茶盏则称为“和物天目”。传统建盏的审美文化传播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朝的海上贸易交流在唐朝的基础上快速发展。

对比唐宋两个时期的传统建盏交流传播,现代建盏的审美文化传播也受到新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除了开放包容,新时代社会环境还呈现多元化、易变化的特点。无论是唐宋的传统建盏还是现代建盏,其审美和文化的广泛传播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但是现代建盏作为商品传播的属性和当代传播手段却不同于古代,因为当代消费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建盏作为传统手工艺的商品属性愈发凸显, 现代建盏远销海外, 可见现代建盏主要作为商品销售达到传播的目的。对比古代以海上运输为主要传播途径,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使现代建盏的传播手段受到互联网环境的影响,网络店铺、网络商城成为现代建盏传播至世界各地的主要途径。

(二)茶文化与建盏文化的关系

真正赋予茶“文化”意义的时期是在唐朝,唐朝因为佛教思想的兴起,寺庙和寺院开始层出不穷,在各寺之间形成了一种茶道文化,唐代茶道文化以煎茶(图 1)为主要饮茶方法,唐代的茶道为宋代的斗茶奠定了茶文化的社会氛围,这种茶文化风俗自然而然延续到了宋代。

图 1 煎茶《楼集·两宋茶事》

Fig.1 Fried tea “Lou Ji·Tea in the Song Dynasty”

宋代点茶预将茶末调膏于盏中,然后用滚水冲点[2],宋代的点茶使饮茶方式更具娱乐性和观赏性,人们逐渐在点茶过程中产生比斗和竞赛。因为斗茶活动需要多人参与和众人观赏,同样热衷点茶、斗茶的北宋皇帝宋徽宗绘制的《文会图》(图 2)中,可以看出多人参与茶活动的图景,斗茶活动最终演变成宋代上至朝堂下至百姓都参与其中的斗茶文化。斗茶活动对茶盏器具的大量需求, 促进了宋代传统建盏的快速发展,因为传统建盏呈黑釉色能够在视觉效果上最大程度地承托出点茶的“白茶”(图 3),同时传统建盏口大足沉的实用性便于点茶过程的操作。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建窑窑口所产的建盏,因为较好的烧制工艺和釉色斑纹成为当时宋代的“供御”建盏。斗茶活动和建盏的兴盛使得宋代沉浸在茶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宋人更是将茶带入到聚会和宴请中,茶文化也逐渐成为一种茶礼仪,茶礼的传统观念也一直延续至今。

图 2 《文会图》(局部)北宋宋徽宗

Fig.2 “Wen Hui Tu” (part) Song Huizo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图 3 白茶与建盏黑釉内壁

Fig.3 White tea and Jianzhan black glaze inner wall

现代茶文化不再具有点茶、斗茶这样形式化的茶活动,没有了斗茶文化和浓白的茶汤,现代建盏的实用功能被大大削弱, 人们会优先选择更加轻便小巧、易把持和偏白净的茶具来饮茶。现代建盏作为一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其工艺制作审美性才是主要特性。现代虽然没有了斗茶活动,但是传统点茶文化并没有消失匿迹,现代点茶文化常常以传统文化表演的形式呈现(图 4),现代建盏在点茶表演中也兼具了实用性和审美性。

图 4 现代点茶表演(点茶协会和作者拍摄)

Fig.4 Modern tea ordering performance (by the tea ordering Association and the author)

二、建盏工艺和美学中的审美文化表现

每一种类陶瓷的制作工艺都离不开陶瓷原始的工艺开端,建盏的工艺中也包含着陶瓷工艺的发展和演变。不同的建盏烧制工艺决定了建盏的不同审美文化表现,传统柴烧工艺的传统建盏表现为古朴的审美文化,现代电烧技术产生的现代建盏则表现为丰富的审美文化。除了人为工艺制作,人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念也决定了建盏的审美文化,“简”“意”两字就很好的诠释了建盏的美学体现,具体表现为“素简”和“意境”。

(一)陶瓷工艺与建盏

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建盏偏属于瓷器类,但是陶器才是建盏工艺真正的基础,因为陶器是中国古代陶瓷工艺的开端, 也是人类造物文明和审美意识的源起,瓷器是陶器造物基础上的工艺进步。建盏以陶器的工艺作为自己盏体的器物塑形,也俗称为建盏的盏胚,盏胚原料采集自建阳区域的高铁红矿粘土,胚体呈棕红色(图 5)。建盏之所以偏向瓷器类别是因为其施釉覆盖了盏胚三分之二, 烧制出窑后外表裹着釉瓷,釉瓷因窑变的化学反应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釉色斑纹,其精致独特的烧制工艺和出众的视觉变化效果让建盏在瓷器中占有一席之地。

图 5 建盏泥胚和盏胚

Fig.5 Jianzhan mud embryo and calyx embryo

陶瓷烧制工艺是影响建盏最终审美文化表现的重要因素,传统建盏和现代建盏的工艺制作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也导致了传统建盏和现代建盏釉色斑纹的审美艺术不同(图 6)。传统建盏的烧制工艺技术是龙窑柴烧(图 7)。龙窑柴烧是天然的烧制工艺,其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虽然技术受限,但是其烧成操作不止是技术或技巧,而算得上是一种高超的艺术[3]。在宋代,建盏手工匠人只能依靠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来不断摸索黑釉瓷盏工艺,再加上龙窑柴烧的自然因素变化,宋代的建盏颜色为大面积的单色,其中以黑色为主,釉色斑纹基本不显现,审美特性表现为古朴素雅、简洁纯净。现代人的建盏审美追求为独特、精致和视觉效果强烈的斑纹,现代建盏手工匠人利用现代革新的技术对建盏的烧制工艺做出了进一步的创新,广泛应用了电烧技术。电烧技术(图 8)就是现代建盏的创新工艺和主要烧制手法,因为可控温度和操作方便,所以电烧建盏的釉色斑纹十分出彩,最重要的是能够减少废盏,提高成品率,而且成本比柴烧要低许多。

图 6 传统柴烧建盏和现代电烧建盏的对比图

Fig.6 Comparison diagram of traditional wood burning lamps and modern electric burning lamps

图 7　龙窑柴烧

Fig.7　Chai kiln

图 8　电烧技术

Fig.8　Electric kiln technology

(二)“简”与“意”的建盏美学

建盏的美学中心是“简”与“意”的交叉结合,“简”是建盏的简约表现,“意”是建盏的意境氛围。传统建盏的美学风格在宋代就已经形成,也在宋代得到了极致的发展。“简约主义”提倡摒弃华丽、繁复与浮夸风格,主张剔除琐碎或多余的装饰,以简单、朴素、实用为原则,切合实际需要和反映个性,和宋代建盏以“简”为美的风格如出一辙[4]。以“简”看盏型,建盏传承下来的四大传统盏型是:束口盏、敛口盏、撇口盏和敞口盏,建盏的器型没有过度弯曲和起伏外形,建盏器型的外轮廓中规中矩(图 9),四大传统建盏的器型以简约流畅的审美风格流传至今,也成为现代最受欢迎的盏型。现代关于建盏器型的创新设计层出不穷,现代建盏的器型设计依然秉承“简”的美学原理,简约而不简单,体现了现代建盏古朴厚稳、典雅大方的美学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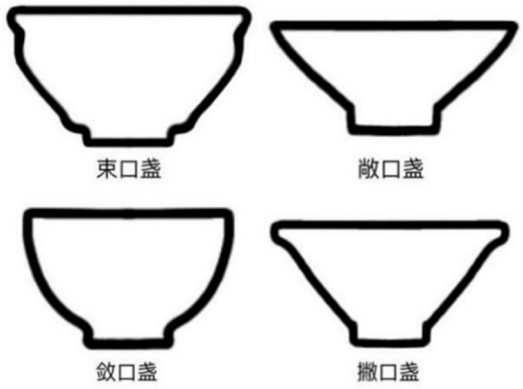


图 9　四大传统建盏器型外轮廓

Fig.9　The outline of four traditional Jianzhan's builders

建盏的“意”可以表达为意境美学,主要体现在建盏的釉色和斑纹当中。建盏的釉色斑纹也表现为简洁自然的美学特征,但是仅仅用“简”来表达建盏的釉色斑纹是十分浅显的。建盏的釉色大多以透亮的黑色为底色,不可预知的多样斑纹和建盏的釉色,构成了一幅幅有意境的图画。古代的人们将大自然中的万物与斑纹的图案相联接,以此来命名建盏。曜变盏的斑纹似太阳的光晕;兔毫盏千丝万缕的针状斑纹似兔子的毫毛;油滴盏大小不一的圆润透亮斑纹似水面上的油滴(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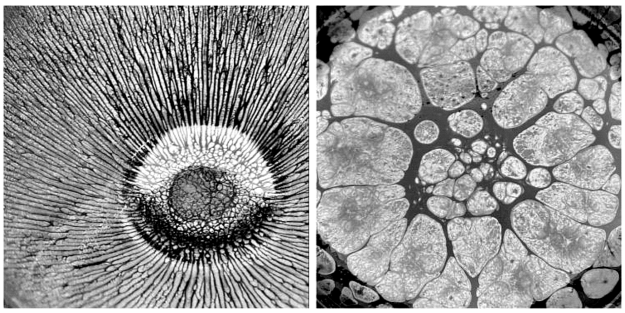


图 10　兔毫斑纹和油滴斑纹

Fig.10　Rabbit hair stripes and oil drop stripes

传统建盏的斑纹视觉虽然因为烧制技术限制而不明显,但是这种似有似无的斑纹潜藏在建盏的釉色中,也不失为意境中的一种内涵美学体现,现代建盏的釉色斑纹没有了传统建盏中内敛的意境风格,而呈现出一种精致天然的意境。无论是传统建盏还是现代建盏,其釉色斑纹的形成都是不可完全人工控制和预测改变,建盏的器型也没有像其他陶瓷有过多的附加装饰,在宋代追求自然、潇洒的生活和时代环境下,也造就了建盏的美学以“简”“意”为审美表现风格。

三、理学思想铸就建盏审美文化

中国每个古朝代社会都有一个哲学思想作为国家的意识支撑,哲学思想为人们指出用什么样的角度和方向来看待世界万物,同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建盏在宋代作为手工艺制品,自然而然也受到当时朝代的理学思想氛围影响。理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在宋代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和潇洒寻乐的生活氛围下,理学逐渐成为宋代的哲学思想中心,理学思想也反作用影响着宋代社会和宋代的审美与艺术。

(一)理学"心性"对建盏审美的影响

宋代的人民甚至君王都主张享乐主义,是晚唐动荡不安和北宋开朝的战争为宋人内心向往自由随性的生活奠定了基础,理学的心性学说也成为宋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理学中的心性学说由古典儒家心性理论发展而来,它肯定了儒学中关于人们追求对自我理想性格和精神境界,这也是宋代理学的中心思想和灵魂所在。大多宋人特别是宋代文人都提倡修身养性,对待事物和生活的态度也随着这种"心性"为指引,特别是宋代的审美和艺术,因为随性的生活态度是审美和艺术最好的催化剂。

审美理想与人生哲学熔铸在一起,使得哲学和美学相互交融[5]。前文提到建盏的美学体现为"简"与"意"的结合,宋代理学思想促成宋代人民内敛、淡泊、内隐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又影响着宋人欣赏建盏的角度,素雅含蓄的传统建盏大众审美映射着宋人的"心性"。此外,宋代建盏手工匠人也受到了来自理学思想的影响,意识指导行为,性格和思想也自然贯穿于建盏烧制的全过程,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烧制出符合宋代大众审美的建盏。

(二)建盏的自然审美与理学"自然观"

当理学中人的"心性"思想被放大时就会向着更高的境界去感知世间万物,大心之知就是一种高远的心性意境,这种境界要求要达到"天人合一""体天下之物",把宇宙万物看作和个人是息息相通的整体[6]。理学思想"自然观"就推崇人们亲近自然、感悟自然。建盏艺术造物活动中也彰显着"自然观"的思想,通过对釉色斑纹形成图案的臆想并借用自然景观来为建盏命名,让人们在使用建盏的时候能够与大自然产生一定的连接,这也是理学思想中人与自然亲近的理念。

古今建盏中关于理学"自然观"的思想理念大致相同,主要体现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从建盏的工艺艺术来说,传统建盏手工匠人利用自然馈赠的泥土、矿石和草木灰作为天然原料,再通过古人的智慧和古朴的龙窑烧制手法,最终得出传统建盏。现代建盏的手工艺技术给予了建盏很多非自然形成的可能性,但是现代人为控制的烧制技术也只是有限的手法,建盏还是需要采集自然的原料,釉色斑纹的化学反应还是随机形成并具有自然性。从建盏的审美艺术表现来看,建盏的釉色斑纹蕴含着自然的魅力,建盏的分类命名也是宋人崇拜大自然的最好体现。经典流传的几个传统建盏:曜变盏、兔毫盏、油滴盏、鹧鸪盏等,都是古人利用与釉色斑纹相似的自然万物来进行命名。现代建盏也延续了这种传统命名方式,百花盏、瑚琏盏、蓝灵盏、烟花盏等等都是由传统油滴建盏变幻而来(图 11),他们的釉色斑纹类别都同属于油滴盏类。

图 11 现代创新油滴盏

Fig.11 Modern innovation Jianzhan of oil drop

对比传统建盏,现代建盏对"自然"的看法和认识已经不再像传统建盏那样深远,最大的原因是时代和环境的不同,一方面是宋代浓厚的艺术文化气氛孕育着理学思想,另一方面就是现代建盏有了新技术烧制工艺,开始在釉色斑纹的审美多样性上开辟道路,"自然""朴素"的视觉审美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大众的审美需求并逐渐被淡化。但是,现代建盏是绝对不能离开"自然"的思想理念,因为天然的原料和不可预测的釉色斑纹是建盏的独特魅力和现代创新建盏的基本标准。

四、结语

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让陶瓷工艺开始开枝散叶,

形成了众多陶瓷派系和种类,这也为建盏的前身——黑釉瓷茶盏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外来宗教——佛教的思想也间接促进了传统建盏的发展。文化交流是进与出相结合,日本十分喜爱建盏的烧制工艺和审美特征,并将其带回了本国,建盏的传播直接促进了日本陶瓷工艺和茶道文化的发展。同样是社会环境因素之一的茶文化将建盏的实用性推上了一个高潮, 宋代点茶活动以建盏作为主要器皿,举国上下的宋人参与点茶,斗茶文化成为宋代最火热的娱乐活动,现代建盏与茶文化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也一直延续至今。

社会环境影响建盏审美文化,建盏也属于一种工艺艺术,没有陶瓷工艺的发展历史,就不会有建盏工艺的存在。建盏是陶和瓷属性相结合的特殊工艺,瓷的工艺技术在建盏的工艺制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传统建盏的工艺技术只有龙窑柴烧这一种烧制方式,其呈现的审美特性以“简”和“意”为主。现代建盏的工艺有了高科技的帮助,形成了以电烧为主、柴烧为辅的烧制方式,电烧建盏也体现为多样化审美。

传统建盏和现代建盏的美学主旋律离不开简洁和意境,同样宋代理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古今建盏不能摒弃的美学思想。宋代理学思想影响宋人“心性”, 淡泊名利、享乐主义是宋人内心追求的理想世界,这也使得宋代形成了朴素、随性的理想化审美,自然、淡雅、清新成为传统建盏的美学特征。建盏审美追求自然也与理学思想中的“自然观”有一定的联系,在建盏的原料和釉色斑纹中都能发掘宋人对自然万物的推崇。

唐宋和现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以及古今建盏不同的烧制工艺是传统和现代建盏审美文化差异的原因。不同的审美文化也让我们对现代建盏的创新发展产生了思考, 既不能完全背离传统建盏的审美文化,也要让现代建盏能够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形成具有时代性的审美风格。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是建盏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自省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211.

[2] 扬之水.楼集·两宋茶事[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25.

[3] 卢嘉锡,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203.

[4] 刘水清.建窑建盏的简约风格探析[J].景德镇陶瓷,2008(2):16-17.

[5] 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第一卷·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64.

[6] 陈来.宋元明哲学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69.

(责任编辑:白 琳)

On the Aesthetic Culture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Jianzhan

LI Xiuxian, WANG Xiaodong

(School of Arts and Design,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Jianzhan is a black glazed porcelain tea cup produced in Jianyang area of Nanping, Fujian Provi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Jianzhan aesthetic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influence, process aesthetics and ideological concept, as well as the similarities and changes of the aesthetic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Jianzhan to modern Jianzhan. The open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made the traditional craft of building lanterns sprout. The tea fighting culture and modern tea culture customs in the Song Dynasty directly improved the practical social value of building lanterns. The development of ceramic technology endows Jianzhan with glaze markings full of artistic concep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esthetics of the times constitute the minimalist style of Jianzhan; The core of Jianzhan's aesthetic culture is the view of nature.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Jianzhan aesthetic culture will help to point 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of Jianzhan culture.

Key words: Jianzhan; tradition; modern; aesthetic culture

当代视域下的闽北民间舞蹈创新发展

姚明君，潘舒娴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舞蹈系，福建 福州 350100）

摘 要：闽北自古作为交通要道，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该地的民间舞蹈也在世代流传中散发着无限魅力。于当今高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必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也随即成为当下文化可持续发展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当代视域的角度出发，在尊重原生形态的基础上重新审视闽北地区的民间舞蹈形态。主要从区域背景、样态分析、创新发展三方面层层递进展开阐释，以该区域民间舞蹈所受冲击并带来的变化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闽北民间舞蹈发展的系列措施。寄希望于在对闽北民间舞蹈进行全面阐释、总结中推动其未来走向更为宽广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当代文化；闽北民间舞蹈；继承性；创新性

中图分类号：J7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07-05

舞蹈艺术以人体动作本身为物质载体，不仅具有着强烈的艺术个性，同时又随着人民生活发展而涵养着诸多共性。民间舞蹈更是在地域性、民族性、自娱性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下以强大的生命力源远流长，各个地区的民间舞蹈都有其基于历史环境、生存现状、时代发展而引发的独特表达，其中闽北民间舞蹈作为福建地区的代表性舞蹈，更是成为当下舞蹈研究的热点对象。闽北民间舞蹈在何种环境下生发而来，形成了怎样的基本面貌，并如何在未来走向创新发展的生存之路，都成为笔者持续思考的问题。

一、闽北民间舞蹈形成的区域背景

闽北位于福建省北部，一般指福建省南平市。闽北民俗文化在历史因素作用下，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的突出特点，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滋养着独有的民俗活动、礼仪形式，也自然促使闽北地区的民间舞蹈在此背景下逐渐被完善。一方面，闽北民间舞蹈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饱含鲜明的个性色彩，另一方面，更依赖于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舞蹈种类被更加明确地规范、演绎与流传。

（一）自然环境的特殊性

自然环境包括生态、气候、地貌等多方面因素，人民的日常生活与自然环境紧密相关，这也导致以人民主体性开展的舞蹈艺术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先天性密不可分。就福建省整体而言，福建地处亚热带，在海洋季风的影响下，旱涝频繁，其中干旱对农业影响尤大[1]。在福建省内部观之，闽北地区各地的自然环境又和而不同，为当地的民间舞蹈活动提供了诸多优势。

闽北因山峰重峦叠嶂、低丘接连起伏而形成了以丘陵山地为主的地容地貌，闽江上游留下的三大支流沙溪、建溪、富屯溪的延展，也使得区域内河谷纵横、盆地丛生。自有“华东屋脊”之名，堪称福建最高峰的武夷山脉主峰海拔高达2000多米。基于山峰立而挺拔、山群层出不穷，在气候上帮助当地抵挡了寒流的逼近，也保留了海洋的温暖。也正因为此，闽北地区多有降水，雨量充沛，气候适宜，被认为是典型的“中亚热带海洋性湿润季风气候”。受气候不同程度的影响，自古以来，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祭祀仪式、祭祀舞蹈便在该地广泛开展，一方面传达了对于天气情况转变的希冀与祈求。闽北的建阳区，在日常生活中受干旱

收稿日期：2022-03-21

基金项目：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研项目（CEFA2020 0015ND）。

作者简介：姚明君（1983-），男，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舞蹈教育和创作研究。

影响偏多,导致庄稼收成甚微、人民苦不堪言,由此祈雨降临的风俗自古有之,在求雨舞的不断规范中形成了《鸟步求雨舞》这样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供当地人民使用、实现求雨愿望。另一方面,同样也是对应天灾,由于地理气候的多重影响,在科学不发达的旧社会,瘟疫成为了该地威胁人们生存安全的最大灾难,也直接导致了抵抗灾难的民间宗教祭祀活动、祭祀歌舞广泛开展。从中可见,自然环境在闽北地区虽同属一类,但就各地情况而言却各不相同,因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歌舞活动。

时至今日,闽北地区的特殊气候滋养了秀美而不古拙的山川之景,也记录了众多名胜古迹的踪影。其中人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便是以国家首批公布的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武夷山为中心,联通各地形成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将闽北地区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囊括其间。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基于独特风貌影响下旅游业的开展,才使得闽北地区的舞蹈获得广泛关注,被更多研究者认知并加以标识。

(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作用于舞蹈艺术发展之中,呈现出内外因素包裹的紧密联系。自然环境对应舞蹈最初缘起、形成的因素而奠定了深厚基础,社会文化则成为舞蹈艺术在后续发展中不断丰富、加以变化的直接诱因。从整个福建省的民间舞蹈发展来看,福建民族民间舞蹈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普查,显现出舞蹈的丰富性和地区差异性,主要表现在福建六大汉民系生活区域的板块上。福建汉民系是在北方汉人不同时期迁入闽和在闽的次生流动中,与闽越遗民、少数民族的相互融合而逐步演化成福州、兴化、闽南、闽北、客家、龙岩六大民系[2]。一般来说,文化就是在自我涵化与多元互动中形成的别具一格的风格特色,整个福建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经由各地区文化的互动而形成了更为多样的民俗、民风,其中闽北地区的多元文化渗入更为典型与充分。

闽北地区虽受到其他地区山峰的阻隔,在内外联通中的发展处于羸弱之势。但这并不影响闽北作为交通要道、文化交汇点而形塑的多元性风格。从闽北地区的历史演变来看,闽北是上古时期闽越族人主要聚居地之一。它西邻荆楚,北接吴越,很早就已“与闽中、于越杂俗”。秦、汉之后,中原人口南迁,尤其“自五代离乱,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备五方之俗”[3]。此五方之俗便具体呈现为“闽越民俗文化、吴楚民俗文化、中原民俗文化、宗教民俗文化、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因中原文化所形成的影响较为深厚,因此取中原民俗文化加以详细说明。中原民俗文化的起因便是基于闽北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中原人口在数次大规模南迁中,留下了部分人口选择常驻闽北,中原人的迁入也随之带来了丰富的中原文化,许多中原的民风民俗都积淀于此,中原傩舞便由此时传入[4]。傩舞的历史较为久远,最初在宫廷中便有流传携带面具的舞蹈加以驱邪免灾,并依照中原所遵循的重大节日加以演绎。傩舞的功能性较强,直至现在,闽北地区的傩舞风格变化不大,不过也会相应地根据各地区的生活习俗、文化特性而加以调整。

由此可见,闽北地区享有着特殊的自然环境与多样的社会文化,在内外交织中共同形成了当地多元并包、丰富多彩的地域特点。总结该地的区域背景,正是为进一步总结闽北地区的民间舞蹈形态奠定坚实基础。

二、闽北民间舞蹈形态特征分析

通过史料搜集可见,在《中华舞蹈志·福建卷》中,便对闽北地区民间舞蹈大概收集并简单描述的约十余种,主要有《灯舞》《战台鼓》《傩舞》《挑幡》《竹林刀花》等等,闽北民间舞蹈受宗教文化、民俗风格、地域习惯等影响而形成了基本的发展图景。闽北民间舞蹈不仅在当地民俗活动中承担起主力军的重要责任,也在宣扬地方特色文化、拓展全新发展空间中不断散发自身的价值。基于傩舞在闽北民间舞蹈中所具有的典型性与丰富性,以下就邵武地区的傩舞为个案分析,通过对舞蹈表达中独特的艺术形态与表演特征的总结与概括,进一步延展至对闽北民间舞蹈整体舞蹈形态特征加以分析与思考。

傩舞最早源自人们在瘟疫压迫下企图反抗的真挚愿望,在许多古书籍中都有对傩舞的社会功能、祭祀性质加以详细描述。在早期,傩舞便以头戴面具舞蹈而闻名,当时的表演者技术性较弱,所以步伐趋于生活性,以模仿鸟兽或是复刻鬼魂形态为主,比较简

单。但整体气势却十分强劲，延续着民间舞蹈所惯有的现场伴奏而以强烈的鼓点节奏进行整体表达。傩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自然在后世也受到了人们的重点关注。在福建省的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九项民间舞蹈，邵武傩舞便位列其中。在《中华舞蹈志·福建卷》中，共收录了邵武最具代表性的四种傩舞形式，其中包括《跳八衹》《跳番僧》《跳大小幡僧》《跳弥勒》[4]。这些舞蹈穿插于不同的时间段里，充盈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笔者曾有幸在采风中欣赏了《跳番僧》的舞蹈表演。

根据傩舞所共有的面具舞蹈的形式，《跳番僧》在表演时要求舞者头戴面具进行表演，扮演的是“弥勒”和“唐僧”师徒四人以及开路神六个角色。表演内容便是取自唐僧等人西天取经的民间神话，讲述了取经之路遍布艰难险阻，但在开路神的帮助下，四人一路逢凶化吉的故事。六名角色带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基本以面具形象的不同色彩加以区分，比如开路神迎接凶险，面对未知，所以以红色示人，面部表情极为凶狠，多配以力量性较强的动作，而弥勒作为佛法的象征，以白脸遮面，给人慈祥温柔之感，作为实现愿望的投影使人心灵受以慰藉。借以面具体现各自的人物性格，使得舞蹈整体的风格色彩更为明显。除此之外，在舞蹈过程中，舞者手中会配以寓意各自身份的道具，如开路神是红色木棍、师徒四人以两头挂有扁鼓、布幡的“经担”为主，弥勒则是木鱼加持。这些道具成为彼此掌握节奏、烘托氛围、推动情节的主要推力。敲打鼓面和鼓边组成如“|咚咚 咚|嗒嗒 嗒|咚嗒 咚嗒|咚咚嗒|”的节奏，并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改变鼓点节奏，以准确烘托氛围。同时，傩舞的仪式感极强，动作的指示性也极为准确。在舞蹈表演开始时，舞者会占据各自的方位，以“跪蹲步”为主要形态，使用四个“跳转步”依照现有的队形来回调整，整个舞蹈便是以方位、队形的转换为主，显现出古老、质朴的舞蹈风格。当然，基于《跳番僧》，流行于邵武市大阜岗河源村、和平镇坎下村、桂林乡大岭村以及泰宁县朱口镇等地，其他各地的《跳番僧》形式有很大差异。如和水镇坎下村演出于八月初五日中乾庙祭仪的《跳番僧》其人物有弥勒公、弥勒婆和四个“童子”。原有面具，后改为涂脸。道具无“经担”弥勒公、弥勒婆持双棍和木鱼外，其他人均扁鼓；桂林乡大岭村的《跳番僧》有大小两套。《大番僧》有开路神、弥勒和四个“番僧”，面具为苧麻布质，道具的“经担” 和表演形式和河源傩舞基本相同。面《小番僧》无面具，全部用涂脸，面关公、张飞，番将等脸谱。每人额前用红布裹扎一根长三、四寸的翅角，后脑挂黑丝以象童发，表演类似北方跳队形式[5]。这想必也与多元文化交融中文化差异性影响相关。

从中进一步总结出以傩舞为代表的闽北地区民间舞蹈的特点。首先，祭祀功能的沿袭与发展。受制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影响，闽北地区民间舞蹈多以祭祀性质为主，其中包含着祈雨、驱鬼、迎神等多重愿望，在各地得到了积极发展；其次，内容来源广泛且寓意深刻，闽北地区的舞蹈基本取自生活故事或是神话传说，对应舞蹈类型、舞蹈样式而加以角色、性格上的极致刻画，以此来展现世俗风情、人文关怀；最后，形式多变且文化基底深厚。从闽北地区在历史流转中所经受的多元文化冲击便可知晓，该地区的舞蹈在宗教文化与民俗文化融汇一体中被不断地加以修改、完善。

三、闽北民间舞蹈未来的创新发展

闽北民间舞蹈作为福建地区最富有艺术性、冲击力的舞蹈样式，在当下收获众多关注之时，也引发了对其未来何去何从、如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等相关问题的深度思考。根据当地民间舞蹈的本土性、历史性、民族性，笔者认为一方面需以保护为基本原则，遵循本区域内所现有的发展规律，最大限度地保留优质基因，另一方面则是以创新为目标，透过时代之眼，强调多元化、全方位发展。

（一）以保护为原则，遵循本土发展规律

以保护为基本原则，顾名思义，便是要继承已有的、传统的、独具特色的舞蹈形态，以其典范性、代表性指引着后续的舞蹈发展。就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量来看，闽北地区并不靠前，在福建地区广泛开展非遗申请之时，闽北地区也应根据自身优势，努力拔得头筹。

综合来看，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运用，继承发展；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建立并完善分级保护制度和保护名录体系……加强地区文化

空间的保护工作,适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6],是当前应对该地区民间舞蹈较为全面的举措,践行到闽北地区民间舞蹈之中则应更加细化,由此得出继承与保护同行、政府与社会共进两方面。

一方面,保护已有的闽北民间舞蹈,建立信息化档案,将民间舞蹈最为原生态的舞蹈表演发生的时间、地点、表演者等基本信息进行全方位整合。同时,继承舞蹈内涵的核心不仅意味着停留在对于动作、形式等表面可见之处,更应关注到从舞蹈的历史缘起、文化特征、审美观念等重点部分加以全方位的继承。比如对于傩舞的保护性传承,就应先将傩舞出现的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风土人情加以归纳,尤其侧重对于舞蹈上演场所的地域性、民族性进行加工整理,以求更为全面的介绍该舞蹈分属于不同地区而具有的类型化特质。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共进,政府政策更为细化,在落实到各地区之际,需要当地人民的积极合作,而针对闽北民间舞蹈的现状,首当其冲应解决资源配比、人才流失这两大问题。现如今,从事当地舞蹈表演的人群断层严重,舞蹈队里青黄不接,乡间地头都很难见到年轻人的身影,这也使得舞蹈这一借以身体动态流传的艺术形式陷入窘境。从舞蹈发展生态来看,当下应将重心放在吸引年轻人学习的工作之中,以民族文化俘获人心、以奖励机制吸收人才,争取更多艺术工作者愿意投身至民间舞蹈的继承与学习之中。

闽北民间舞蹈在历史推演中得益于世代民族艺术接班人的无私贡献而沿流至今。虽然在很多地区由于人口流失、物资匮乏等现实情况,难以再度将当地民间优质文化借以舞蹈进行表达,但重拾信心、重返故地,在政策引导下重新开始,理应成为当前的大势所趋。目前,整个闽北地区只有邵武市成立了傩舞传承中心,在现有能力下创作了舞蹈作品,在民间稍有影响,但相比闽南地区稍显薄弱。整个闽南地区的专业院团有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厦门市歌舞团、泉州市闽南歌舞传承中心(泉州歌舞剧团)等等,这几个专业院团创作实力雄厚,作品享誉海内外,再得以政府的多方面支持下,使闽南民间舞蹈得以充分、广阔流传。由此可见,以保护为原则,遵循本土的发展规律是在最大限度地为当地提供最大的发展空间,给予最为深厚而有力的支持。

(二)从当代视角出发,寻求多元化发展

憧憬闽北地区民间舞蹈的未来之路,除了回看过去之外,更要紧依当下。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民间舞蹈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但发展和创新首先必须继承民间传统,要挖掘和保护民间舞蹈的精髓,保持其民族性,同时要与时代特征紧相关联[7]。透过世界之窗,清晰可见当前民间舞蹈走向“创作+宣传”的复合路径。

其一,以民间舞蹈动作为基本素材,进行舞台化创作。近年来,在各大舞蹈高校内部从事艺术编创的相关团体,开始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纷纷进入田间地头进行采风实践。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创作品《傩情》当属此方面的代表之作。全剧分为“开天辟地”“生命造化”……等十个段落,将傩舞中傩神的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不仅做到明确动作的指代与含义,还进一步基于传统元素的丰富性进行了舞台化加工与提炼。除此之外,整场最让人感动的是开箱之际,邀请了当地老艺人一同演绎,为舞台演出注入了原生性灵魂。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创作的舞蹈诗《沉沉的厝里情》,以诗化的手法提炼出闽南舞蹈元素,展现了闽南人民勤劳、勇敢的形象,把“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内涵充分展现出来。基于原生表演的创作,挖掘本土素材,体现民族精神内涵,是以当代人的审美标准对原有舞蹈样式进行的一次再创造、再表达,同时也是以民族化、精神性更大限度的推动传统舞蹈接续发展的一次探索与尝试。

其二,结合当地特色整理教材,将舞蹈引入校园课堂训练之中。以“非遗”舞蹈为例,为数众多的民间舞蹈在“非遗”舞蹈进校园活动的开展中早已成为了舞蹈高等教育的主要素材。比如北京舞蹈学院经由对“非遗”舞蹈的传承与发展,实现了对我国十二个民族将近三十多支舞蹈的研习。作为该校中国民族民间舞系的保留项目,为学生们带来了最纯正、质朴、原汁原味的舞蹈教学。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让舞蹈高等教育注入民族化色彩之际,也反向引发了地方性舞蹈在当下的阶段性、探索式创新。由此可见,随着舞蹈社会功能的不断强化,乘着普及教育的广泛开展,富有地域性、民族性的民间舞蹈进入校园并成为学生们加以身体训练的举措,早已在社会推动下有序开

展。于此时代背景下,闽北地区的民间舞蹈也应借时代之风走进校园,成为辐射大、中、小学等专业类舞蹈院校的舞蹈表演课程。也正因为,“非遗”舞蹈进校园,既是民族优秀舞蹈文化在校园场域中的传播与弘扬,也是一种舞蹈美育的手段,是舞蹈教育注重文化内涵与特色建设的体现[8]。闽北地区作为同样涵养诸多非遗舞蹈的重阵之地,也更需要在不断加工记录自身舞蹈动作、整合训练教材、明确审美标准基础中融入课堂训练,成为舞蹈生们日常提高舞蹈技能、强化审美追求的重要手段,以此广泛延续闽北民间舞蹈的生命力。

其三,争取与各大平台相合作,争取为自身宣传占据至高地位。与时俱进作为文艺发展于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长期以来,闽北地区的文化艺术由于缺乏良好的宣传平台,于文化交流上往往处于失语状态。放眼当下,随着抖音、快手这类网络平台的大举发展,闽北地区的民间舞蹈也可以适当借助此种虚拟载体,逐渐散发出自己的光与热。基于网络平台的便利性与时效性,又借助于宣传手段与外界对话,以期在展现文化魅力之时,获取不同区域的文化认同,并在时代发展下倚照独树一帜而走向辉煌。同时更新内容与形式。这部分并非与保护性原则相区别,而是指出为了延长本地区文化艺术的生长周期,则需要在不同层面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以求更好的推进艺术整体的有效表达。除了官方的推广,还应鼓励自媒体创作,因地适宜的拍摄好作品,多元推广,使闽北文化得到快速有效的传播。

闽北民间舞蹈的当代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现代社会瞬息万变,影响着舞蹈艺术也不断加以变化、改进与发展。在 2015 年举办的全国首届青年运动会开幕式中,闽北民间舞蹈《挑幡》被邀请进行开幕式前的热场表演。这是一次向全国人民推广闽北舞蹈的良机,闽北民间舞蹈在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演变与艺术创作的突破,定会在联系过往、立足当下中以创新发展而走向未来之路。

四、结语

闽北地区民间舞蹈具有着风格多样、内涵丰富、表演细腻等多重特点,从古至今,流传着为人们所熟知的诸多传世之作。面对立足原生态成长的民间舞蹈,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笔者认为应不断对其加以保护、继承与发展。保护濒临消失的传统舞蹈样式,为舞蹈表演重返乡土,在田间地头得以尽情演绎提供条件;继承重要代表作品,召集有天赋、感兴趣的人才,为民间舞蹈的传播作出贡献;发展以创作为主阵地,经由采风加工、形成教材再到舞台表演这一过程,要求文艺工作者始终贴合该地的民族性、风格性,使本地区的舞蹈在发挥自身特质之际既具有教授学生、提高能力的训练性,又具有赢得观众喜爱,迎来更大文化发展空间的艺术性。总而言之,对于闽北地区民间舞蹈的创新性发展,切忌以偏概全式的碎片化传承,而是应关照到物质与精神等各个方面,做到整体性发展。在此基础上,更离不开民族性与时代性两个集中命题,针对该地区的地域特色又会呈现出多样的内生性特质,以此强大生命力足以继续引领着该地的民间舞蹈走出属于自己的未来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林国平,彭文宇.福建民间信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2-3.

[2] 习英.福建六大汉民系舞蹈分布初探[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S2): 223-224.

[3] 徐贯行.闽北民俗文化及其多元性浅探[A]//武夷文化研究:武夷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2002:492-502.

[4] 吴红叶.民间“傩舞”的艺术形态与地方性文化内涵初探:以邵武“傩舞”为例[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77-179.

[5] 叶明生.论闽北傩舞及其文化意义[J].民族艺术,1993(2):139-151.

[6] 李蕊蕊,赵伟,陈静.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特征[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6):97-102.

[7] 林松伟.福建民间舞蹈的当代生存之路[J].艺苑,2009(10):14-17.

[8] 仝妍.“非遗”舞蹈进校园:舞蹈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承创新[J].舞蹈,2018(3):82-84.

(责任编辑:白 晔)

(下转第 22 页)

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张 娴

(北京联合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01)

摘 要：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力量受到道德因素、文化因素和习惯因素的驱动，在扶贫济困、为公乐施等社会价值观念和法律政策的引导下，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等形式开展的分配方式。通过阐释第三次分配的概念及理论来源，分析践行第三次分配的必要性，阐述第三次分配面临的挑战，探索第三次分配的合理流向及相应对策。通过有效实施第三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大步迈进。

关键词：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慈善事业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12-05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强调："促进共同富裕，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1]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同开展。从当今社会贫富差距的现状来看，初次分配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再分配依照公平原则对其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力度仍然不够，需要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的第三次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一、第三次分配的内涵

(一)第三次分配的概念

初次分配是在市场的作用下、根据要素贡献进行的各个要素获得要素报酬的过程，受到利益驱动，目的是使要素总体贡献最大化，注重分配效率。再分配是在政府的作用下根据国家意志进行，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实现再平衡，是由公平正义等国家价值导向下的强制性行为，注重分配公平。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力量受到道德因素、文化因素和习惯因素的驱动，在扶贫济困、为公乐施等社会价值观念和法律政策的引导下，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等形式开展的分配方式，是对再分配的补充。三次分配并没有固定的时间顺序，而是在过程中交错进行。

与第三次分配不同，初次分配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考虑，追求效率优先；再分配是现代社会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强调公平的原则。第三次分配的根基在于其高于效率和公平的道德情操和里仁良知，根植于超越了财富的公益热情和慈善文明，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扬弃。第三次分配中蕴含着从传统的扶贫济困到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和造福全人类的价值取向，具有深刻的价值内嵌。

(二)第三次分配的理论来源

1.共同富裕理念

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2]，"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所系。

从宏观角度分析，共同富裕致力于社会的公平正

收稿日期：2022-09-23

作者简介：张娴(1998-)，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义问题，根本目的是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微观角度分析,共同富裕内在包含着“富裕”和“共同”两个方面的内涵,两者在逻辑上紧密相连。共同富裕中的“富裕”属于生产力范畴,是“共同”的前提条件。“共同”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是“富裕”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同”是对“富裕”的强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结合,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如今我国已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在生产力层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实现共同富裕的下一步任务就是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让“先富”拉动“后富”,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在当今社会,共同富裕为第三次分配提供了思想引领与理论滋养,需要一以贯之坚持下去。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友爱互助理念和慈善传统

第三次分配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其中所蕴含的道德、思想、文化因素都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发展更迭的几千年间,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其中就蕴含着友爱互助理念和慈善的传统。基于文化的传承性与连续性,在现代被创造性转化为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有着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友爱互助。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提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墨子认为“兴天下之利,去天下之害”,人与人相爱则相利,人与人相恶则相害。老子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现如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友爱互助理念和自古以来的慈善传统与现代发展实践不断融合,凝聚成为强大的道德力量,为第三次分配提供了理论滋养,成为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强大助力,不断推动着第三次分配的实践。

3.现代经济学理论

第三次分配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经济学基础。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首次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概念，并合理展望其对国家经济领域发展将起到的作用。1991 年厉以宁教授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包括市场机制、政府和道德力量。道德力量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的力量之外的又一种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道德力量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发生作用,即影响已经成为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使用方向,包括个人间的收入转移、个人的某种自愿的缴纳和捐献等。[4]

在 1994 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厉以宁进一步阐释了“三次分配”的概念。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是“第三次分配”。[5]收入不应只有市场、生产要素进行首次分配,而是要政府加强调节、引导慈善事业的“三次分配”,通过“三次分配”可解决收入分配难题。[5]1997 年在《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中,厉以宁认为,在市场分配和政府分配之后,第三次分配是存在的,这就是在道德力量影响下的收入分配。第三次分配是指人们完全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比如说对公益事业的捐献。尽管第三次分配目前在经济中起的作用不大,但它显然是很有前途的,而且将来的比重会越来越大。[6]

二、第三次分配实践的必要性

第三次分配是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等形式开展的分配方式,其作为社会治理概念下的一种自调节的机制,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效补充,是缩小贫富差距、激发共同富裕以及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助推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第三次分配的实践具有深刻的必要性。

(一)民间捐赠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途径

民间捐赠作为第三次分配中一种基础形式,直接作用于经济领域,对缩小贫富差距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2019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内地接收捐赠共计 1509.44 亿元，其中企业捐赠 931.47 亿元,占捐赠总量的 61.71%,其中民营企业占一半;个人捐赠 398.45 亿元,占 26.90%。这些数据显

示，民间捐赠在第三次分配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从先富者群体到后富者群体的财富流通通道正在有序建立。通过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捐赠，可以及时解决现有的困境，比如对山区小朋友捐赠书本、衣物的行为，缩短了财富流通过程，增强了时效性。特别是在与新冠疫情抗争的过程中，民间捐赠发挥了临时保障的作用。在近期上海疫情中，全国各地纷纷向其捐献物资，及时缓解了上海人民的困境，可见民间捐赠的形式不仅作用于扶贫济困，在各种突发性危机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

(二)慈善事业是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第三次分配是依靠社会机制调节的资源分配，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有助于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共同富裕虽然强调人人享有，但是并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发挥社会机制的调节作用。第三次分配中的慈善事业是依靠社会力量组织形成的扶贫济困活动，它内生于社会，对共同富裕的推动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友爱互助思想和慈善传统，这一思想理念与历史传统早已植根于人们内心，到了现代社会转变成为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富人群体和中产阶级所占比例日益增长，人们参与慈善事业的经济实力日渐增强，慈善事业逐渐发挥出其内在的强大力量，推动着共同富裕的进程。

(三)志愿服务是推动精神文明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三次分配对精神文明发展的推动主要是源于其中蕴含的道德性因素，志愿服务作为其重要载体，能够充分发挥道德在第三次分配中丰富精神文化、形成乐于慈善的社会风气的作用。截至 2022 年 6 月 1 日，中国志愿服务网上的数据显示，全国实名志愿者总人数达到 5.03 亿人次，志愿队伍总数达到 283 万，志愿项目总数达到 2111 万，服务时间总数达到 890002 万个小时。志愿服务成为一项全民参与、覆盖领域广泛的活动，其服务类别涵盖扶贫减贫、应急救援、疫情防控、社区服务、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志愿服务蕴含着奉献精神、志愿精神以及人文精神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逐渐潜移默化，转变为公众心中的信念，在全国范围内筑牢公民的慈善意识，将公众的价值观念与国家的治理观念有机结合，形成全民慈善的社会风气，推动着精神文明的发展和思想境界的提升，建立起和谐友爱的社会秩序。

三、第三次分配面临的挑战

我国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捐赠总额数量较小，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发挥的作用不足，第三次分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规模需要继续扩大，在发展过程中依旧面临着许多挑战。

(一)现有的法律制度和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首先，目前关于第三次分配的法律主要以《慈善法》为主，其对慈善事业和民间捐赠起到强制性保障作用，但是目前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困难，比如已经出台的法律规章数量还是较少，法律的内容不够细化，覆盖范围不够广泛，以致不能及时有效应对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难免成为“空中楼阁”。其次，在体制机制方面，社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对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等机构进行监管与督查。慈善组织在捐款中存在的贪污问题屡禁不止，捐赠流程不够透明化，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公众捐赠的热情减退，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降低。

(二)政府对第三次分配的支持力度不够

政府近年来致力于把握好再分配的问题，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提到第三次分配时也只是强调第三次分配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作用，缺乏一些软性的政策鼓励与支持第三次分配的具体实践。制定完善法律等硬性手段和软性手段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欧洲一些国家通过确立遗产税的手段，试图用利益驱动社会资本，这种软性手段能够发挥强大的内在激励作用，但是国内暂时还没有制定相关税法，因此政府对第三次分配的软性支持力度稍显不足，需要加以完善。

(三)社会慈善氛围不够浓厚

出于多年来教育和宣传的因素，我国公众对于慈善的理念、途径和价值并不十分清晰。在对公民的价值观教育中，没有使公众认识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性，使得一些公民在经济富裕时没有选择造福社会，而是错误地认为慈善是一种政府实施的行为，受到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洗脑、无节制的挥霍财富

或是将“小家”放在比“大家”更高的位置、将其财富留给子孙后代。媒体对于第三次分配的宣传工作也没有实施到位,报刊、网站上对慈善行为的宣传文章数量较少,对捐赠途径的宣传力度不够,许多公民对慈善捐赠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四、第三次分配的合理流向及对策

第三次分配作为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分析其合理流向及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关乎其整体效能的发挥,应当加以重视。在流向领域方面,第三次分配主要流向科技、教育、扶贫与发展领域。其对策实施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等多层面探究,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解决矛盾,推动第三次分配稳健发展。

(一)科技领域的对策探究

通过第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而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是第三次分配的关键一步。因此要使第三次分配在科技领域落地生根,就要抓好科技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这一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一方面,科技创新对于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颠覆性意义,因此在科技创新领域掌握主动权,推进科技产业转型升级,能够使我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科技成果转化是关键一步,两者相互推动,相辅相成,共同助力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在切实推动科技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能不断催生高水平科研成果,推动国家高强度战略的形成,面向国家战略直接实现科技成果应用和转化,因此科技成果转化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高收入人群从这一角度出发,投资有潜力的科技项目,能够切实推进第三次分配的实施,有力提升第三次分配的效能,实现物质层面上的共同富裕。

(二)教育领域的对策研究

教育领域一直以来是公益慈善的主阵地之一,公益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形式,推动教育公益慈善的发展,能够有力助推第三次分配的实施。新时代以来,教育公益慈善的发展应当着重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深化教育公益慈善的供给侧改革。不断完善教育领域的公益慈善机制,从制度层面上切实保障教育公益慈善的有效推进。现如今各种教育慈善基金会纷纷成立,提升慈善基金会的专业能力,增强慈善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力,处理好基金会与受益人、基金会与捐赠人、基金会与捐赠财产、基金会理事会与各执行团队之间的关系,更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要推进教育公益慈善的需求侧改革。深入实地调查乡村、学校的切实需求,建立起完善的合作帮扶机制,在提供公益资助的同时,有效激发被资助者受教育的内在动力,从“助学”到“助心”,充分发挥教育的深层内在价值,展现出新时代教育公益慈善发展的蓬勃生命力,使得第三次分配与教育相辅相成,相互助力,实现精神层面上的共同富裕。

(三)扶贫与发展领域的对策研究

扶贫与发展一直是我国近年来的工作重心,也是第三次分配的重中之重。推动第三次分配在扶贫与发展领域的落实,要将重点放在机制与法律上。首先基于对其他国家经验的借鉴,通过改革税制,出台对慈善主体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进行调整,对社会主体开展理性的利益驱动,加大对社会主体参与慈善事业的经济支持力度,从社会层面激发民间资本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其次,在第三次分配的实施过程中,形成政府、社会公众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国家制定政策、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企业执行的模式,有效解决慈善事业发展中信誉不高、矛盾频出的问题,深化我国慈善事业的内部治理,共同提升我国第三次分配的治理水平。此外,还要对《慈善法》这一基本法继续修订完善,使国家在慈善发展中产生的新需要不断在法律层面上落实,及时应对不断衍生的慈善新挑战,发挥《慈善法》作为根本依据的作用。通过对《慈善法》不断细化,使其覆盖范围更广,内容更加全面,对社会主体的激励作用更加强大。大力推动第三次分配在扶贫与发展领域的深化,能够有效缩小贫富差距,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大步迈进。

五、结语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力量受到道德因素、文化因素和习惯因素的驱动,在扶贫济困、为公乐施等社会价值观念和法律政策的引导下,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等形式开展的分配方式,主要来源于共同富裕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友爱互助理念和慈善传统以及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践行第三次分配的必要性,阐述第三次分配在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所面临的挑战,探索第三次分配的合理流向及相应对策,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大步迈进。

参考文献:

[1] 张全林.以人民为中心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EB/OL].(2021-08-18)[2022-09-2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8438357267959792&wfr=spider&for=pc.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373.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

[4] 厉以宁.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5):9-10.

[5] 厉以宁.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6] 厉以宁.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J].哲学研究,1997(6):13-14.

(责任编辑:魏 琛)

The Third Allocation Drives th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ZHANG Xia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power´s driven by moral, culture, habit elements, guided by social core values and legal policies such as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ingness to give", the third allocation is a way of allocation by means of civil donations, charities and voluntary service. By interpreting the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source of the third allo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the third allocation, describ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third allocation, explores the rational flow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of the third allocation. Through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ird allocation, the rich-poor gap can be bridged, stepping forward towards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the third allocation; common prosperity; charity

习近平关于美好生活重要论述的生态向度

任 静

（太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曾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环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美好生活图景下生态文明的构成要素，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行为文明、生态制度文明、生态产业文明。实现人民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大力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从多个方面协调推进：倡导绿色消费理念是关键，开展全民绿色行动是方向，建立健全生态法治体系是强有力保障，发展绿色产业是核心要求。

关键词：习近平；美好生活；生态向度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17-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论述中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并多次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生态环境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条件。实现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必须要处理好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这对矛盾。我们党站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在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不断提出创新性观点和论断。同时也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彰显了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大国担当。我们党要带领人民顺利实现“美好生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贯彻新发展理念，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厘清美好生活与生态文明的价值关联，坚决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以积极的态度促进绿色消费、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健全生态法治体系、发展绿色产业，这对新时代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22-04-25

作者简介：任静(1998-)，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一、生态文明与美好生活的理论逻辑

(一)生态文明是美好生活的自然前提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飞速跃升。随着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质量的要求，不仅需要在吃穿等物质生活方面体现出来，还需要“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2]。所以，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新时代下开启美好生活的关键“钥匙”。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3]因此，将实现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人民追求的幸福生活辩证统一起来，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民心所向、时代大势，更是迈向新时代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提出的另一种人类文明社会形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蕴含和寄托在其中。长期以来，以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为特征的工业文明主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是迄今为止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文明，其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为人类创造

了前所未有的巨额物质财富,但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其自身日益严重的副产品和后遗症,即地球资源的迅速枯竭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马克思指出,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人类敬畏并顺从于大自然,“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4]。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愈来愈凸显出来,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形成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人对大自然的霸权式掠夺遭到了整个生态自然界的反噬,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陷入“生态危机”和其他各种危机中,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梦幻泡影。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原理进行创新并进一步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5]必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才能有望实现社会的美好生活,“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6]。

(二)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制约甚至决定着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

什么被称为是美好生活? 在《汉语词典》中,“美好”是“在各方面都使人喜欢;极好”。在中国古人看来“美好生活”是一种“大同社会”,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人类社会最高级最理想的阶段。在 “大同社会”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一切都达于至境。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强调“美好生活”就是对智慧生活的追求,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好生活”不仅需要外在的善,而且要以自身为目的达到最高的善,这才是人们所追求的幸福。在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曾把“美好生活”描绘为“乌托邦”。在马克思看来“美好生活”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向往。纵观人类认识历史变迁,“美好生活” 就是人们希望达到的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人类发展的根本追求目标。

回瞻历史,可以发现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的人对美好生活有着不一样的定义,但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是一个整体的状态,包括物质、精神、生态等多个方面,而不是单一的。马克思指出我们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其社会关系的全面建设发展、价值的全面发展、个性的解放及其各个角度的发展等多方面的思想文化内涵,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社会最基本特征, 也是我们党最终追求的目标,而新时代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所要达到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同时也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具体描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点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对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履行这一承诺,带领人民一步步走向美好的生活,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新型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实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最根本的一环。新时代人们所一心追求的美好生活,不仅仅涵指物质上的富裕与精神上的丰富,也包括享受天蓝水碧、鸟语花香的生态生活,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好生态家园是人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期盼向往的题中之义与应然要求,也是党和政府持续接力奋斗的坚定方向。人作为有血有肉的自然存在物与自然之子,必然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应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影响和决定着人自身的生存质量与生活水准。适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充分展现大自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之美,构建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互利共生关系,达成“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完美统一,这便是美好生活的内蕴图景, 也是美好生活的主旨意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绩成效必将影响和决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体验感受,影响和决定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让人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闻得到花香、记得住乡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是我们党始终如一的初心,我们必须在不改变环境系统涵容能力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的增长,必须打造系统科学的生态安全体系,共建美好生态家园,助推美丽中国建设阔步前进。

二、美好生活视域下生态文明的构成要素

从系统论角度看,生态文明是由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构成要素主要有:

(一)生态意识文明

生态意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基于对自身行为的深刻反思而生发的一种寻求人与自然秩序和谐的思想或认知态度。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生态文明观认为, 生态意识文明被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自然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强调了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性,必须在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二是人类、社会、自然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在新时代下,必须放弃高耗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理念,考虑生态文明与经济效益二者相统一,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健康、适度的绿色生活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绿色理念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们国家绿色的机遇正在不断扩大,必须要走绿色发展这条道路。当前,整个社会正在形成崇尚绿色生活风尚的社会氛围,这种理念使人们的生产方式与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朝着美好生活的方向奋勇前进。

人的意识是其行为的导向者,生态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当代表现形式,对于当代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建构人民的美好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创建美好生活,生态意识要先行。必须以生态法治保障生态意识的养成,以科学的常态化的生态宣传为生态意识的养成提供舆论引导,以持续的生态教育为养成良好的生态意识提供心灵启蒙。只有在先进生态意识的指引下,人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创设优美生态环境、共建美好生活的时代洪流中去。

(二)生态行为文明

生态文明不仅是意识的表现,也是社会行为的展现。美好生活语境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人们需要用自身的行动践行文明行为准则,携手共建天蓝、水碧、地绿的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7]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易行难,行胜于言。美好生活的创建,不仅需要至善至美的蓝图设计,更需要行动与实践。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山青水碧的锦绣家园、幸福和谐的美好生活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不能当坐而论道的生态文明清谈客,而是要做一个脚踏实地的美好生活实践家。人们应该通过改变过去那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呵护生态环境,节省能源资源、实现绿色消费、开展低碳行动、分类投放垃圾、杜绝污染发生、参与管理并监督举报破坏生态的行为,大力倡导健康、适度的消费行为,固本培元,来建构自己向往的美好生活。“要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动员全社会都以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6]这种“全民绿色行动”的生态行为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生活方式的再思考和超越,有利于人们自身的健康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更好地实现发展过程中的“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让人民群众享受到绿色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

(三)生态制度文明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自然前提与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它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而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其产生或存在的意义是给社会提供节制人们行为的尺度。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即规矩是社会良好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如果要实现所向往的美好生活,既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也不能脱离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更要依靠科学的规范、配套的系统、有效运行的体制来保驾护航。生态文明建设,是人民奔向美好生活的关键步骤。只有率先实现生态制度文明,充分释放生态制度体系的活力,让生态制度体系成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压舱石”,才能为美好生活提供强有力的法治助力。从“制度”方面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执行力,是中国共产党严守政治纪律,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坚定决心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8]党的十九大指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严格的制度作保障。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对需要追责的情形,要追查到底,不能让制度规定被看作“没有牙齿的老虎”[8]。显然,日趋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是国家层面的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化、特色化,目的在于以制度的刚性威力为生态环境构筑强大的保护与发展盾牌防线,把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绩效和人民迈向更美好生活的进步阶梯。

(四)生态产业文明

在美好生活语境中,推进生态产业化、建设生态产业文明是其重要一环和强有力的物质保证。所谓生态产业化是指按照市场化的标准与要求推进生态建设,实现生态资源的保值增值,达成生态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循环发展。如果缺失生态产业,在市场化条件下,生态建设势将举步维艰、难以为继,失去发展的后劲即可持续性,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就成了一句空话。在新时代,中国生态产业化的重点是按照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走生态工业的发展道路,与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共同发展。这种生产方式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之美,用最少的资源消耗、更低的环境污染换取更大的经济效益。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中,提到环境就是生产力,要求我们大力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生态产业就是美好生活语境下实现生态文明路径的一种创新,推进生态产业化,使优良的生态环境作为人民“美生活”“好生活”的增长点、支撑点和动力点,进而达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

三、美好生活语境下实现生态文明的路径

(一)坚持绿色消费理念

绿色理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观念是行动的先导,人们的绿色消费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好幸福生活的实现程度。要形成绿色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我们首先要坚持和倡扬绿色消费理念。

一方面,坚持循环消费理念。循环消费理念是绿色消费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循环消费是以消费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消费环境的最少污染为核心,以“消费品—消费—废弃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循环流程为特征,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目的的一种物质消费模式。由于地球上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并要在有限的情况下满足各群体的消费需求。人们需要在各级政府的带领下落实循环消费,强化每个人的绿色生态意识,引导全民的价值观发生转变并走上绿色消费的轨道,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另一方面,树立适度消费理念。适度消费的观念是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消费观念。适度消费理念倡导人们把物质消费的规模、水平、结构及其发展,维持在消费资源和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防止和减少奢靡性、过度性、浪费性消费。工业社会中单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毫无节制地以牺牲生态环境并且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将幸福美好生活完全建立在物质欲望无限膨胀的基础上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危险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8]适度消费理念要求将消费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减少奢侈浪费,用最具价值的消费满足自己的真实需要,养成健康文明、简约适度的生活理念,它扬弃和超越了追求无限增长消费的消费主义,是我们对消费与美好生活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二)开展全民行动

人民是美好生活的建设者和受益人,践行绿色生态理念、实现美好生活离不开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6]

首先,要抓好思想宣传。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必须运用好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载体,发挥各种媒体如微博、抖音、快手、短视频等的宣传作用,引导人民群众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重要论述,让生态文明思想走进公民的生活中,培养公民形成良好的生态价值观,引导人民群众自觉参加绿色创建活动,将绿色生态理念宣传活动融入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生态环保意识深入人心。通过集中进行绿色生态的宣传活动,既可以宣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也可以不断践行多种多样的绿色生活方式,从而实现美好生活。其次,要在正确的消费意识引领下倡导人们进行“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奢靡消费。当前,绿色消费已逐渐成为主流价值观,但将绿色理念变成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仍然需要各方面的持续努力,这样才能为实现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坚持严密法治观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上,光靠人民自觉的思想意识是不完善的,国家还要用刚

正严密的法律法规制度来保障生态环境的优美化,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奠定法治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8]

要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一方面,完善生态系统保护制度体系。加强重点功能区制度建设,建立土地和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推进荒漠化治理和水土流失治理,保护和恢复湿地,预防地质灾害。另一方面,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充分发挥各大媒体平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作用,重点监察对象即为环境问题最突出的地方,不断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逐步建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件,比如《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6]在不断落实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我国还进一步强化有关生态文明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力度,有效运用法律手段保障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并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法律制度。2015 年 1 月 1 日,我国开始实施新的环保法。此次新环保法的修订,将作为对环境污染者进行严厉处罚的主要依据,可持续发展在这次修订中也纳入了立法。同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党和政府通过将生态文明明确写入宪法与各种法律当中,也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四)发展绿色产业

1.发展城市绿色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8]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也就是保护生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使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得到和解,向“美生活”“好生活”的方向迈进。

绿色经济是一种以和谐、健康和可持续为目标的新经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8]一方面,在生产领域将传统产业绿色化,践行低消耗、零污染的理念并进一步改造传统工业,淘汰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落后产业,走出一条低碳、环保的新型化工业道路,并将自然优势转变为产业竞争优势,实现自然资源的经济研究价值,将满足人民的美好幸福生活需要为标准,为人民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生态产品。另一方面,在生活领域开展一系列绿色的活动,在居民生活中倡导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生活,打造独特的绿色餐厅、绿色学校、绿色小区、绿色快递、绿色农贸市场,将绿色融入生活中,引导居民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让绿色融入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从而实现美好生活。

2.建设美丽乡村

随着国家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乡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农村自身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缓慢,大量农村人口背井离乡相继涌入城市之中。农村在我国曾经是落后的代名词,一度面临人口流失、经济落后、环境荒芜等困境。为了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使乡村振兴起来,有必要将农村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探索多样式的绿色扶贫方法,带领乡村人民走出一条绿色的致富道路。

加快建设美丽乡村,就是要让农村绿起来、富起来。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村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惠及广大农民。首先,在农村地区要合理规划,根据当地的地理特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各地的特色小镇,发展生态旅游业。其次,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业结构升级,推动传统农业与循环经济二者相结合,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模式,进一步打造当地特色农产品。最后,不断完善与城市相一致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一些方面的基本制度框架,不断引进资金、人才、互联网等要素。例如,位于杭州的“梦想小镇”是浙江的特色小镇之一,完美的实现了互联网与绿色的融合,使乡村不断振兴,为实现人民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愿景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0,70.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66.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4,11.

[5]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002).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74,363,362,364.

[7] 习近平.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态生活环境[N].人民日报,2017-05-28(001).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9,111,122,99,12,42.

(责任编辑：白 琳)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a Better Life

REN Jing

(School of Marxism,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Shanxi 030024)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have been transformed, and the people´s longing for a better life is stronge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realize a better life and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picture of a better life includ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behavior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system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industry civilization. To realize a better life in the eyes of the people and vigorously bui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 need to coordinate and promote from many aspects: advocating the concept of green consumption is the key, carrying out national green action is the direction,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rule of law system is a strong guarantee, and developing green industry is the core requirement.

Key words: Xi Jinping; a better life; ecological dimension

(上接第 11 页)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olk Dance in Northern Fujian from th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YAO Mingjun, PAN Shuxian

(Dance Department, Fuji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 Fuzhou, Fujian 350100)

Abstract: Northern Fujian, as a main traffic route since ancient times, contains rich folk culture, and its folk dance also exudes infinite charm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nology, traditional culture will be affected to varying degrees.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immediately become a crucial issu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vision,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form of folk dance in Northern Fujian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original form. Mainl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regional background, sample analysis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ains layer by layer, takes the impact and changes of folk dance in this reg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dance in Northern Fujian in the future. It is hoped to promote its future to a broader road of innovation in the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and summary of folk dance in Northern Fujian.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ulture; folk dance in Northern Fujian; inheritance; innovation

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综述及启示

李泓沄[1]，万　泉[1]，徐　洪[1]，王兰兰[2]

（1.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林学系，福建 南平 353000；2.南开大学 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312篇森林康养主题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软件对该领域的时空特征、知识基础、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梳理国际森林康养研究领域的历程与进展，发现该研究领域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中国大陆等具有较强研究实力；研究内容集中在论证森林康养对不同人群、不同疾病的有益性上。新冠疫情背景下，森林康养产生的心理效益呈现出热点趋势，数字森林康养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结合研究发现与国内实际情况，对未来研究提出加强不同林分对人体健康有益性的研究、强化森林环境与在地文化关联的研究，探索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森林康养发展模式研究等建议。

关键词：森林康养；CiteSpace；热点前沿；演进脉络；趋势展望

中图分类号：F3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23-08

森林是孕育生命的母体，人类社会的摇篮，也是中华文化的根源所在[1-2]。康养是善待身心的具体方式，也是在工业化、老龄化等时代背景中逐渐突显的社会需求。森林康养是以森林生态环境为基础，以促进大众健康为目的，利用森林生态资源、景观资源、食药资源和文化资源与医学、养生学有机融合，开展保健养生、康复疗养、健康养老的服务活动[3]。森林康养突显了森林环境对人类健康的有益性，与“健康中国”战略相呼应，对释放国民生态福利，增强国民身体素质，节约社会医疗开支，促进林业及相关行业转型升级均具有重要意义[4-5]。

相较于国际丰富的发展经验和日趋完善的研究体系，国内森林康养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的政策依赖性较强，相关研究领域在2016年之后才呈现出热点态势，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基地建设与产业发展，缺乏深入性和持续性，学科融合明显不足，科学量化研究也十分欠缺[6]。基于此，系统梳理国际相关研究的历史脉络与当下进展，对促进国内森林康养发展与相关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22-04-15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21536)。

作者简介：李泓沄(1991-)，女，汉族，助教，主要从事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养老旅游等方面研究。

通信作者：万泉(1963-)，男，汉族，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主要从事森林培育、林业经济等方面研究。

一、方法和数据

(一)研究方法

CiteSpace能够多元、分时、动态地绘制知识图谱，用一幅引文网络图谱呈现出一个知识领域的过去与现在，为科研人员解释现实与预测未来提供理论基础[7]。使用CiteSpace (CS5.8.R3)软件对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的时空特征、知识基础、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与此同时，采用传统文献研读的方法系统梳理CiteSpace所识别出的关键文献，以求弥补分析工具的片面性。

(二)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来自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以“for-

est* bath*" "Shinrin Yoku" "forest* therap*" "forest* medici*""Shinrin Igaku"为主题进行检索,时间跨度取"所有年份"(1985—2022 年),检索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19 日,文献类型取研究论文、研究综述、会议论文,语种取英文,除重后得到 312 篇样本文献。

二、结果与分析

(一)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的时空特征

1.文献时间分布

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的发文趋势如图 1 (检索日期为 2022 年 5 月,结果不能代表全年发文情况,故该年度用虚线表示)。从文章发表年度分布来看,国际森林康养研究大致经历了导入期、平稳增长期、快速增长期三个阶段。1985—2004 年为导入期,此阶段该领域发文速度缓慢,20 年总发文数量仅为 5 篇;2005—2013 年为平稳增长期,此阶段该领域发文速度略有增加,每年均有文章面世,但尚未形成研究热潮,9 年间总发文数量共 32 篇,年均发文数量不足 4 篇;2014 年至今为快速增长期,此阶段该领域发文速度明显增加,研究热潮初步形成,2014—2021 年总发文数量达 275 篇,年均发文数量超过 30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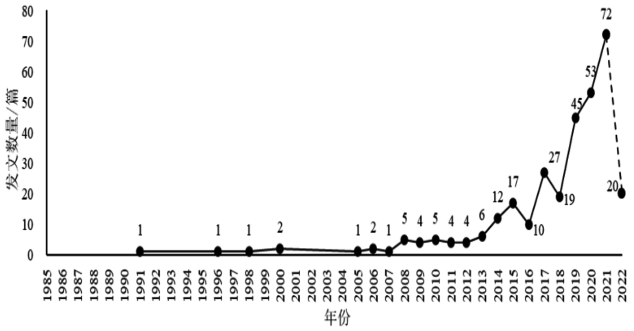


图 1 国际森林康养研究文献数量年度分布

Fig.1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forest health research

2.文献空间分布

截取发文数量大于 10 与文章中心性不小于 0.1 的国家/地区,形成国际森林康养研究重要国家/地区分布表,见表 1。

表 1 国际森林康养研究重要国家/地区分布表

Tab.1 Key countries / regions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 health research

发文数量/篇	国家/地区	中心性	国家/地区
75	日本	0.34	美国
70	韩国	0.17	意大利
51	中国大陆	0.16	中国大陆
34	美国	0.12	加拿大
16	意大利		
15	波兰		
11	英国		
10	中国台湾		

如表 1 所示,发文数量位居前列的国家/地区有日本、韩国、中国大陆等,是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的重要力量;文章中心性位居前列的国家/地区有美国、意大利、中国大陆等,其中美国的研究影响力最为突出。以上分布主要可归因于各地森林康养产业的成熟程度与产业开发的热情程度两方面。首先,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该深耕时间较长,无论是发文数量还是文章重要性都名列前茅;其次,受政策影响,中国的研究热情在 2016 年后开始爆发,研究力量在该领域已初露头角,但在研究影响力方面尚有进取空间。

(二)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的知识基础

特定领域研究前沿的引文可以视为该领域的知识基础,而共被引分析 (co-citation analysis) 认为文献(作者)共被引的次数越多,彼此之间关系便越密切[8-9]。通过 CiteSpace 对样本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绘制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如图 2。

图 2 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

Fig.2 Publication co-cited network in international forest health research

图 2 中每个节点代表一篇被引文献,节点越大表示该文献的被引频次越大;年轮圈的厚度代表不同年份该文献的被引频次,年轮越厚,该年份的被引频次越多 [10]。如图 2 所示, 被引频次最大的是 Hansen 于 2017 年发表的“Shinrin-Yoku (Forest bathing) and nature therapy: A state-of-the-art review”,而中心性最强的则是 Song 于 2015 年发表的“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a walk in urban parks in Fall”,两篇文章均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上,整理图 2 在 CiteSpace 中的详细信息, 截取中心性不小于 0.1 的文献 13 篇与被引频次排名前 10 的文献, 得到 23 篇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的关键文献,构成了该领域的知识基础。

从文献类型来看,23 篇文献中包括 4 篇综述和 19 篇实证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19 篇实证研究均采用了实验法或准实验法,且大部分实验地点设置在日本(12 篇);从研究内容来看,关键文献基本聚焦于论证森林康养产生的生理效益与心理效益。

1.森林康养产生的生理效益

在关键文献中,学者们发现森林康养产生的生理效益主要集中在促进减压放松、增强免疫力、预防和辅助治疗高血压等方面。

(1)促进减压放松

森林康养的减压放松功效已得到众多研究证实。交感神经活动对人体的紧张状态起主要作用,而副交感神经对人体的放松、安静状态起主要作用。Lee J , Song C R , Komori T 等的研究证实在森林环境中观景、行走、散步等活动均能有效抑制交感神经活动,促进副交感神经活动,进而达到减压放松的效果;选用指标主要为心率、心率变异性、血压、唾液皮质醇、脉搏率等,被试群体为青少年、青年男性、中年女性、中年高血压男性等[11-17]。但值得注意的是,Antonelli M 的元分析指出安慰剂效应在森林康养减少压力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18]。

(2)增加免疫力

自然杀伤 (natural killer, NK) 细胞(以下简称 NK 细胞)是免疫细胞的一种,可以直接识别、杀死肿瘤细胞,也可以作为免疫系统的调节细胞间接杀伤肿瘤细胞,不仅能够治疗肿瘤,对自身免疫性疾病、重症感染等的治疗也具有重要意义[19]。Li Q 指出森林康养不仅能够增加 NK 细胞数量, 增强 NK 细胞活性和抗癌蛋白的表达,且该效应在被试离开森林环境后至少能够持续 7 天,对男女均有效果[20-21]。

(3)预防和辅助治疗高血压

Song 指出森林环境中步行可以显著增加副交感神经活动,显著降低心率,对中年高血压患者有生理上的放松作用[22],Sung 观察到森林环境对降低老年高血患者唾液皮质醇与改善生活质量的有效性,认为森林康养可以成为社区高血压管理计划的有效措施[23]。Ochiai 调查森林康养对正常高值血压(高血压前期)中年男性、中年女性的影响,发现森林康养后被试的收缩压、舒张压、尿肾上腺素、血清皮质醇均显著低于基线,提出森林康养可以防止中年男性正常高值血压发展为临床高血压,是一种有潜力的治疗与预防策略[24-25]。

2.森林康养产生的心理效益

人类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本身具有亲近自然的天然倾向。在关键文献中,学者们发现森林康养产生的心理效益主要集中在改善情绪状态、提高注意力与主观活力、提升自尊心和创造力等方面。

(1)改善情绪状态

精神压力和情绪问题是现代社会较为突出的心理问题,而森林康养对改善情绪状态的有益性已被众多研究证实。学者们使用的情绪测量工具主要包括情绪状态量表 (profile of mood states, POMS)、正负性情绪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s chedule, PANAS)、恢复结果量表 (restorative outcome scale, ROS)、状态—特质焦虑量表 (state 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主观活力量表 (the subjective vitality scale, SVS)等[15, 22,26-27]。Lee J 发现森林疗法能够增加年轻男性的积极感觉,减少消极感觉 [11],Ochiai H 发现森林康养对中年男性和女性也有相似效果[24-25]。Song 的研究指出在森林中行走增加了中年高血压患者 “舒适”“放松”“自然”和“活力”的感觉,减少了“紧张-焦虑”“抑郁”“焦虑-敌意”“疲劳”和“困惑”的感觉[22]。

(2)提高注意力与主观活力

相对于建筑环境,人们更加偏好自然环境,与自然互动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增加活力与幸福感。注意力恢复理论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ART) 指出定向注意是一种认知机制，可以通过与自然互动进行恢复[28]。Berman 发现在森林环境步行能够改善重度抑郁症患者的认知状态和情感状态，显著提高其记忆广度[29]。Ryan 指出相对于建筑场景，森林场景中的户外活动更能够提升主观活力[30]。

(3)提升自尊心和创造力

森林是绿地或绿色环境 (green space/ green environment) 的重要存在形式，绿色运动 (green exercise) 指的是在绿地或绿色环境中运动，Barton 发现仅 5 分钟的运动就能够显著提升人的自尊心[31]。Tyrväinen 认为相较于城市公园，森林环境更能够帮助人们恢复、感受活力和积极情绪，提升人们的创造力[32]。

(三)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热点与趋势

CiteSpace 提供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绘制关键词图谱，辅以突现词 (burst term) 功能，能够较为直观地展示特定研究领域的热点与趋势[7]。

1.研究热点

利用 CiteSpace 绘制国际森林康养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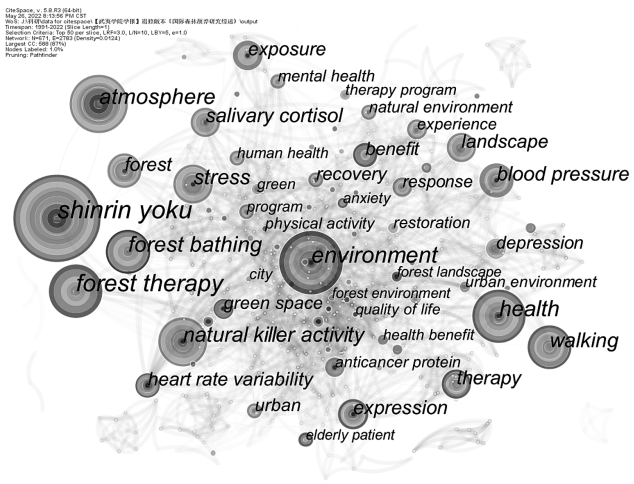


图 3　国际森林康养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3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of international forest health research

图 3 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共现频率越高；连线代表共现关系，线条越粗表示彼此关联越紧密。整理图 3 在 CiteSpace 中的详细信息，截取词频不低于 10 的关键词的文献，翻译并将同义词归类之后得到表 2。

表 2　国际森林康养研究词频高于 10 的关键词

Tab.2　Keywords with frequency higher than 10 in international forest health research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shinrin yoku / forest bathing 森林浴	170	blood pressure 血压	40	anticancer protein 抗癌蛋白	17
health / human health / health benefit 人类健康、健康益处	92	green space / green 绿地、绿色	38	quality of life 生活质量	14
forest therapy 森林疗法	86	depression / anxiety 抑郁、焦虑	38	forest landscape 森林景观	13
environment 环境	77	expression 表达	36	elderly patient 老年病患	13
urban / city / urban enviroment / town 城市、城市环境、城镇	66	landscape 景观	33	preference 偏好	12
therapy / program / therapy program 疗法	64	exposure 暴露	33	heart rate 心率	12
atmosphere 氛围	59	heart rate variability 心率变异性	30	pulse rate 脉搏率	12
natural killer activity 自然杀伤细胞活性	54	benefit 益处	28	stress recovery 压力恢复	11
stress 压力	49	physical activity / exercise 身体活动、锻炼	27	profile of mood states 情绪状态量表	11
walking 散步	46	response 反应	21	ecosystem service 生态系统服务	11
forest / forest environment 森林环境	46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	20	preventive medicine 预防医学	10
recovery / restoration 恢复	45	experience 体验	20	anticancer protein 抗癌蛋白	17
salivary cortisol 唾液皮质醇	41	natural environment 自然环境	20	quality of life 生活质量	14

如图 3 与表 2 所示，提炼出的关键词基本能够描绘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的图景。结合对样本文献的解读，发现该领域研究热点仍然集中在探索和证明森林康养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有益性上，大多采用实验法，并利用森林环境和城市环境形成实验组和对照组，要求被试在森林环境与城市环境中进行散步等较为简单的运动，通过测量能够反映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的相关指标与量表，如 NK 细胞活性、唾液皮质醇、心率变异性、抗癌蛋白的表达、POMS 等，证明森林康养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具体益处，如降低焦虑水平，预防和

辅助治疗高血压、抑郁症等。

2.研究趋势

利用 CiteSpace 的突现词功能进行关键词突发性检测,将 γ 值调整为 0.56,其他参数如图 3,得到 22 个突现词,翻译后形成表 3。

表 3 共现频次突增的前 22 个关键词

Tab.3 Keywords with citation bursts

关键词	突现初现年份	突现强度	突现起始年份	突现终止年份
circadian rhythm 昼夜节律	1991	2.28	2006	2013
cytotoxic t lymphocyte 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	1991	1.98	2006	2008
nk activity 自然杀伤细胞活性	1991	1.98	2006	2008
exercise 锻炼	1991	2.22	2007	2014
heart rate variability 心率变异性	1991	2.22	2008	2015
atmosphere 氛围	1991	5.34	2009	2015
heart rate 心率	1991	2.33	2010	2015
town 城镇	1991	4.28	2013	2015
forest landscape 森林景观	1991	3.22	2014	2016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 语义分析法	1991	2.36	2014	2015
preventive medicine 预防医学	1991	2.37	2016	2020
experience 体验	1991	2.09	2017	2020
benefit 益处	1991	3.22	2019	2022
restoration 恢复	1991	3.12	2019	2020
therapy program 疗养项目	1991	2.74	2019	2020
forest therapy 森林疗养	1991	7.13	2020	2022
exposure 暴露	1991	3.61	2020	2022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	1991	3.22	2020	2022
elderly patient 老年病患	1991	3.19	2020	2022
tree 树	1991	2.42	2020	2022
stress recovery 压力恢复	1991	2.35	2020	2022
urban 城市	1991	2.34	2020	2022

结合对相关文献的解读,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的热点演变过程表现为:

国际森林康养研究热点演变呈现出由探索、论证森林环境对人类生理健康的益处(benefit) 转向其对人类心理健康的益处的趋势。该领域研究频繁使用实验法,学者们通过控制测量时间排除由昼夜节律 (circadian rhythm) 引起的误差,将城镇 (town)、城市 (urban) 等人工环境设置为对照组,将在真实森林环境中进行的森林疗养(forest therapy) 或疗养项目 (therapy program) 设置为实验组,引入被试运动 (exercise) 形成实验组组间对比,探究由树木 (tree) 等散发的植物香气、温度、湿度、光照强度、氧气浓度等共同构成的森林氛围 (atmosphere) 对人体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 (cytotoxic t lymphocyte)、自然杀伤细胞活性 (nk activity)、心率 (heart rate)、心率变异性 (heart rate variability) 等指标的影响[11–12,20–23,31,33–37]。

物质决定意识,在森林康养对人类生理效益逐渐明朗的同时,其对人类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的益处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许多学者开始同时测量森林康养产生的生理效益与心理效益,使用语义分析法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 设计相关量表测量森林康养对减轻心理压力 (stress recovery)、促进抑郁与焦虑等状态恢复 (restoration) 的功效[14–15,24–25,31–32,38–39]。在森林康养对人类健康效益得到广泛论证的同时,越来越多学者建议将之作为预防医学 (preventive medicine) 的一项具体措施[16,22,24–25,38]。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逐渐成熟, 森林景观 (forest landscape) 的康养功效开始引起学者们注意。在时间、经济、身体条件、防疫政策等众多因素约束下,真实森林环境体验 (experience) 可及性弱,而虚拟森林景观却触手可及 [39]。学者们发现即使将被试暴露 (exposure) 在虚拟世界的森林环境中,甚至仅仅只要求被试欣赏森林景观的影像、视频等,也能产生与真实森林环境类似的心理效益,这为老年病患 (elderly patient) 家居环境设计、防疫期间外出受限的居家生活提供了减轻抑郁的方向[40–45]。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虚拟森林康养也可以对人产生心理效益, 但相对于真实森林环境,该效益持续时间短,真实森林环境所提供的植物有机挥发物等是虚拟森林场景难以替代的[41]。

三、结论与讨论

纵观国际森林康养研究历程,发现该研究领域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研究经验较为丰富,各学科融合程度较高,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较强;相对而言,中国的研究历程较短,但研究热情旺盛,成果积累迅速,相关研究力量已初露头角。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论证森林康养对不同人群、不同疾病类型有益性上,具体包括促进减压放松、增强免疫力、预防和辅助治疗高血压等对身体的有益性和改善情绪状态、提高注意力、自尊

心和创造力等对心理的有益性。此结论与 Song, Hansen, Lee 的综述结论一致[38,46-47]。通过关键词共现和突现分析，发现该领域研究热点呈现出由森林康养产生的生理效应转向其产生的心理效益的趋势，新冠疫情背景下,数字森林康养也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40-45]。

通过系统梳理国际森林康养研究进展,对未来国内相关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不同林分对人体健康有益性的研究。目前混合林环境对人体健康的有益性已经得到许多科学证实,但单树种环境对人体健康的有益性却十分不足，无法在现实意义上为林场或林地强化其康养功能提供实际的树种规划指导[44,48]。第二,强化森林环境与在地文化关联的研究。在政策引导下,目前各地都在积极建设森林康养基地,但许多地方并未深入挖掘森林环境与本地传统文化的关联,活动载体内涵缺失,难以为康养旅游等产业的纵深化发展提供支撑。第三,探索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森林康养发展模式研究。未富先老是我国当下急需解决的人口问题,森林康养产业发展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老年医疗费用,也具有为老年人口提供就业岗位的巨大潜力,加强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森林康养发展模式研究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 黎德化.论我国森林文化的现代化[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1):33-36.

[2] 金鸣娟.论森林文化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在中国文化视阈中的考察和认识[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2):1-5.

[3] 曹净植,伍海泉.社会共生视角下的森林康养[J].林业经济,2020,42(9):43-52.

[4] 邓三龙.森林康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J].世界林业研究,2016,29(6):1-6.

[5] 刘思思,乔中全,金天伟,等.森林康养科学研究现状与展望[J].世界林业研究,2018,31(5):26-32.

[6] 郝亮,林涛,陈琳,等.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森林康养研究进展[J].中国城市林业,2020,18(3):72-77.

[7]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33(2):242-253.

[8] CHEN C .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57(3):359-377.

[9] 刘林青.作品共被引分析与科学地图的绘制[J].科学学研究,2005,23(2):155-159.

[10] 李杰.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108.

[11] LEE J , PARK B J , TSUNETSUGU Y , et al. Effect of forest bathing on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in young Japanese male subjects[J]. Public Health,2011,125(2):93-100.

[12] LEE J , TSUNETSUGU Y , TAKAYAMA N , et al. Influence of forest therapy on cardiovascular relaxation in young adults [J].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4:1-7.

[13] LEE J , PARK B J , OHIRA T , et al. Acut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a traditional rural environment on urban dwellers: A crossover field study in terraced farmlan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5,12(2):1874-1893.

[14] SONG C R , IKEI H , IGARASHI M , et al.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of young males during spring-time walks in urban parks [J]. Journal of Physiological Anthropology,2014,33(1):1-8.

[15] SONG C R , IKEI H , IGARASHI M , et al.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a walk in urban parks in Fal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5,12(11):14216-14228.

[16] SONG C R , IKEI H , KOBAYASHI M , et al. Effects of viewing forest landscape on middle-aged hypertensive men [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2016(21):247-252.

[17] KOMORI T , MITSUI M , TOGASHI K , et al. Relaxation effect of a 2-hour walk in Kumano-Kodo forest [J]. Journal of Neurology and Neuroscience,2017,8(1):174.

[18] ANTONELLI M ,BARBIERI G , DONELLI D . Effects of forest bathing (shinrin-yoku) on levels of cortisol as a stress biomark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meteorology,2019(63):1117 - 1134.

[19] 张沁怡,张稼闻,邬素芳.基于自然杀伤细胞的免疫治疗在卵巢癌中的研究进展[J].现代妇产科进展,2020,29(2):150-153.

[20] LI Q . Visiting a forest, but not a city, increases human natural killer activity and expression of anti-cancer protei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munopathology and Pharmacology, 2008, 21(1):117–127.

[21] LI Q , MORIMOTO K , KOBAYASHI M , et al. A forest bathing trip increases human natural killer activity and expression of anti–cancer proteins in female subjects[J]. Journal of Biological Regulators and Homeostatic Agents, 2008,22(1):45–55.

[22] SONG C R , IKEI H , KOBAYASHI M , et al. Effect of forest walking on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ctivity in middle–aged hypertensive individuals: A pilot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5,12(3):2687–2699.

[23] SUNG J , WOO J M , KIM W , et al.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based forest therapy program on blood pressure, salivary cortisol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J].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ypertension,2012,34(1):1–7.

[24] OCHIAI H , IKEI H , SONG C , et al.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forest therapy on middle–aged males with high–normal blood press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5,12 (3): 2532–2542.

[25] OCHIAI H , IKEI H , SONG C , et al.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a forest therapy program on middle–aged femal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5, 12(12): 15222–15232.

[26] BIELINISE , TAKAYAMA N , BOIKO S , et al. The effect of winter forest bathing on psychological relaxation of young polish adults [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2018 (29):276–283.

[27] IGARASHI M , MIWA M , IKEI H , et al.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viewing a kiwifruit (Actinidia deliciosa Hayward) orchard landscape in Summer in Japan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5,12(6):6657–6668.

[28] BERMAN M G , JONIDES J , KAPLAN S . The cognitive benefits of interacting with nature[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19(12):1207–1212.

[29] BERMAN M G , KROSS E , KRPAN K M , et al. Interacting with nature improves cognition and affect for individuals with depression [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12,140 (3):300–305.

[30] RYAN R M , WEINSTEIN N , BERNSTEIN J , et al. Vitalizing effects of being outdoors and in nature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10(30):159–168.

[31] BARTON J , PRETTY J . What is the best dose of nature and green exercise for improving mental health: A multi–study analysis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0,44(10):3947–3955.

[32] TYRVAINEN L , OJALA A , KORPELA K , et al. The influence of urban green environments on stress relief measures: A field experiment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4,38(1):1–9.

[33] MAO G X , LAN X G , CAO Y B , et al. Effects of short–term forest bathing on human health in a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J]. Bi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12,25(3):317 – 324.

[34] MAO G X , CAO Y B , LAN X G , et 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forest bathing on human hypertension in the elderly [J]. Journal of Cardiology,2012,60(6):495 – 502.

[35] PARK B J , TSUNETSUGU Y , KASETANI T , et al.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Shinrin–yoku (taking in the atmosphere of the forest):Using salivary cortisol and cerebral activity as indicators [J]. Journal of physiological anthropology,2007,26 (2):123 – 128.

[36] PARK B J , TSUNETSUGU Y , ISHII H , et al.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Shinrin–yoku (taking in the atmosphere of the forest) in a mixed forest in Shinano Town, Japan[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Forest Research,2008,23(3):278 – 283.

[37] PARK B J , TSUNETSUGU Y , KASETANI T , et al.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forest recreation in a young conifer forest in Hinokage Town, Japan [J]. Silva Fennica, 2009, 43 (2): 291–301.

[38] SONG C R , IKEI H , MIYAZAKI Y .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nature therapy: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in Japa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6,13(8):781.

[39] KOTERA Y , RICHARDSON M , SHEFFIELD D . Effects of Shinrin–yoku (forest bathing) and nature therapy on mental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2022, 20 (1):337–361.

[40] TAKAYAMA N , MORIKAWA T , KOGA K , et al. Exploring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digital

Shinrin-yoku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s a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22,19(3):1202.

[41] ZABINI F , ALBANESE L , BECHERI F R , 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storative effects of forest and urban videos during COVID-19 lockdown: Intrinsic and benchmark valu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17(21):8011-8019.

[42] REESE G , STAHLBERG J , MENZEL C . Digital Shinrin-yoku: Do nature experiences in virtual reality reduce stress and increase well-being as strongly as similar experiences in a physical forest [J]. Virtual Reality,2022,26 (3):1245-1255.

[43] BROWN D K , BARTON J L , GLADWELL V F . Viewing nature scenes positively affects recovery of autonomic function following acute- mental stress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3,47(11) :5562 - 5569.

[44] BROWNING M H , MIMNAUGH K J , VAN RIPER C J , et al. Can simulated nature support mental health: Comparing short, single-doses of 360-degree nature videos in virtual reality with the outdoors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10.

[45] GAMBLE K R , HOWARD J H J R , HOWARD D V . Not just scenery: Viewing nature pictures improves executive attention in older adults [J]. Experimental Aging Research, 2014,40(5):513-530.

[46] HANSEN M M , REO J , KIRSTEN T . Shinrin-yoku (forest bathing) and nature therapy: A state-of-the-art re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7, 14(8):851-858.

[47] LEE I , CHOI H , BANG K S , et al. Effects of forest therapy on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7,14(3):321-330.

[48] 郭诗宇,汪远洋,陈兴国,等.森林康养与康养森林建设研究进展[J].世界林业研究,2022,35(2):28-33.

(责任编辑:叶丽娜)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Forest Health Research

LI Hongyun[1], WAN Quan[1], XU Hong[1], WANG Lanlan[2]

(1.Department of Forestry, 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Nanping, Fujian 353000;
2.School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Taking 312 papers on forest health theme collected by Web of Scie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knowledge bas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in this field were visualized by CiteSpace software. The course and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forest health research were systematically combed,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field was in a rapid growth stage. Japan, South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Italy and China(Mainland) have strong research strength ;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demonstrating the benefits of forest health to different populations and different disease typ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VID-19,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forest health shows a hot trend, and digital forest health has also been concerned by scholars.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it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different stands on human health,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 environment and local culture,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forest health in the context of active aging.

Key words: forest health; CiteSpace; hot frontier; evolution context; trend prospect

森林康养背景下三明市体育旅游的成效、困境与优化路径

张凌阁，马荣超

（三明学院 体育与康养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实地考察法等研究方法，以三明市森林康养与体育旅游发展路径为研究对象，以提高森林康养背景下三明市体育旅游成效为目的。目前，三明市体育旅游方兴未艾，政府高度重视体育旅游在森林康养背景下的发展，立足文旅资源优势，做足“红绿”赛事文章，打造绿水青山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制定并实施“体育+”工程。三明市森林康养体育旅游拥有生态、品牌、客家民俗、朱子故里、苏区红色文化等优势，然而却存在特色资源开发、产业人才不足、创新宣传不够与体育路径模式创新不足等困境。鉴于此，提出要创新体育+模式，用人才带动产业振兴，完善产业链，以区域合作推动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以期助力森林康养背景下三明市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森林康养；体育旅游；红色文化；客家民俗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31-05

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积极实施体育旅游示范工程，对旅游示范景区“体育+旅游”的活动进行鼓励、支持和引导，发展出高质量高成效的体育旅游示范基地。2019 年 3 月 6 日，在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中指出，在 2035 年，建成覆盖全国的森林康养服务体系，让百姓充分享用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红利与康养服务。在此基础上，三明市抓准机遇，根据“意见”指示，制定多个森林康养旅游发展文件，以体育旅游为突破，以苏区红色体育赛事、客家民俗体育、朱子故里赛事活动和传统体育赛事为契机，实现森林康养与体育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产业融合的新格局。三明市具备先天优势，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具有国家森林重点林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被誉为中国绿色之都，森林覆盖率达到 78.14%，森林康养发展的资源条件优越。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到三明考察，甚至在 1997 年 4 月，他在将乐县常口村调研提出“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的理念。国家、地市政策文件的出台也印证了森林康养与体育旅游的融合是未来我国产业融合发展主要趋势之一，因此，本研究旨在森林康养背景下，探索符合山区和革命老区自身实际的体育旅游新路径。

一、概念界定

（一）森林康养

森林康养是以丰富多彩的森林景观、清新的森林空气环境、健康安全的森林食品、丰富的生态文化等为主要资源支撑，结合森林观赏、静养、体验、娱乐、运动、饮食等，帮助到访者放松身心，调节身体机能，增进(维持) 其身心健康[1]。

（二）体育旅游

体育旅游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从事的各种体育娱乐、体育锻炼、体育比赛、体育康复、体育文化交

收稿日期：2022-04-15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20C041)；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统一战线专项)(KC21054S)。

作者简介：张凌阁(1993-)，男，汉族，助教，主要从事学校体育、体育旅游研究。

通讯作者：马荣超(1987-)，男，满族，副教授，主要从事高校体育教学、体育产业研究。

流等与旅游地、体育旅游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总和[2]。所以体育旅游是一种将体育与旅游相结合的健身方式。

二、体育与森林康养旅游路径的基础条件

(一)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三明市地处福建省西北部，闽中与闽西北交界处,东与福州的闽清、永泰相邻;东南与泉州德化、永春相邻;西南与龙岩的漳平、连城、长汀相邻;北部与南平的邵武、顺昌、延平相靠;西北部与江西的石城、广昌、南丰、黎川交界。三明机场已开通多个重要城市的航线,北京到三明仅 3.0 小时、广州到三明仅 1.5 小时航程。三明机场到三元、梅列、尤溪、将乐、泰宁在 1 小时车程之内,龙岩连城机场到三明的宁化、清流、明溪、永安等约 1 小时车程。南龙铁路、向莆快速铁路通车后,福州、厦门与三明之间约 2 小时车程。境内长深、富银、全南、沙峡、建台、张永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实现县县高速快捷便利的交通条件。

(二)气候温润适宜,含氧量高

三明市年平均气温 17~19.4℃，森林负氧离子平均浓度达到 1500 个/cm^3。建宁、明溪等 7 个县空气质量位居全省县级市前十位,尤溪、沙县等 6 个县入选“中国深呼吸小城镇百佳”,被认定为国家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城市。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78.14%。空气、水、土壤质量位居全国前列。

三、森林康养背景下体育旅游发展的主要成效

(一)产品内容丰富,助力森林康养体育旅游发展

三明市旅游内容丰富,民俗体育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体育特色刚好满足游客的潜在需求,成为热门的旅游新产品。建宁岷江原生态旅游区、泰宁寨下大峡谷、梅列仙人谷生态旅游区等以生态旅游为代表。结合森林康养,以建宁修竹荷苑、桃、梨园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业旅游和乡村旅游;以尤溪朱子文化园为代表的文化旅游;以泰宁尚书第、泰宁古城为代表的古建筑旅游;以宁化天鹅洞、永安桃园洞、将乐玉华洞为代表的奇特洞穴旅游;以建宁绿田实业、文鑫莲业等为代表的工厂旅游等。这些项目均融入森林康养下的体育旅游,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特色。

2021 年,结合建党 100 周年,三明市在加强与原中央苏区各城市体育赛事的交流互动中,共同打造苏区赛事联盟品牌,举办近百场“红色”体育赛事。有“风展红旗如画”“红骑”“传承红色基因”“龙栖山山地赛道”等多项红色精品赛事。2021 年 12 月 25 日,三明市首个绿水青山运动消费季系列活动之一——大田县第三届红色康养茶海跑活动成功举办。

(二) 注重产业规划,政策措施助推森林康养旅游

“ 绿都” 三明市作为全国林改试点市,积极对接国家四部委的森林康养产业政策,三明市政府高度重视森林产业的开发,在政策扶持上以及发展规划都做出明确实施方案,发挥政府扶持政策的产业“靶向性”作用[3],实现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4]。这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为森林康养背景下三明市体育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如表 1 所示。

表 1 近三年颁发的有关森林康养与旅游政策法规

Tab.1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n forest health care and tourism issued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日期	名 称	内 容
2019 年	《三明市支持文旅康养产业加快发展政策措施通知》	发挥三明生态资源优势、带动关联产业,2020 年文旅康养收入达 900 亿元，其中康养收入 150 亿元
2019 年	《三明市发展全域森林康养产业的意见》	在全市统一打造“最氧三明·康养福地”品牌
2020 年	《三明市全域森林康养产业 “十四五”发展规划》	通过宣传引导、科研推动、试点探索、项目孵化、品牌塑造,开拓森林康养产业发展路径
2021 年	《三明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改革发展专项规划》	突出文化自信和文旅融合,统筹考虑新供给，创新发展路径，以塑造新动力和调整发展模式为核心，以凸显文化和旅游社会综合价值
2021 年	《三明市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努力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融合推进国家体育消费示范城市发展,争创国家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2021 年	《三明市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实现全市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 6%,积极争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
2021 年	《三明市 2021 年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培育文旅消费业态、丰富文旅消费产品、提升文旅消费服务、加大文旅消费营销、发展假日和夜间经济、优化文旅消费环境

(三)深挖文化内涵,因地制宜有效结合

在森林康养推行的进程中,三明市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特色文物、传统村落、民族村落、农业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发展特色体育旅游文化,形成各类体育旅游产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客家民间体育文化、朱子文化和红色文化。(1)三明是客家人聚集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客家民俗体育资源。三明客家民俗体育活动以家族或村庄为中心,伴随着客家人的生产和生活,客家文化以其独特的民居文化、民俗艺术、饮食文化、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服饰文化、精神文化等赋予地方文化资源。民俗体育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体育特色刚好满足了游客的潜在需求,成为热门的旅游新产品,如三明赖坊镇和紫云村等明清古建筑群,因有了客家人的民俗体育活动而使其客家地域特色更加丰富和生动。人们通过宁化古游傩的由来故事,了解古游傩的历史文化,通过傩舞节庆狂欢的体验,游客能够亲自经历和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世界,傩舞仪式举行的地点是在宗族古祠里,游客同时可了解古祠的建筑文化[5]。民俗体育节庆文化和运动体验后高昂的情绪与疲惫的身体,带动康养实效和食宿消费的最佳保障[6]。因此,旅游需求的变化是民俗体育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够丰富旅游产品,进而满足消费者对旅游市场的多元化需求。(2)“朱熹诞生地”这张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赋予了尤溪县“朱子文化氛围浓厚的旅游胜地”之称。三明尤溪是朱熹的诞生地,是朱子文化的发源地和重要传播地,有着朱子文化旅游的先天优势。尤溪县利用品牌优势曾举办过朱熹祭祀大典,是集歌、舞、礼、乐为一体,大型庙堂祭祀表演活动。在传承朱子文化上,尤溪始终坚持古为今用,融入道德建设,开展“四进”活动。进入干部队伍、进校园、进社区家庭、进企事业单位,弘扬朱熹的为官、育人、治家和处世做人之道[7]。(3)突出红色资源优势,打造苏区文化新品牌。红色体育旅游是红色旅游与体育旅游深度融合的产物,它结合了红色旅游和体育旅游的特点,将旅游者爱国教育和体育活动的需求或动机融入旅游[8]。三明红色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建宁、泰宁、宁化、永安、清流等县市,资源分布较为均衡。三明红色旅游发展包括泰宁“红军街”、建宁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园、宁化县红军医院纪念园、长征集结出发地、北山革命纪念园等,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相关的体育融合旅游。打造凸显文化烙印的地方特色产品[9]。

四、森林康养背景下体育旅游发展存在的困境

(一)森林康养体育旅游创新模式不足

三明市立足自身在医改、林改、金改等方面的优势,应积极推进体育融合工程。通过将体育康养融合发展,使体育消费释放更大的活力,融入森林康养,拓展健康理念。发挥森林资源优势,以评促建,以奖促优,引导各基地依托独特自然禀赋开展差异化经营,为市民提供更加丰富的体育旅游产品,要以赛事活动做引资,发展体育文化旅游,延长体育产业链条。通过办好精品赛事,为文化旅游聚汇聚人气,提升知名度,打造文体旅多元共生的综合体。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以及进行实地考察,三明市森林康养体育旅游创新性不强,活动单一,未能达到“一县一品”的赛事活动要求。有些地方体育活动基本相似,因旅游产品内容相同,游客仅会择定其中 1~2 个县进行目的性游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客流量和旅游产业的收益率。特色体育旅游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体育有关的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过少,种类单一,久而久之对游客的吸引力减小,造成地域旅游竞争活力下降。

(二)人才队伍相对薄弱

通过对政府相关文件解读与访谈发现三明市森林康养体育旅游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与产业发展的需求相比,创新人才、专业人才比较少,经营管理技术不成熟。要引进专业化的管理服务团队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提升景区、基地的运营管理水平。人才队伍以及后备人才不足,将会导致体育旅游模式只注重短期效益,缺乏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和规划,影响了体育旅游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随着体育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社会急需大量体育旅游专业人才,体育旅游人才供需矛盾日益突出[10],要做到专业人做专业事。

(三)体验式红色体育旅游主题公园缺失

通过实地走访三明市以红色体育旅游为基础的赛事缺乏体验式,很难让旅游者从身心来感受产生情

感共鸣。导游讲解水平参差不齐、市场满意度不高、体验性项目少、红色旅游文化的社会效益尚未有效体现。在旅游者体验需求不断增长的今天,依托自然环境,增强旅游者在红色旅游过程中的参与感、交互感显得尤为重要。

五、森林康养背景下体育旅游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以“体育+”为重点推进模式创新

三明市立足自身在“医改”“林改”“金改”等方面的优势,应积极推进“体育+”融合工程,通过将体育与医疗、康养、旅游、互联网等融合发展,融入森林康养,扩宽理念。发挥森林资源优势,以评促建,以奖促优,引领各基地依托独特自然禀赋看展差异化经营。融入医养环节,拓展体育消费空间。可与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合作,依托医改基础,开展改革试点,建设“体医融合”试点医院,推动市级以上森林康养基地,健康管理中心高质量建设,配齐自助检测一体机、运动体质检测仪,兼具与医保有关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急救药品等设备设施,建设中医康复场所,配备理疗床、TDP 治疗仪、针灸针、拔火罐、中药浴等康复理疗设施和中医提质检测仪,符合条件的可申请纳入医保定点。安排职业中医师值班坐诊,对进入和离开基地康养人员进行常规指标检测,并做好登记管理。医生要与体育工作者有机结合,通过“体医融合”机制,开出具有成效的“双处方”,并提供健身指导,通过体医融合模式,增加体育旅游人群,扩大体育旅游市场空间。使游客们既能在森林康养的环境下进行体育活动,又能通过体医结合干预慢性病,这样才能达到“氧”“体”“旅”相融合,打造“体育+”的旅游品牌。

(二)聚集产业人才,高质发展

三明市文旅康养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与产业发展的需求相比,创新人才、专业人才比较少,经营管理技术不成熟。要引进专业化的管理服务团队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提升景区、基地的运营管理水平。用好《三明市进一步加快人才集聚若干措施》《三明市文旅康养主导人才考核办法》等相关文件的作用。同时,发挥三明学院开设康养、旅游和运动康复相关专业,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开设健康护理相关学科和专业作用,践行产教融合的办学理念,实现文旅、体育、康养人才培养与相关产业实践服务无缝对接。

(三)传承红色基因,有机结合

在森林康养背景下,三明市要推进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把握相应的穿越挑战,将体育旅游特色融入红色旅游,使旅游活动更具参与性、体验性、趣味性,打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旅游产品。用好“中国绿色之都”、国家森林城市、优秀旅游城市。利用自行车比赛、攀岩比赛、登山比赛、长征路重游等休闲娱乐健身项目,丰富旅游活动内容。让游客在体验中自觉参与到革命圣地保护中来,珍惜红色文化遗迹和周边生态环境,通过红色旅游实践达到育人的目的,真正实现体育、红色文化和森林健康的有机结合。

(四)健全产业链条,合理开发

以三明市 5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 个国家森林公园和一批国有林场老场部、旧工区等场地为重点,大力发展森林康养旅游产品,支持大田“茶美人”景区高山茶园康养、建宁“莲海玉家”荷苑康养、泰宁境元茶舍“森林+精心修养”、沙县马岩山庄“夕阳红”休闲养生、将乐龙栖山康养小镇等特色康养产品持续健康发展。推动泰宁滨湖生态康养公园、宁化天鹅湖洞洞天福地森林康养项目、尤溪闽湖康养度假小镇、清流九龙湖康养基地、永安上坪天斗(霞鹤)森林康养基地、小陶玉带温泉森林康养基地、永安山地自行车森林康养基地等休闲旅居、生态观光、山地运动、自然观鸟、培训研学等康养业态完善发展。加大运动森林康养示范基地宣传推广力度,推广“一县一品”体育赛事,助推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五)以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发展新格局形成

首先,持续实施“引客入明”行动,着力加强与上海区域协作力度和质量,并组织策划文旅精品路线,分别出台面向福建省内、闽粤赣、长三角、京津冀重点地区的职工、专家疗养优惠政策。争取国铁集团开通上海、深圳至三明旅游专列。其次,在福建省内打造闽西南文化旅游圈,在省外突出加强与上海、北京文旅主管部门、旅游行业协会合作,吸引大城市人群特别是中老年群体来明疗养旅游。同时,探讨资源互换、客源互送合作机制深化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最

后要搭建平台促营销,统一策划、注册“中国绿都·最氧三明”普通商标和集体商标,设计森林康养基地LOGO和宣传漫画,将“中国绿都·最氧三明”作为森林康养对外宣传品牌。发展绿色优势,做好文体旅融合文章,做好体育旅游精品路线推广,持续打造绿水青山体育消费季、三沙永、穿越城市马拉松、水上赛事等相关活动。

六、结语

森林康养产业方兴未艾、前景广阔,森林康养产业发展优势日趋明显。新征程上,要乘势而上,做大做强森林康养产业,是全民共享生态建设成果、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最佳典范,是落实“两山”理念的途径之一。森林康养与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森林养生与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既可以拓宽旅游渠道,又可以激发体育资源,是“互利共赢”的新局面。新征程上,要创新“体育+”模式,用人才带动产业振兴,完善产业链,以区域合作推动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推动森林康养背景下体育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朝望,王道阳,乔永强.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探究[J].林业资源管理,2017(2):93-96,156.

[2] 范亚东,曹秀霞.政府扶持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3):44-47,142.

[3] 高晓雯.关于我国体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府扶持政策研究[J].科技风,2015(21):256.

[4] 吴莲花,林丽芳.客家民俗体育与乡村旅游融合路径研究:古傩大源生存之道的田野考察[J].武夷学院学报,2021,40(8):75-79.

[5] 刘晓明.产业融合视域下我国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14,34(5):187-192.

[6] 严莉.打响朱子文化品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福建尤溪为例[J].商业故事,2017(3):170-171.

[7] 赵金岭,张淑香.赣南苏区红色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研究[J].特区经济,2020(4):103-107.

[8] 顾怡然,代红兵,李晋龙.乡村振兴战略下西南边疆民族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J].体育文化导刊,2021(10):78-83.

[9] 王世军. 黄河流域乡村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化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1,41(5):40-44.

(责任编辑:白 琳)

The Effect, Predicament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Sports Tourism in Sanming 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rest Health

ZHANG Lingge, MA Rongchao

(School of Sports and Health,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Abstract: Us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metho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tak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anming forest health and sports touris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sports tourism in Sanming 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rest health and tourism,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Sanming sports tourism is in the ascendency. The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rest health and conservation.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t makes articles on "red and green" games, creates a series of sports consumption season activities with clear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nd develops and implements the "Sports +" project. Conclusion: Sanming forest health sports tourism has the advantages of ecology, brand, hakka folk custom, hometown of Zhu Zi, red culture in Soviet area and so on.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the lack of industrial talents, the lack of innovation publicity and the lack of innovation of sports path mode. In view of this, it is proposed to innovate sports + mode, use talents to driv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mprove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by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help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in Sanming 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rest health.

Key words: forest recreation; sports tourism; red culture; Hakka folklore

企业内员工沉默与组织承诺的关系

林思荻

（福建师范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摘 要：旨在研究企业内员工沉默和组织承诺与人口统计变量之间的联系，以及员工沉默和组织承诺的相关性。研究使用员工沉默量表和组织承诺量表分别评估员工沉默和组织承诺，使用独立样本检验、方差分析和皮尔逊相关分析数据来检验员工沉默与组织承诺之间的相关性，证明了员工沉默与组织承诺在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下的员工中存在显著差异，员工沉默与组织承诺呈负相关。

关键词：员工沉默；组织承诺；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36-05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日益激烈的人力资源竞争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员工在企业组织关系中的参与程度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影响较大[1]。其中，员工沉默是研究企业组织关系和工作效率的重要话题[2]，员工沉默行为可能会影响企业决策的实施，对企业效能发展造成障碍。而组织承诺则反映了员工对于组织的认同感，组织承诺水平高的员工流动率低，更加稳定[3]，能提高企业的组织效能，对企业运营产生积极影响。近年来，尽管关于员工沉默与组织承诺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加，但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的实证研究较少，针对特定行业的研究仍然存在空白。笔者以三家互联网企业320名员工作为研究对象，检验企业内员工沉默与组织承诺在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下的差异，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文献综述

（一）员工沉默

Morrison 和 Milliken 最早将员工沉默定义为一种“集体现象”，员工对于组织中的潜在问题保留自己的看法和建议[4]。Pinder 和 Harlos 认为，沉默行为是员工对于不公正的工作环境的反馈[5]。Dyne，Ang 和 Botero 进一步指出，员工沉默是具有特定目的的、有意识的行为，员工保持沉默是为了避免给自己的工作带来负面影响[6]。我国学者郑晓涛等认为，员工会出于各种原因保留或者提炼自己的观点，因此员工沉默是一种动机复杂的行为[7]。

Dyne，Ang 和 Botero 将员工沉默划分为默许性沉默、防御性沉默与亲社会性沉默[6]。Knoll 和 Dick 则提出了四维模型，引入机会性沉默的概念，即员工为了得到特定机会保持沉默[8]。Brinsfield 提炼出员工沉默的六个维度，包括无效性沉默、相关性沉默、自卑性沉默、逃避性沉默和异常性沉默[9]。郑晓涛等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员工沉默在不同年龄、职位、教育经历和公司类型的员工中存在显著差异，并据此编制了中国企业员工沉默量表，提出默许性沉默、漠视性沉默和防御性沉默三个维度[7]。综合文献，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 受访者的员工沉默在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二）组织承诺

组织承诺最早由 Becker 提出，他认为组织承诺是组织与员工的一种契约，并与员工的经济利益息息相

收稿日期：2022-07-16

作者简介：林思荻（1995-），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中文教育、企业管理研究。

关[10]。Meyer 和 Allen 则将组织承诺解释为个人对组织的认同感与参与度[11]。凌文铨等认为组织承诺解释了员工留在企业的原因和态度。组织承诺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各国学者采取不同研究方法对组织承诺进行定义和探索,但多数研究者认同组织承诺可以衡量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12]。

Becker 最初将组织承诺定义为单维结构[10],Meyer 和 Allen 则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情感承诺、持续承诺和规范承诺的三维度模型[11]。凌文铨根据实证研究,提出中国企业员工组织承诺五维度模型,并讨论了组织承诺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与工资、福利等经济因素相比,组织承诺受价值观、道德等情感因素的影响更大[12]。此外,吴慈生等认为员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工作时间等会影响员工的组织承诺[13]。根据前文,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 受访者的组织承诺在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三)员工沉默与组织承诺的关系研究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员工沉默和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Fard 和 Karimi 以员工承诺与工作满意度为中介变量,研究员工沉默与组织内信任的联系[14]。Cetin[15],Dedahanov 和 Rhee[16],Pradipto 以及 Chairiyati[17] 分别在土耳其、韩国与印度尼西亚开展实证研究,探索员工沉默对组织承诺的影响。在国内,付琼针对知识型员工的实证研究发现,持续性承诺与员工沉默行为显著相关[18]。夏雪艳分析了员工沉默、组织承诺和组织信任之间的关系[19]。何丽红等分析并验证了员工沉默与组织承诺之间的关联,认为员工沉默的所有子维度都与组织承诺有显著关系[20]。李志和张宇进行了员工沉默的后效研究,探讨员工沉默对其他员工行为及企业管理带来的影响[21]。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3:

假设 3 受访者的员工沉默对组织承诺有显著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使用结构化量表进行随机抽样调查。问卷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学变量信息调查,包括年龄、性别、职位、婚姻状况、平均月收入、学历和工龄。第二部分参考郑晓涛等[7]的员工沉默量表与凌文铨等[12]的组织承诺量表编制而成。员工沉默量表从默许性沉默、漠视性沉默、防御性沉默三个维度进行测量;组织承诺量表则覆盖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和机会承诺五个维度。上述问卷采用李克特六点量表,从 6 分至 1 分分别表示“完全同意”“同意”“基本同意”“基本不同意”“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六个层次。根据 Chomeya[22],Nemoto 和 Begla[23]等人的研究,六点量表具有更高的区分度与信度,减少了量表的中立选项,使受访者的倾向更加明显。

(二)数据收集

调查于 2021 年 3 月在福建省福州市三家互联网企业开展,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问卷 380 份,排除不合格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320 份,有效回收率 84.2%。研究使用 SPSS21.0 软件分析问卷信度,然后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员工沉默与组织承诺在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下是否有显著差异,最后使用相关分析检验员工沉默与组织承诺的相关关系。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信度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分析信度,结果显示员工沉默量表的 α 系数为 0.909,而默许性沉默、防御性沉默、漠视性沉默三个维度的系数分别为 0.875、0.831 和 0.869;组织承诺量表整体的 α 系数为 0.947;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机会承诺 5 个维度的系数分别为 0.896、0.820、0.901、0.889 和 0.938。可以看出,两份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大于 0.8,属于高信度,结果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员工沉默量表的 KMO 检验值为 0.929,组织承诺量表的 KMO 检验值为 0.924,均在 0.9 以上,说明效度较好,数据可被提取有效信息。

(二)描述性统计

研究对象包括男性 185 人,占 57.81%;女性 135 人,占 42.19%。20 岁以下员工有 24 人,占 7.50%;21~30 岁的员工 192 人,占 60.00%;31~40 岁的员工 88 人,占 27.50%;41 岁以上员工 16 人,仅占 5.00%。从

学历来看,本科及以上员工 231 人,占 62.82%;从平均月收入来看,月薪 6000 元以上员工最多,占 31.56%;从婚姻状况来看,61.56%的员工未婚;从工龄来看,工龄一年以内的新员工占 37.50%, 工龄五年以上的员工占 35.00%。

员工沉默的均值为 3.23,默许性沉默、防御性沉默、漠视性沉默的均值分别为 3.49,3.24 和 2.97。员工沉默行为的频率中等偏低,但其中默许性沉默行为最为频繁, 即员工认为即使表达看法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因此被动地保留自己的意见。对比其他在国内外进行的员工沉默行为研究,我国员工具有较高的默许性沉默行为,符合我国社会高权力距离的文化特征[24]。

组织承诺的均值为 3.66,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机会承诺的均值分别为 3.60,3.83,4.06,3.49 和 3.31。员工整体组织承诺较高,其中理想承诺的得分最高,体现了受访者更看重个人在组织内的发展与进步空间。另一方面,受访者的机会承诺和经济承诺的均值较低。由于互联网行业技术类岗位较多[25],员工只要拥有过硬的技术能力就不难获得新工作,因此当员工选择留在当前公司,更多是出于与公司的情感联系、职业道德或个人追求,并不完全因为薪酬水平或难以寻找其他工作机会。

员工沉默和组织承诺量表均为正向计分量表,二者的均值在中间值 3.5 的两侧, 有利于检验本研究的假设。统计结果还表明,大多数受访者的答案集中于 3(“基本不同意”)和 4(“基本同意”),而非 1(“完全不同意”)或 6(“完全同意”),这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有一定差异,我国企业员工即使有明显倾向,也会尽可能地避免极端答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背景造成的影响[2]。

(三)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性别与员工沉默之间关系。员工沉默及其默许性沉默、防御性沉默、漠视性沉默三个维度的 Sig 值分别为 0.498,0.525,0.725 和 0.478,均大于 0.05,即男性和女性员工在员工沉默及其三个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然后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其他因素与员工沉默之间关系,在所有人口统计变量中,员工沉默行为在不同年龄(Sig.=0.043)、职位(Sig.=0.024)、婚姻状况(Sig.<0.001)和平均月收入(Sig.=0.031)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教育程度(Sig.=0.233)和工龄(Sig.=0.115)上无显著差异。

因此假设 1 部分成立,即受访者的员工沉默在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性别因素与组织承诺之间关系。组织承诺及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机会承诺的 Sig 值分别为 0.405,0.580,0.244,0.500,0.692 及 0.508,均大于 0.005,即男性和女性员工在组织承诺及其五个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然后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其他因素与组织承诺之间关系,在所有人口统计变量中,组织承诺行为在不同婚姻状况(Sig.=0.019)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职位(Sig.=0.066)、平均月收入(Sig.=0.222)、教育程度(Sig.=0.597)和工龄(Sig.=0.064)上无显著差异。

上述分析得出假设 2 部分成立,即受访者的组织承诺在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研究设计,本研究对员工沉默三个维度与组织承诺的五个维度之间进行相关系分析,得出结果如下:员工沉默与组织承诺的相关性系数为–0.249。默许性沉默与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机会承诺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178,–0.212,–0.178,–0.291 和–0.168,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防御性沉默与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机会承诺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176,–0.238,–0.224,0.004 和 0.129,防御性沉默与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漠视性沉默与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机会承诺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342,–0.405,–0.402,–0.121 和–0.137,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通过数据分析,假设 3 成立,即受访者的员工沉默对组织承诺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问卷调查等方式,探讨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员工沉默和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获得主要研究结论:受访者的员工沉默行为与组织承诺在不同年龄、职务、婚姻状况、平均月收入、工龄下存在显著的差异。受访者的员工沉默与组织承诺呈显

著负相关,即沉默行为频率较低的员工具有较高的组织承诺。

回顾本研究的过程和结论可以发现,员工的沉默行为会降低其组织承诺水平,企业想提升员工的组织承诺,就要求管理者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法减少员工的沉默行为,以降低人才流失,助力企业发展。根据文献和实证研究结果,笔者对企业的管理实践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识别沉默行为频率较高的员工群体。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职位较低、工龄较短或年轻的员工沉默行为更频繁。互联网企业员工往往具有年轻化、流动性高的特点[25],因此管理者应根据员工的群体类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如对新员工加强一对一沟通、对职位较低的员工采取一定激励措施,鼓励员工积极提出建议,减少员工沉默行为,从而加强员工的组织承诺。

第二,建立健全良好的沟通渠道。员工沉默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直接有效沟通渠道,难以获得反馈。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建议机制,创建隐私性更强的反馈渠道[26],减少员工建言顾虑,设置合理的意见反馈周期,让员工感到被重视,增强对企业的认同感。

第三,创造和谐的组织氛围。员工沉默是影响组织承诺的因素之一,但良好的组织氛围才是员工产生认同感、提高组织承诺的关键因素。管理者要关注企业内的人际关系,及时了解员工态度,进行恰当的引导,避免形成高压的组织氛围。同时提供实际性的福利措施和合理的发展渠道[27],提高员工效用水平,培养员工的组织归属感。

本研究对于我国员工的沉默行为和组织承诺研究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但研究中也存在不足。除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外,公司行业、地点和性质也会对员工的行为产生影响,但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一定局限性,如果针对更大范围的受访者在不同行业展开探究,可以提高受访者的代表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探讨了员工沉默作为前因变量对组织承诺的影响,未来可引入其他后果变量,或工作满意度、员工流动率等中介变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索。

参考文献:

[1] 杨皖苏,赵天滋,杨善林.差序式领导、自我效能感与员工沉默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雇佣关系氛围与组织结构有机性的调节作用[J].企业经济,2018,37(10):110-119.

[2] 王丽萍,曾祥龙.组织认同能打破沉默行为吗?:基于面子观念的调节作用[J].商学研究,2020,27(4):103-109.

[3] 秦晓军.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与离职倾向关系的研究综述[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6(7):42-44.

[4] MORRISON E W,MILLIKEN F J.Organizational Silence:A Barrier to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a Pluralistic World[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4):706-725.

[5] PINDER C C,HARLOS K P.Employee Silence:Quiescence and Acquiescence as Responses to Perceived Injustice[M]//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Leeds: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2001:333.

[6] DYNE L V,ANG S,BOTERO I C.Conceptualizing Employee Silence and Employee Voice as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 [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3,40(6):1359-1392.

[7] 郑晓涛,柯江林,石金涛,等.中国背景下员工沉默的测量以及信任对其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8(2):219-227.

[8] KNOLL M , DICK R V.Do I Hear the Whistle…? A First Attempt to Measure Four Forms of Employee Silence and Their Correlate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3(113):349-362.

[9] BRINSFIELD C T.Employee Silence Motives:Investigation of Dimensionality and Development of Measures[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13,34(5):671-697.

[10] BECKER H S.Notes on The Concept of Commitment[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0,66(1):32-40.

[11] MEYER J P,ALLEN N J.A Three-Component Conceptu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1991,1(1):61-89.

[12] 凌文辁,张治灿,方俐洛.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1(2):90-102.

[13] 吴慈生,赵静,江涛.新生代员工的组织承诺结构及其对离职倾向的影响[J].人力资源管理评论,2014(1):32-46.

[14] FARD P G, KARIMI F.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Organizational Silence with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the Employees of University[J].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2015,8(11):219-227.

[15] CETIN A.Organizational Silenc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A Study of Turkish Sport Managers[J].Annals of

Applied Sport Science,2020,8(2):e830.

[16] DEDAHANOV A T,RHEE J.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rust,Silenc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J]. Management Decision,2015,53(8):1843-1857.

[17] PRADIPTO Y D,CHAIRIYATI L R.The Role of Authentic Leadership,Self-Efficacy,Job Satisfaction and Employee Silence to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mong Millennials[A]// IOP Conference Series: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C]. Bristol:IOP Publishing,2021,729(1):012092.

[18] 付琼.知识型员工沉默行为对组织承诺影响的实证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3.

[19] 夏雪艳.酒店企业员工的组织内信任、沉默行为与组织承诺的关系研究[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3(24):135-137.

[20] 何丽红,张文娟,杜军丽.企业组织沉默对组织承诺影响的实证研究[J].企业活力,2011(10):66-71.

[21] 李志,张宇.员工沉默对职业倦怠的影响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24(3):103-112.

[22] CHOMEYA R.Quality of Psychology Test between Likert Scale 5 and 6 Points[J].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2010,6(3): 399-403.

[23] NEMOTO T,BEGLAR D.Likert-scale Questionnaires[A]// JALT 2013 Conference Proceedings[C].Tokyo:JALT Publications,2014:1-8.

[24] HUANG X,VAN DE E,VAN DER G.Breaking the Silence Culture:Stimulation of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ee Opinion Withholding Cross-Nationally[J].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5,1(3):459-482.

[25] 欧贤,邓岩.互联网企业离职员工管理策略研究:以腾讯公司为例[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1,4(1):151-154.

[26] 干燕丹,狄建忠,罗莉,等.通过智慧管理改善员工沉默行为[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22(3):96-99.

[27] 殷冬梅.员工福利对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影响:基于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视角[J].现代营销(下旬刊),2021(2): 110-111.

(责任编辑:魏 琛)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Silenc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Employees in Selected Enterprises

LIN Sidi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1)

Abstract: The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find out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mployees' assessment on employee silenc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cross their demographic profiles as well as the correlation of employee silenc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 total of 320 employees of three companies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located in Fujian,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is research. The data were gather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on Employee Silence Scal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Scal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independent sample test,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mployee silenc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mployee silence was associated with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negatively.

Key words: employee silenc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mpirical research

官方媒体话语中新冠疫情报道的篇际互文策略

杨 欣

（滁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摘 要：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形势下，官方媒体如何选择恰当的话语策略报道疫情，对内宣传疫情防控措施，对外介绍中国方案、传递中国温度，展现我国合作开放、积极正面的大国形象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在此背景下，以官方媒体对新冠疫情报道为语料来源，探讨篇际互文性作为话语策略在相关报道中的文本特征，并对其进行语用分析。研究显示：镶嵌型多用于对外传播中国理念，展现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融合型常用于对内宣传正面抗疫事迹，坚定全国人民携手抗疫的信念，促进官方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沟通；转换型多出现在新闻播报体裁中，通过呈现不同社会群体的抗疫心声，以达成众志成城的抗疫共识；链接型既用于向国内受众宣传疫情防控措施，也用以向国外受众传播中国携手各国战胜疫情的坚定决心。

关键词：官方媒体话语；新冠疫情报道；篇际互文策略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41-05

2020年初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疫情在我国多个省市相继爆发，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情不断蔓延肆虐，给中国及全球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场危机，更是一场对内高效解决疫情和对外引导正面舆情的严峻考验。官方媒体对新冠疫情的报道作为一种官方话语，具有表达政治观点、建构民众心理、缓和文化冲突、引导公众舆论的重要作用[1]，如何选择恰当的话语策略向国内受众宣传疫情防控措施，向国外受众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高国内人民对政府防控措施的理解度和接受度，增强世界各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可度和认同感，减少不实消极报道的负面效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22-03-14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Q2021D188)；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一般项目(SK2020B18)；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SK2020A0507)；外研社科学研究项目(HX2022131)。

作者简介：杨欣(1987-)，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话语分析研究。

一、文献综述

篇际互文性是一种特殊的互文性，指同一语篇中不同的体裁、话语、风格、实践或文化等成分的混合与交融[1]，是话语对外传播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话语策略。篇际互文策略的有效运用有助于弱化话语理解误差、缓和意识形态纷争、提高受众的认可度、增强报道的影响力，以达成话语交际目标[2]。篇际互文性一直是国内外语言研究与社会研究的焦点[1]，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近年来，语言学研究者开始将篇际互文性引入非文学语篇，如广告话语、商业话语、教育话语等领域[3-5]；武建国[6]将其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应用于政治话语分析，并将其划分为四类——融合型、转换型、镶嵌型及链接型；蒋颖[7]采用该分类方法对官方新闻话语的“非正式化趋势”进行分析；宋改荣等[8]借鉴上述分类对《中国日报》报道“中国梦”时运用的篇际互文策略进行阐释；杨欣[9]借鉴该分析框架探讨官方

媒体在传播“一带一路”时运用的话语策略;武建国[10]等对微信公众号内广告话语中运用的篇际互文策略进行分析,并对其背后蕴含的促销文化和变化趋势进行探讨;凌仕昶[11]探讨了微博营销话语的篇际互文表现,并透视微博营销取得语用成功的商务机理。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虽然篇际互文性视角下的话语研究在数量上呈现增长趋势,但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对卫生类话题的关注略显不足,从篇际互文性视角对当前公众普遍关心的疫情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鉴于此,笔者拟以官方媒体对新冠疫情报道为研究语料,借鉴武建国等人[6]的分析框架,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官方媒体话语在报道新冠疫情时运用了哪些篇际互文策略?分别呈现怎样的话语表现形式?(2)官方媒体话语运用上述篇际互文策略实现了何种语用功能?达到了怎样的交际功效?

二、新冠疫情报道中的篇际互文策略及语用分析

不同类型的篇际互文性映射不同的话语策略,从而对官方话语传播产生不同的宣传功效。本部分借鉴武建国等人[6]的分析框架,从中国经济网、中国青年网、中国日报网、央视新闻网搜集主题为“新冠疫情”的报道,考察官方媒体话语中运用的篇际互文策略及呈现的语言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实现的语用功能和达到的交际效果。

(一)镶嵌型篇际互文策略及语用分析

镶嵌型篇际互文性指不同体裁、风格、话语等规约成分以嵌入形式共存于同一语篇中,其中的某一成分通常界限分明地镶嵌在由另一成分构成的模板中[6]。如采访对话这种规约成分会嵌入到新闻体裁内,使报道既包含语体较为生活化的大众话语,又包含语体专业严谨的官方话语;既具有通俗质朴的话语风格,又保留正式庄重的话语风格。上述镶嵌型篇际互文策略的运用既可以丰富单调枯燥的报道内容,又能改变以往官方新闻严肃呆板的话语风格,自然地将生活话语镶嵌于政治话语中,使得报道形式更加活泼自然,报道内容更加生动形象,有利于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在不同体裁、语体和话语风格的流通中达成共识,增强报道的感染力,提高读者对报道的理解度和接受度,有效实现官方媒体的交际目标,例如:

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积极落实向 13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援助的承诺,向多国派出医疗专家组,并同 150 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等举行 70 多场专家视频会,以实际行动促进抗疫国际合作。……“中国经验在帮助克罗地亚应对疫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高度评价中国为我们提供的帮助”。克罗地亚前总统梅西奇表示……“中国为世界抗击疫情所作的巨大努力有目共睹,为各国疫情防控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斯里兰卡外长古纳瓦德纳表示……一位老奶奶走出病房前突然转身,向援助医生们深深地鞠躬致谢“感谢医生,感谢医疗队!”这份突然的感谢令人动容。……

上述报道选自中国经济网推出的一篇题为《传递携手抗疫的坚定信心:患难见真情,共同抗疫情》的新闻报道,属于典型的镶嵌型篇际互文策略。该报道在提及中国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援助时,将带有数字和文字的说明性体裁嵌入到新闻报道中,形成说明性体裁与新闻体裁的混合,反映了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举措支持全球抗疫,为保护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积极贡献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在记者采访中,老奶奶朴实的话语风格被嵌入到官方话语的严肃风格中,说明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中国积极支援抗疫行为得到了各国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的认可,有利于使受众对“中国助力全球抗疫”获得更加直观的感受和体验。这种镶嵌型篇际互文策略的使用,自然地将民间生活话语嵌入到官方媒体话语中,将通俗朴实、简单易懂的话语风格嵌入到抽象晦涩的话语风格中,使情感表达更加深入人心,有利于国外受众从内心深处接纳中国,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髓传达得更加形象、具体。

(二)融合型篇际互文策略及语用分析

融合型篇际互文策略指不同体裁、风格或话语等

规约成分以错综复杂或不易辨别的体例混杂交融在同一语篇中,是一种繁杂、难以区分的话语策略[6]。此类话语策略往往掺杂语篇制定者的交际目的,不易区分。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和人们思想的日益开放,官方媒体为了使报道更加鲜活生动,赢得更多受众的关注和喜爱,逐渐开始改变以往严苛呆板、隐晦难懂的报道风格,大胆选用融合型篇际互文策略。例如:

经历了60多个日夜的浴血奋战和坚守,今天,春风里激荡着让全国人民翘首以盼的消息!从3月25日零时起,湖北省除武汉以外地区"解封",14天后,武汉也将迎来"解封"时刻!为了这一刻,无数的逆行英雄热血出征,……汇成守护生命的星河!为了这一刻,就让泪水尽情随樱雨纷落,因为我们坚信,在严寒中绽放的春天更加明媚,从磨难中积蓄的中国力量更加不可阻挡!"山河为卷共江汉,万里写入胸怀间",这一刻,一起含泪听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广播电视台携手蔡徐坤佟丽娅推出的原创抗疫公益MV《山河无恙在我胸》,致敬我们英雄的祖国,英雄的时代,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市!

上述报道选自中国青年网刊出的一篇题为《看樱花似雪,为英雄而歌!抗疫公益MV<山河无恙在我胸>》的宣传报道,属于典型的融合型篇际互文策略。该新闻在报道无数逆行英雄为武汉"浴火重生"奋战时,将带有数字的说明话语和表达情感的抒情话语融入到新闻报道中,形成说明、抒情体裁与新闻体裁的混合与交融,意在致敬抗击在一线的英雄们,感恩他们"以生命赴使命、以挚爱护苍生"的精神气概;随后采用隐喻表达"守护生命的星河"和直接引用"山河为卷共江汉,万里写入胸怀间",实现了隐性互文策略和显性互文策略的相互融合,旨在向读者说明正是英雄们冲锋在前,筑牢最关键的防线,才凝聚起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磅礴伟力,为夺取疫情防控战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最后在描述"从磨难中积蓄的中国力量更加不可阻挡时",将记叙体裁和论述体裁混杂在一起,实现了叙述风格和严肃风格的完美融合。这种融合型篇际互文策略通过"英雄的祖国""英雄的时代""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市"等互文表述,同时融合排比句式,使报道读起来朗朗上口,形成音韵上的美学节奏,不仅有效地宣传了抗疫公益MV《山河无恙在我胸》,也使受众更深切地感受到全国上下以"生命至上"凝聚万众一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克时艰,彰显了中国效率、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上述融合型篇际互文策略的应用不仅增强了报道的政治说服力和心理感染力,也激发了国内受众的爱国情怀,有利于营造万众一心阻击疫情的舆论氛围,凝聚起众志成城的强大抗疫正能量。

(三)转换型篇际互文策略及语用分析

转换型篇际互文性指在同一语篇内,不同体裁、风格、话语的依次交替转换[6]。在官方媒体报道中,不同话语、风格和体裁之间不断切换的话语策略经常被使用,如播报体裁与对话体裁间的转换,不同采访对象间话语和语言风格的不断切换。报道通过不同类型的话语、风格和体裁间的轮换展现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呈现不同社会阶层在抗击新冠疫情时的真实心声,报道中出现多种群体的抗疫话语,有利于迎合不同阶层读者的心理诉求,使得报道更加深入人心,联合各阶层达成"携手同心、共克时艰"的抗疫共识。例如:

"春风拂过,荆楚大地万物复苏。湖北省卫健委3月14日通报,……新增疑似病例数首次为零。"(主播)

"要在加强防控的前提下,采取差异化策略,适时启动分区分级、分类分时、有条件的复工复产。"(习近平总书记)

"我对农民赶上农事,化解疫情影响,保持增产增收,仍然充满信心。"(潜江市委书记吴祖云)

"食用菌是我们村的富民产业,本计划春节上市赚一把,现在却要烂在地里了。"(湖北省阳新县洋港镇泉口村党支部书记陈迪强)

"现在正是适宜育苗的好时机,这一批苗子如果卖得好,能有一万多元的收入。"(麻城市黄土岗镇村民郭方东)

上述语篇选自中国日报网2020年3月15日刊发的一篇题为《啃下硬骨头 合力促发展——湖北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闻报道。在该

报道中,新闻播报体裁与记者采访的对话体裁持续轮换交替,并且不同采访对象的回答及话语风格也不断转换。分析上述新闻片段发现,村党支部书记和黄土岗镇村民的回答较口语化,答话风格通俗质朴;主播的播报话语清晰准确、风格严谨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和潜江市委书记的话语则严谨周密、说服力强,风格严肃庄重,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较强的权威性。在不同话语及风格不断交替的同时,报道体裁也在抒情体裁、政治体裁和论述体裁之间不断轮换,这种不同体裁、话语与风格间的交替轮换贯通整个语篇,运用了转换型篇际互文策略。不同体裁的交替轮换不仅使播报形式更加丰富多彩、生动灵活,还可以有效避免新闻报道的单调乏味,吸引更多受众的关注,充满新意。同时,被采访者不同话语及风格的交替出现展现了社会各群体对疫情现状的不同关注焦点,帮助受众从各类采访中找到对应阶层,有助于激发情感共鸣,达成抗疫共识,增强新闻报道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

(四)链接型篇际互文策略及语用分析

链接型篇际互文性指不同体裁、话语或风格之间持久稳定且有规律的链接[6]。随着当前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此类篇际互文策略的应用随处可见,如在互联网中普遍存在图片和文字模态、视频和文字模态的链接及不同领域话语的链接等。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官方媒体报道中,该类话语策略的运用也十分广泛。例如,在防控疫情的宣传漫画、短视频和宣传图片中经常和文字链接起来,传递疫情防控的相关内容。在疫情防控微博这种体裁中,由于其受众可能是世界各地的网民,故多以图片和文字结合的形式阐释疫情防控措施,例如:

新冠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举全国之力予以支援,组织 29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 330 多支医疗队、41600 多名医护人员驰援,迅速开设火神山、雷神山等集中收治医院和方舱医院,并组织 19 个省份对口支援。……170 多个国家领导人和 4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电话、信函、声明等方式对我国表示慰问和支持。……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前功尽弃……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要继续同世卫组织保持良好沟通,同有关国家分享防疫经验,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向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该报道片段选自央视新闻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2 月 23 日的讲话,报道将代表中国政府的官方话语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报道开篇,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叙述当前疫情的紧要形势,阐明党中央对疫情高度重视的态度以及精准果断的决策部署;然后运用数字对党中央如何统筹各方力量支持疫情防控进行具体说明,旨在阐释祖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最后,运用评论性话语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作出总结“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随后选择劝说性话语“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提醒广大人民群众疫情形势依然严峻,警示各级政府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防控的各项工作。该报道运用链接型篇际互文策略将报道、演讲和评论等不同语篇体裁和其对应的实践活动链接起来,高效地实现了报道的“叙述”“说明”“阐释”和“劝说”等语用功能,凸显了中国抗击新冠疫情采取的果断措施,不仅保障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也为全世界抗疫争取了宝贵时间;既展现了中国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的大国担当,也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构建全人类卫生共同体的国家理念。

三、结语

笔者以官方媒体话语中的新冠疫情报道为研究语料,考察了篇际互文策略在相关报道中的文本特征和表现形式,探究了不同篇际互文策略在相关报道中的语用功能及达成的交际功效。结果发现:融合型篇际互文策略与其他类型的篇际互文策略存在意义上的重合,故其使用最为广泛,出现在各类体裁中,而其他篇际互文策略运用相对较少,运用的体裁也相对比较固定。不同的篇际互文策略分别用于实现不同的语

用功能,其中镶嵌型多用于对外宣扬中国坚持为维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贡献力量,展现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融合型常用于对内宣扬抗疫事迹,坚定全国人民携手抗疫的信念,促进官方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沟通;转换型多出现在新闻播报中,通过不同社会群体的话语及风格转换,展现不同阶层人民的抗疫心声,以达成众志成城的抗疫共识;链接型既用于向国内受众宣传疫情防控措施,也用以向国外受众传播中国携手世界人民战胜疫情,为维护世界公共安全做贡献的大国担当。在新冠疫情的对内宣传和对外传播过程中, 运用不同的篇际互文策略不仅丰富了报道内容、创新了报道形式,而且有利于更有效地对内传达防控措施、对外传播中国理念,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减少误解与偏见,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参考文献:

[1] 武建国,刘艾静.国家形象宣传片《角度篇》解说词翻译中的互文性策略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 28(2): 22-25.

[2] 窦卫霖,王洁.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研究[J]. 对外传播, 2014 (3): 7-8.

[3] 韩雪梅.从体裁互文性的角度对中国公司公开性语篇的分析[D]. 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9.

[4] 高兴梅.教育话语的篇际互文性研究:从招生简章看教育话语的商品化趋势[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6(2):95-99.

[5] 纪卫宁. 体裁互文性视角下的教育机构话语的商业化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1):247-249.

[6] 武建国,林金容.篇际互文性与中国梦传播的话语策略[J].中国外语,2016, 13(5):43-50.

[7] 蒋颖.篇际互文性视角下官方新闻话语的"非正式化"趋势: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为例[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9, 36(6):71-75.

[8] 宋改荣,王树桦. 批评性体裁视角下"中国梦"的报道研究:以《中国日报》的报道为例[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7):132-136.

[9] 杨欣.篇际互文性视角下官方话语传播的话语策略研究:以"一带一路"官方宣传报道为例[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9(3):78-82.

[10] 武建国,牛振俊,黄泽文.微信公众号中广告话语的批评性体裁分析:以三大外资超市为例[J].山东外语教学, 2018, 39(4):30-37.

[11] 凌仕昶.微博营销话语中篇际互文表现的批评性体裁分析[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2020.

[12] 黄小燕. 汉语时闻中的语音隐喻特征和作者意图探究[J]. 武夷学院学报, 2021, 40(1):87-91.

(责任编辑:黄 超)

A Research on the Intertextual Strategies for COVID-19 Reports in Official Discourses

YANG 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Anhui 239000)

Abstract: As the global epidemic situation is still grim, how the official media choose an appropriate discourse strategy to report the real situation of covid-19, publicize the governmen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ternally, introduce China's programs to the outside world, convey China's temperature, and show China's cooperative, open and positive image as a big country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Under this social background, this research takes official media reports on covid-19 as the research data, explores the textual features of intertextuality as a discourse strategy in relevant reports, and conducts a pragmatic analysis of i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osaic type is mostly used to publicize China's global thinking and to show China's hig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fusion type is often used to propagate the positive anti-epidemic deeds internally, to strengthen the belief that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should join hands, and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official discourse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 The transformation type mostly appears in the news broadcast.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iscourse and style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the anti-epidemic aspirations of different people are shown to reach a consensus of unity. Linking is used not only to publicize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o domestic audiences, but also to spread China's firm determination to join hand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to foreign audiences.

Key words: official media discourse; Covid-19 reports; intertextual strategies

清高宗禁毁钱谦益著述续考

翁 晖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乾隆三十四年起，清高宗通过颁布上谕号令禁毁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及其板片。通过爬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概述各省督抚查缴钱著禁书及板片之经过。各省督抚在查禁钱氏著述过程中扩大范围，且有关钱氏的著述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再次遭到禁毁。通过梳理此次禁书运动，侧面了解钱谦益著述的传播范围及影响力。清高宗禁毁钱谦益著述事件是其思想控制趋紧的一个重要环节，此事件阻断了文学传播、破坏了文学生态，伤害了士人心理，造成连锁反应，对乾隆朝文学的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清高宗；钱谦益；《四库全书》；《初学集》；《有学集》

中图分类号：I10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46-05

清高宗禁毁钱谦益著述是纂修《四库全书》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禁书运动，庄吉发先生根据“国立故宫博物馆”典藏军机处档奏折录副等原始档案撰成《清高宗禁毁钱谦益著述考》一文。[1]是文探讨各省督抚办理禁毁钱谦益著述之经过及意义。今笔者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检索有关清高宗禁毁钱谦益著述事件的23件原始档案(庄先生所引用的11件档案中有3件与笔者相同，其余20件则为庄先生所未见)，又《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保存许多《四库全书》纂修期间禁毁有关钱氏著述的档案，故笔者爬梳文献撰成此文，以期对清高宗禁毁钱谦益著述一事略作补充，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查禁钱谦益著述之经过

清高宗禁毁钱谦益著述一事的导火索之一，是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时，将钱谦益冠于清代作家之首。沈氏知遇于乾隆帝，却在选辑诗歌时暴露出政治敏感的缺乏。此事引起高宗的强烈不满，进而开启禁毁钱谦益著述的滥觞。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初六高宗颁布上谕，命各省督抚将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缴出汇齐送京销毁。京城地界，着提督衙门五城顺天府一体办理。京城地区因地理位置原因，率先奏报禁毁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一事。六月二十九巡视北城给事中永庆奏称：“于本城地方遍行明切晓示，并督率司坊各官于所属书肆及住户人等谕令将此项书籍槩行缴出。今据各书肆内缴出新旧《初学集》八部、新旧《有学集》十一部、零星不全《初学集》共三十六本。并据住户原任知县朱垣、教谕黄景纬、举人范鏊、民人于纲尚等缴出《初学集》共六部、《有学集》共六部。”[2]

同年六月二十五高宗复降谕：“高晋此时现驻苏城，着传谕令其将二书原板即速查出，检点封固，委员迅行解京。若所属或有翻刻之板，亦令一并查缴，毋任片简遗留。”[3]两江总督高晋得谕后，着手展开调查，并于次月十五奏称：“钱谦益本籍常熟，而江宁、苏州两处为书贾汇集之区，当即在于江宁书肆查出金匮山房订正《有学集》，又玉诏堂选刻《初学》《有学》二集各刻本共计六十七部。……查有汲古阁五经板一副、钱谦

收稿日期：2021-06-14

作者简介：翁晖(1992-)，男，汉族，助教，主要从事清代文学、文献研究。

益《初学集》原板一副,随将《初学集》原板起出。据该司道将两处起获板片同在苏起缴,原刻、续刻各书本解送到。……臣现将起出《初学集》原板照刷之书与面页载有本府藏板及燕誉堂藏板之书逐一核对粘签,一俟浙省起到金匮山房订正《有学集》原板校对无讹即同。此外,查出之玉诏堂选刻《初学集》《有学集》,并钱谦益与吴伟业、龚鼎孳三家合刻诗集,又与明臣归有光合刻尺牍各取一部,分别封固。一面具折耑差齐赴热河恭呈御览,一面将各书板五副及江宁、苏州省城现在缴到各书刻本三百三十五部先行汇总,委员由水路解京齐交留京办事王大臣处收明请旨销毁。饬俟各府州县查缴,积有成数陆续再行具奏。"[4]此后,高氏继续收缴谦益著述,"截至九月初十,又有《初学》《有学》等集五百七十二部,连前共有一千一百二十部,另有残缺不全各集一千五百五十六本。"[5]

其他各省督抚也陆续展开查缴工作:八月十日,浙江巡抚永德奏称:"据杭州府及近省之嘉兴、湖州、绍兴三府属,陆续收缴《初学》《有学》二集共二百八十二部。……臣现将尺牍十部、诗钞一本、蒙钞一部并板片同《初学》《有学集》二百八十二部一并点交委员汇行解京。"[6]永德后续"收缴钱谦益书籍二百九十四部,内有尺牍一部"[7]。十二月初五其奏称:"查收《初学》《有学》二集共二百八十二部、尺牍十部、诗钞一部及楞严经蒙钞一部。蒙钞板片全副已委员解京。又起获金匮山房《初学》等集板片一副,当交江省委员赍回。臣先于八月初十日奏明在案,一面仍严谕各属将一切书籍及燕誉堂书板、苕南凌凤翔翻刻之玉诏堂书板实力查收去,后嗣又据各属陆续收缴解省。截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止,计又收得《初学》《有学集》及尺牍、诗钞、蒙钞等书,共二百七十五部。查阅板式、序文,俱与前届之书相同。内惟衢州府解到《五大家诗钞》一部计五本,系钱谦益一本,吴梅村、熊雪堂、龚芝麓、宋荔裳各一本,其招头面页镌有康熙庚申年年分及吴门五车楼藏板字样,此板亦须作速查起。吴门系苏郡地名,臣一面通饬浙省各属将《五车楼诗钞》板片查访追起,一面咨会江省一体查追外,所有续收现已解省,之二百七十五部应先行解京。臣现在饬司装箱封贮,俟有便员即行起解,其燕誉堂及凌凤翔翻刻之玉诏堂板片二副,各属虽覆无此板,但此等狂悖书板必须起获销毁。"[8]

江西巡抚吴绍诗九月二十八日奏称:"查明省城及各属书肆并无翻刻钱谦益《初学》《有学》二集。书板刷赍间有前项书集一两部,俱系贩自江南转售。现据各书铺及各绅士藏书之家陆续呈缴钱谦益《初学》《有学》二集及钱谦益选注各书共六十七部,又不全《初学》等集十五本。"[9]十二月二十六日,巡抚海明奏称:"已据各属缴到钱谦益书集六十七部,又不全书十五本。"[10]次年五月二十四日,海明续奏:"《初学》《有学》等集及选注各书、尺牍、杂著等项共一百二十一部七十五本四百一十四篇四百五十九页三十三首九十一束一纸四帙。板片四十三块。又楞严蒙抄经册共二十四部。"[11]七月二十九日,海明仍续缴"钱谦益《初学》《有学》等集及选注、尺牍、序文等项共计八部一十六本一十三页。"[12]

两广总督李侍尧九月二十八日奏称:"查钱谦益所著《初学集》《有学》二集,前奉谕旨饬查缴销,业经臣等行司转饬,钦遵查办。并令南海、番禺二县在于省城各书坊详加查询,将所有刊刻书板及刷印书集,或另有钱谦益所著诗文尽行呈缴。随据覆称《初学》《有学》二集,粤东并无翻刻书板,仅有江浙等省书贾买带来未售者共十二部,槩行缴出。又绅士人等缴出《初学》《有学集》十八部。并查有康熙年间吴江县顾有孝集等编辑《江左三大家》一书,系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合刻,钱谦益诗三卷列于卷首。臣等查钱谦益文词悖理犯义,奉旨弃其书,未便任由别刻留存,使末学无知传诵,流为世道人心之害,自应一并查销。随据书铺缴出十部,每部内有钱谦益诗一本,抽出俱行给价,并据各绅士抽缴六本此种书集板片。"[13]

安徽巡抚富尼汉十月十三日奏称:"缴到《初学》《有学》二集共九十八部又六百三十八本。不全《初学》《有学》二集共二百八十二本又九十一册。"[14]十二月二十二日,巡抚胡文伯奏称:"嗣据各属缴到《初学》《有学》二集共九十八部又六百三十八本。不全《初学》《有学》二集共二百八十二本又九十一册。又列朝等选《三家诗钞》《归钱尺牍》及序文、杂作二十馀种,共十三部又三百八十七本。《盱眙县志》书内抽出刻诗二首,于本年十月十三日专差咨解军机处查收,请旨销毁在案。兹臣莅任后饬查,自十月后至今,各属有无续收各

项诗藉。据藩司报称,又收过整部各书一百四十七部又一百三十本,其零星录序文篇、疏经等项二百九十四篇五百五十四页半、诗五十一首、诗板二十块现存在司等。因臣伏查钱谦益诗集板片,虽已于江苏省查出收缴,而其书流传广布于他省,并别种选刻,内有零星板片,自属不少。”[15]

护理河南巡抚何煟十二月初七日奏称:“奏明送京在案,兹复据祥符等县缴送《初学》《有学集》共十部、不全诗集五十本、未装钉残缺《初学集》四部,又钱谦益诗钞三本前来,除将缴到书籍汇送军机处相应。”[16]次年五月二十六日,巡抚永德奏称:“臣查河南祥符等县,从前历次缴送之《初学》《有学》各集,节经前署抚臣吴嗣爵暨护抚臣何煟具奏送京在案,兹复据通、许等州县缴送《初学集》抄白一部计四本,又诗钞二本,并《楞严蒙钞》四部,共一百九十四本。”[17]

通过爬梳上述档案,可以基本还原乾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清廷搜访钱谦益著述之经过:高宗颁布上谕命各省督抚禁毁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及板片。一方面,各省督抚害怕朝廷苛责工作不到位而遭牵连,故实力完成任务。从查缴的成果看,收获颇丰,有的甚至具体到一纸一帙;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为迎合上意,多番查缴,并自行扩大了查禁范围,牵连到钱氏其他诗文书籍,乃至载有钱氏诗文的别集、佛经、方志等,已然造成了政策影响力的扩大化。

二、纂修《四库全书》时期禁毁有关钱谦益著述述介

王汎森先生将清代官方禁书运动产生的效果比喻成“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并指出:“事实上因为官方的种种作为形成一个又一个暴风圈,形成一种看似模糊却又无所不在的敏感意识,每个事件像投石进入池塘产生‘涟漪效应’,所以许多不曾出现在禁书目录中的书物,人们为了防患未然,也对它们作了庞大的禁抑工作。”[18]各省督抚及四库馆臣不约而同地扩大禁毁钱氏著述范围,以致其他载有钱氏诗文的著述遭到牵连。与钱谦益有关的著述因此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而且四库馆臣对牧斋诗文进行极为“用心良苦”地删改。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收录了许多纂修《四库全书》时期查禁书籍的档案,通过检索这些档案,我们可以了解此期各省查办禁毁有关钱氏著述的情况。在长达十九年“寓禁于征”的《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各督抚所获《初学集》《有学集》数量已经不多,但钱氏其他著述诸如《钱牧斋尺牍》《牧斋诗钞》以及载有钱氏诗文的《列朝诗集》《江左三大家诗钞》《四六初征》《启祯野乘》《唐诗鼓吹笺注》等均遭到禁毁,足见查禁力度增强,查禁范围也扩大至全国。

通过对这两次查禁钱著的梳理,可以侧面了解钱谦益主要著述《初学集》《有学集》《钱牧斋尺牍》的传播情况。《初学集》《有学集》第一次查缴的地区主要是两江、浙江、江西、安徽、河南及京城地区。两广地区的《初学集》《有学集》则通过书贾携带而流传。而《四库全书》纂修期间除江苏、浙江、江西继续缴有《初学集》《有学集》外,亦有湖广、山东、闽浙地区查缴是书,而查缴书板地区正是书籍生产流通之区域,如此看来,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的传播范围几乎是遍及全国。而钱谦益另一部著述《钱牧斋尺牍》的传播范围更为广大,浙江、江苏、江西、湖广、贵州、山西、山东、直隶、闽浙、湖南、云贵等地区均有传播,正如沈德潜所言:“(钱氏)一时帖耳推服,百年以后,流风馀韵,尤足訾人也。”[19]由此验证钱谦益“四海宗盟五十年”的文坛地位。

正是因为钱氏作为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以著作丰赡,影响广泛闻名,高宗才会不遗余力禁毁牧斋著述。综观这一起禁书运动,高宗可谓煞费苦心。钱谦益是高宗有意打倒道德有亏的前朝文坛领袖。严志雄先生指出,“姑勿论归愚所选之牧斋诗及其评论是否妥当,若然此番‘国朝诗’之事成,又或仁圣天子赐序,其书流布天下,则牧斋之‘身后名’在某一意义上就得以‘平反’,牧斋之书料亦可以继续流通于世,进入清朝‘文统’‘文苑’,成为‘典范性’的诗人”。而高宗正是借禁毁钱谦益著述,以期斩断明朝文学与清朝文学之间的联系。所以,高宗不仅禁毁钱谦益著述,而且还通过官方谕令、御制诗文等贬损其人格,并对其做否定性的历史定位。四库馆臣则以钱氏名节有亏、学术庸劣为由,堵众人之口,于是牧斋之议论销声匿迹。总而言之,清高宗及其文学侍臣通过自身的话语权为牧斋定

谳,这是皇权与国家机器通力合作对钱谦益文学遗产传播与接受的剥夺。

三、余论

清前期文化政策尚为宽松,而嘉庆后文网变疏,惟有乾隆朝文学生态屡次遭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破坏。乾隆朝文学生态在禁书运动后恶化的表现之一是文学传播遭到阻断、书籍及板片遭到禁毁,直接影响的是出版停滞、传播受阻。士人们不敢随意评论、鉴赏、收藏钱谦益的作品,纷纷上缴禁书,有些读书人为了自保甚至自毁禁书。已经出版的载有钱氏诗文的作品则遭到涂改,例如《四库禁毁丛刊》里许多选有钱谦益诗文的书籍都将有关钱氏的信息用墨条涂黑。读者的文学阅读则变得危险起来,出现自我回避和抑制的倾向。表现之二是文人的自我压抑现象。统治者通过禁书运动制造出紧张的政治空气,其威慑作用令知识分子倍感心理压力。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既不能随意运用文字,更不敢引用违碍著述。无论是处庙堂之高的官僚知识分子,亦或是江湖中的文人,他们的心灵无不渐趋萎缩,在创作中约束自我,以致文坛万马齐喑的局面。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因此次禁书事件而遭牵连的与沈德潜同为"江浙二老"的钱陈群,他在给清高宗上奏折时说:"臣世居浙西,幼习举业,间作诗歌。时臣父母家训甚严,凡有才无行之人,不许往还,悖理伤化之书,不令寓目,臣只遵恪守阅。今七十年矣,每见前人诗文刊布流传稍涉悖缪者,切齿痛恨。至林栖十八年来,受皇上优恤深仁,举家顶戴浃髓沦肌指糜莫报。前月颁到上谕,查缴钱谦益《初学》《有学集》等,因仰见皇上发奸摘伏,实为千古立名教之大防,伏思此等诗文狂悖已极,自宜亟为销毁,不令片纸只字流布于光天化日之中。至臣家本素寒,所藏书籍本少。又臣自幼学为诗文于大节有亏者屏弃不阅,平时训子若孙暨及门弟子、乡里后进无不切实告诫,至再、至三,不令少染恶习。若钱谦益者实属不齿于人类,每于他处见其题咏一二,必鄙夷不观,实臣禀性如此,并非因钱谦益悖逆败露,始持此论也。"[20]为了自保,他极力撇清与钱谦益的关系,以免徒增皇帝的猜疑。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所以,到乾隆年间,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21]这对健康的文学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

高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禁毁谦益著述,是否达到预期片简不留的效果呢?[22]答案是否定的。《清史稿》即云:"其(钱谦益)自为诗文,曰《牧斋集》、曰《初学集》《有学集》。乾隆三十四年,诏毁板,然传本至今不绝。"[23]而如今见到的诸多钱氏著述,不仅有禁书运动的漏网之鱼——刊本,而且还有不少清代抄本,无论是刊本还是抄本,都是当时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藏匿保存的,此举既是为了保存文化,又是对高宗禁书政策无声的反抗。

要之,清高宗因人废言,极力禁毁钱谦益著述,目的是打倒前朝文坛领袖,斩断前朝文学的影响,从而钳制思想,消弭反抗;各省督抚及办事官员为邀功实力禁毁钱谦益著述,并扩大禁毁范围,造成文化的破坏。总之,清高宗禁毁钱谦益著述是其思想文化专制控制趋严厉的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伴随着文字狱及禁书运动,这些都使清朝的文化专制达到了顶峰。而此次禁书运动对士人心理造成伤害、对文学生态造成破坏,造成连锁反应,影响极其深远。

参考文献:

[1] 庄吉发.清史论集(三)[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175-197.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奏报遵旨查办钱谦益初学有学书籍事,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档号:03-1147-052.

[3] 清实录(第十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79.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遵旨查出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原版并又查有翻板及各刻本分别办理情形事,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档号:04-01-38-0047-005.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遵旨查缴钱谦益初学有学二集书板刻本解京销毁情形事,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档号:04-01-38-0047-010.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查收钱谦益书籍部数及蒙抄板本等现在解京及办理情形事,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初十日,档号:04-01-38-0047-007.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遵旨宣谕钱陈群办理查缴钱谦益初学有学二集情形事,乾隆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档

号:04-01-38-0047-009.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查缴钱谦益初学有学集翻刻板片情形事, 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 档号:04-01-38-0006-023.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遵旨查缴钱谦益初学有学二集情形事,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档号:04-01-38-0047-011.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奏为遵旨续缴钱谦益初学有学等集及选注各书尺牍杂著等项事, 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档号:04-01-38-0006-027.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奏报查销钱谦益文集诗稿事, 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档号:03-1147-062.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奏报续缴钱谦益所著书籍数目及二年限满查缴净尽事,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档号:04-01-38-0006-033.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奏为遵旨查办钱谦益初学有学二集并诗集翻刻板片书籍情形事,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档号:04-01-38-0006-020.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奏为遵旨查缴钱谦益诗集情形事, 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档号:04-01-38-0047-012.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奏为查办钱谦益诗集板片情形事, 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档号:04-01-38-0006-026.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奏为查缴钱谦益初学有学集情形事, 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 档号:04-01-38-0006-024.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钱谦益奏为通许等州县缴送钱谦益初学有学书籍汇送军机处事情形事, 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档号:04-01-38-0006-028.

[18] 王汎森.权利的毛细管作用(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47.

[19]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75:7.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奏为遵旨查缴钱谦益初学有学集等应禁书籍情形并沥陈寸悃事,乾隆朝,档号:04-01-38-0023-011.

[21] 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33.

[22] 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书之研究 [M].台北:华正书局有限公司,1984:403.

[23] 赵尔巽.清史稿 [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324.

(责任编辑:白 晔)

A Continued Study of Banning Qian Qianyi´s Works by the Emperor Qianlong

WENG 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Since the 34th year of Qianlong´s reign, Emperor Qianlong issued an edict prohibiting the destruction of Qian Qianyi´s Beginner's Collection, Study Collection and its plates. The process of provincial governors´ seizure of banned books and plates is revealed in this article by sorting out the archives of China´s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As governors of all provinces expanded the banning scope, Qian´s works were banned again dur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Divisions. By combing the book ban movement, we can understand the dissemination scope and influence of Qian Qianyi´s works. The event that Qianlong banned Qian Qianyi´s writings was crucial in his tightening ideological control, which blocked the spread of literature, destroyed the literary ecology, hurt the psychology of scholars, caused a chain reaction, and even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Key words: Emperor Qianlong; Qian Qianyi;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Divisions; Chuxueji; Youxueji

“霸朝”的史诗:《北史演义》叙事中心的选择

江恺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清人杜纲的《北史演义》是演史小说中的后起之秀。杜纲选择非正统的北齐王朝为叙事中心,背后实有深厚的历史、文学意涵。从史学角度看,北齐的虎头蛇尾、兴勃亡忽,是自隋唐以来便颇受关注的历史议题。北齐奠基人高欢虽为一代枭雄,却得到了历朝史家不低的道德评价,契合了杜纲塑造主角时的伦理追求;从文学角度看,北齐史料,尤其是高欢崛起草泽的记载颇具丰富性与传奇性,以之为小说素材,足以迎合市井审美、保障叙事完整。杜纲选择叙事中心时的考量,也昭示了演义创作的一般规律,即作家在熔裁史料时,会受到史观传统、伦理要求、大众认知、小说文法等因素的制约,在兼顾诸要素的前提下运事成文,方可成就演义佳作。

关键词:《北史演义》;北齐;叙事中心;史学传统;小说文法

中图分类号:I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51-07

清代小说家杜纲的《北史演义》,以纡曲匀净的文笔叙写北朝后期的乱局,补足演史题材之阙,是为历史演义中的后起佳构。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评价《北史演义》:“在演史诸书中实为后来居上,除《三国志》《新列国志》《隋史遗文》《隋唐演义》数书外,殆无足与之抗衡者。”[1]然而孙楷第对杜纲“以北齐为主”[2]亦有所指摘:“唯当时南北分立,短祚易姓,变乱靡常,其间北齐与宋俱多失德之主,而齐昏乱尤甚”,小说侧重北齐,“用意不免纤佻。”[1]的确,北齐作为一个非正统的“霸朝”①,在历史上以暴虐荒淫而声名狼藉。以北齐为小说叙事中心,在杜纲未明言个中意图的情况下,难免让人怀疑是出自撰者猎奇心理。但是,《北史演义》是杜纲在没有前人演史可供凭依的境况下,“潜心稽古”“宗乎正史”“旁及群书”[2]而作,故以北齐为主未必是失于考量的“纤佻”之举。实际上,前辈学者已指出,“在北朝中突出北齐的战略,恰是杜纲取得成功的秘诀所在。”[3]不过,对于杜纲选择以北齐为叙事中心,学界更多关注其达成的叙事效果②,尚无人深究背后的历史文化根由。演义的选材与创作终究循蹈着一定法则,其叙事中心的选择,须遵从羽翼信史、翊扬教化之精神,并以动人听闻为旨归。因此,本文将爬梳要籍,从历史认知和文学认知两个方面来推求可能影响《北史演义》叙事中心选择的因素,探究演义作家如何在传统范式下对史料进行文学性的筛选与重构。

一、杜纲对北朝历史的截裁

所谓“北史”,据唐人李延寿定义,即指魏、齐、周、隋四朝所组成的北朝史。北魏统一北方近百年,最终分裂为高欢专权的东魏和宇文泰执掌的西魏。欢、泰二人各挟天子,争霸不休,其子嗣则受禅称帝,改东西魏为北齐、北周。北齐终为北周所灭,而篡夺了北周江山的隋朝则扫平南朝,完成一统。

可知,北齐是北朝后期才出现的王朝,以其为叙事中心,意味着杜纲对北朝的历史时段有所截裁。《北史演义》虽以北史为名,却未囊括魏、齐、周、隋二百年,其仅截取了自魏末失政到天下归隋的九十年,着力展现魏分东西与齐周争雄。如此选材,杜纲实自有

收稿日期:2022-04-12

作者简介:江恺杰(1994-),男,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用心。

首先,魏末分裂与争霸的历史在通俗认知中可自成单元。托名金圣叹的《三国演义志序》已将“东西魏”与“南北朝”并举:“自古割据者有矣,分王者有矣,为十二国,为七国,为十六国,为南北朝,为东西魏,为前后汉。”[4]可知,东西两魏及其衍生的北齐北周虽是北朝史的组成部分,但亦可视作相对独立之时段。况且这段历史已然“头绪尤多”[2],足以撑起一部小说,将笔墨专注于此亦不失为一种选择。

其次,选定这段历史,对小说的创作与接受颇有助益。历史演义作为通俗读物,其作者常以类型化叙事来迎合大众审美习惯与认知经验。《三国志演义序》称,“凡自周秦而上,汉唐而下,依史以演义者,无不与《三国》相仿。”[4]《三国演义》正是该文类创作与接受的类型模板。而北朝后九十年的历史轨迹与汉末三国恰有一定相似性,均可总结为“乱自上作—百姓揭竿—权臣跋扈—群雄蜂起—鼎足而三—重归一统”。

同是乱自上作,汉末有灵帝昏庸、十常侍祸国,魏季有宣武帝失政、胡太后乱邦;同是百姓揭竿,汉末有黄巾起义,魏季有六镇之乱;同是权臣跋扈,汉末有董卓,魏季有尔朱荣;董卓败后群雄蜂起,尔朱荣死后亦有高欢、尔朱兆、尔朱天光、贺拔岳、贺拔胜、侯莫陈悦等各据一方。汉末群雄互噬,唯余魏蜀吴鼎足而三;魏季大浪淘沙,仅剩高欢、宇文泰并峙北方,加上南朝则神州又呈三分之势。魏蜀吴兴则俱兴,灭则俱灭;高氏与宇文氏相继而起,北周灭齐后亦不旋踵而亡。

由此可知,以北朝后九十年为演义题材,在《三国演义》为世人所尚的文化氛围中,能满足类型化的叙事要求,具有天然的读者接受优势。

再次,历史演义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在“服考古之心”的同时,还须足够传奇,以“动一时之听”[4]。而演义的传奇性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历史素材本身的奇谲。魏季至隋初的历史正可用一“奇”字作结。胡寅《读史管见》言,自魏室倾颓,“一时人才角出,东西战争,智谋之士,不可胜数。”[5]托名李贽的《史纲评要》直言,魏季之后,世道“起起倒倒,世界上今日个皇帝,明日个皇帝,真奇!真奇!”[6]而这段历史中,又以高欢、宇文泰双雄争霸最为瑰伟。正所谓“两国手争能,不相下哉,宜志士览古乐观而忘倦也。”[4]高欢与宇文泰,瓜分魏土,各据东西,才智不分轩轾,用兵地丑德齐。胡应麟阅遍史书,亦不禁感叹:“考古今两雄相抗,齕而随振,殆而辄安,未有如贺六(高欢字贺六浑)、宇文二霸主也。”[7]所以,北朝后期的历史,尤其是高欢、宇文泰的争雄史,亦即北齐、北周的开基史,是绝佳的演义素材。杜纲选择将笔墨倾注于此,可称妙手。

二、“以北齐为主”的史学权衡

既然专注书写北朝后期历史,并峙的北齐与北周俱是叙事中心的可选项,然则北齐兴亡何以作为小说的叙事主线?由于隋唐两朝承继自北周,故而隋唐修史以北周为正朔,以北齐为“霸朝”。杜纲却舍弃北周,而倾笔于“非正统”的北齐,并以北齐奠基人高欢为小说中心人物。这与历代对北齐的历史认知以及对高欢、宇文泰不同的历史评价有关。

北齐虽非正统,然自隋唐以降,史著与史论对北齐之关注更甚于北周。魏土初分之时,高欢尽占东魏八十州膏腴之地,兵强马壮;宇文泰据守西魏三十三州,国用不足。高澄当政时,“气摄西邻,威加南服”[8]。高洋称帝之初,武威赫赫,使“秦人不敢东顾”[8]。奈何高洋后期暴虐恣睢,高殷、高演享年不永,高湛、高纬荒淫无道,致使北齐国势日衰,最终攻守易势,反被北周吞灭。北齐的兴勃亡忽、强弱递变,自隋唐以来为世人反思与探讨。

对去齐未远的隋朝与初唐君臣而言,北齐兴亡是颇受关注的历史议题。《隋书》载,隋文帝在禁锢太子杨勇前曾言:“朕近览《齐书》,见高欢纵其儿子,不胜忿愤,安可效尤邪!”[9]《旧唐书》则载,唐高祖以北齐斛律光遭谗蒙冤为戒,无视谣言而任用崔善为[10]。《贞观政要》数次记载唐太宗与群臣探讨北齐旧事,从“齐之失国”[11]中汲取教训。《新唐书》亦记载太宗就北齐《伴侣曲》与南陈《玉树后庭花》,与杜淹讨论“亡国之音”[12]。文臣进谏亦时以北齐昏君为鉴戒,如李纲谏唐高祖宠幸舞工[12]、于志宁谏李承乾任用宦官等[12]。傅奕、姚崇力主排佛,也以北齐佞佛亡国为训[10]。

对北齐旧事的关注,反映到史学领域,便是北齐史著作在隋唐时期的涌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以及《新唐书·艺文志》收录的北齐史著作,除

了初唐官修“五代史”之一的《北齐书》外,还有隋代李德林《北齐书》,王劭《齐志》《齐书》,姚最《北齐史》,崔子发《齐纪》以及唐代张太素《北齐书》。相较之下,北周史著作除“五代史”之一的《周书》外,仅有隋代牛弘与唐代吴兢的两部《周史》。

宋明以后,史论特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录“史评”类书籍中,有论及东西魏及周齐间史事者,对高氏政权之论述常常多于宇文氏政权。笔者对代表性著作的论述条目作了如下统计(表 1):

表 1 史评类著作针对北齐、北周史之论述情况

Tab.1 Discussion of historical review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and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作品年代	著作	论及北齐高氏的条目数量(单位:则)	论及北周宇文氏的条目数量(单位:则)
宋	胡寅《读史管见》[5]	44	32
明	王志坚《读史商语》[13]	11	3
明	于慎行《读史漫录》[14]	13	4
清	华庆远《论世八编》[15]	5	2
清	施宏《澄景堂史测》[16]	15	13
清	戴璟《新编汉唐通鉴品藻》[17]	5	3
清	尤侗《看鉴偶评》[18]③	8	0

另外,明代朱权的《通鉴博论》,在北齐三帝高洋、高演、高湛的小传后,均有以“按鉴论断”起头的评论,以总其得失;对北周诸帝却仅述生平,无一字评论附于传后[19]。

由此足见,相较于奠定隋唐大一统的北周,北齐这个恢弘开局、荒唐收尾的历史失败者反倒更具启示意义,亦更值得关注。杜纲将北齐作为小说叙事中心,很可能是对上述史学观念的继承。总之,依据古人认知传统,“演”北齐高氏休戚之史,更能传达王朝兴衰之“义”。

以上论证是基于“王朝史”的宏观角度,而在北齐、北周的相关历史中,最为精彩的是高欢、宇文泰这两位王朝奠基人的争雄史。因此,要回答杜纲为何在选择叙事中心时舍周而就齐,还需解释杜纲为何倾笔于高欢而非宇文泰。个中缘由,与二人不同的历史评价有关。

高欢、宇文泰才智相为颉颃,观二人德行,又均有仁民爱物之名。高欢“仁恕爱士”,使民苏息(《北史·齐神武本纪》)[20],宇文泰“明达政事,恩信被物”[20],但二人身为权臣,都曾悖逆臣节。高欢曾起兵与意图收回权力的孝武帝对抗,致使孝武帝出奔关右;宇文泰执政西魏时,先弑孝武帝元修,后弑废帝元钦。杜纲在《凡例》中也称“欢逐君,泰弑主”[2],似将二人之“丑行”对标。

乍看之下,高欢与宇文泰难作善恶忠奸之分。然而,从封建伦理角度出发,二人的历史评价实则有别。关于高欢逐君之事,《魏书》认为孝武帝受谗臣离间,向高欢发难,事败后出奔关右,实乃“自绝宗庙”“天下所弃”[21]。《魏书》为北齐魏收所作,自然偏袒高欢,但其评判却对后世史论影响深远。胡寅《读史管见》也认为孝武帝“孽自己作”“事发无名,宜其败也”[5]。朱权《通鉴博论》批判孝武帝“逞一朝之忿,弃累世之基,舍高欢之亲厚,就宇文之疎薄,甘心出奔,自绝大位。”[19]清代葛震《诗史》亦称“出帝猜忌,自绝宗庙,西如长安,虎尾是蹈。”[22]可见,论史者多以为错在孝武,而非高欢。据史载,高欢在孝武帝出奔后,自觉臣节有亏,故而有心补过。他遥闻孝武帝遇弑,便欲为之举哀。对于另立的孝静帝,他更恪尽臣礼,终身恭侍。高欢之“补过”,甚得后世认可。司马光《稽古录》认为高欢“虽有逐君之惭,而能惓惓尽恭以事静帝,没身不怠,此其可称也。”[23]胡寅称高欢“有援立之劳,而无悖逆之迹。”[5]宋人南宫靖一对高欢颇为肯定:“高欢因魏氏丧乱,尔朱残酷,于是有匡主正国之心,四十启之邀,迎君不见,听措身亡所不得已。戴善见而君之,其志亦可念也。”[24]

相较之下,宇文泰弑君之行被视作万恶不赦。后世认为,纵使孝武帝德行有亏,“要非臣子所宜弑者”[25]。因此,宇文泰的道德评价要下于高欢。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将宇文泰与王莽并论:“宇文泰弑君之罪,甚于高欢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拟,亦一莽也。”[26]南宫靖一则言:“泰既鸩孝武又黜废帝,迹其所为,特乱臣贼子之所作,视贺六浑有惭德焉。”[24]更有如胡应麟者,不仅批判宇文泰,还为高欢政权不被视作正统而鸣不平:“考当时促欢受禅者甚众,欢皆力折之,而泰鸩其君而竟篡之国, 则欢之贤泰不啻倍蓰, 而后世东魏并称何也? ”[7]由此足见,基于封建伦理视角,以欢为是,以泰为非,在杜纲之前就已近乎定谳。

欢、泰二人历史评价有别，道德形象不同，而重视塑造小说主角的正面形象，恰是杜纲的创作习惯。杜纲在《南史演义》中选择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四位开国之君为核心人物，是因他们“多有善政可纪”[27]。他在拟话本小说集《娱目醒心编》中也多以孝子、烈女、忠臣、义士为主角。而细绎《北史演义》，我们更可发现，杜纲为使主角行为符合封建伦理，不惜对史实加以改动。例如，高欢早年曾参与六镇起义、追随“贼将”杜洛周，个中原因于史无征。《北史演义》则言高欢本志在抗贼，只因一家性命遭杜洛周胁持而不得不屈从。正史记载，高欢离开杜洛周后，还曾投奔另一叛军领袖葛荣。小说则改为高欢“闻葛荣强暴，胜于洛周”，打消了投奔之念，将高欢这段“附逆”经历隐去。《北史·后妃传》还记载，高欢欲强娶游氏，因其父游京之不许，“遂牵曳取之，京之寻死。”[20]小说则改为游京之受命献女，高欢“待之以上宾之礼”。综上推断，对于小说的中心人物，杜纲总是力保其行为之正当性。如此作者，在欢、泰之间做选择时，应难以将宇文泰这个弑杀二帝的权臣设为小说主角。

小说行文也透露了杜纲对高欢的袒护和对宇文泰的批判。杜纲写高欢与孝武帝爆发冲突时，借高欢之口反复强调“我不负帝，帝今负我”“我能容人，人不容我”。第二十八卷还虚构了孝武帝遣妖人谋害高欢，更突出高欢逐君乃迫不得已；而有关宇文泰之情节，则是另一番安排。小说第三十八卷述可朱混道元“不与逆臣为伍”、叛离西魏投奔高欢。杜纲借道元之口表明“今泰擅行弑逆，其恶更甚于欢。”第四十六卷写贺拔胜郁愤而死，提到“贺拔胜以欢有逐君之罪，不肯为之下，及归长安，视泰行事，不让于欢，心郁郁不乐。”然而，据史所载，可朱混道元叛变是因与高欢有旧，且家眷滞留东魏；贺拔胜悲愤而死是因诸子被高欢所杀，二者均与宇文泰的不臣之举无关。杜纲的有意设置，足见其对欢、泰二人臧否有别，据此亦可理解杜纲为何舍泰而就欢。

三、“以高氏为重”的文学考量

历史演义的创作需考虑史料特征与文类属性的耦合。杜纲选择以“霸朝”北齐为叙事中心，必是以文学视角斟酌史料后作出的决定。

演义是带有文化商品性质的通俗读物，杜纲创作《北史演义》亦以普及史事、使“智愚共见”[2]为目的，其在选材与创作中必然要照顾大众的认知习惯。而高欢、宇文泰各自的创业模式与集团特征，与大众认知的契合度有所不同。

草泽英雄发迹创业的故事向来为大众钟爱，刘邦、刘备、钱镠、郭威、朱元璋等莫不如是。演史者为迎合此审美，甚至不惜篡改历史人物之形象。如各类五代故事将正史中“儒行翩翩”的赵匡胤塑造成草莽游侠；《飞龙全传》把望族出身的柴荣改为贩伞之徒。高欢本为怀朔镇一戍卒，身份上天然契合草泽君王的类型化叙事。杜纲亦称“草泽英雄大有人，六浑才略更无人”，以高欢为小说中心人物，无疑是看中其身份所蕴藏的叙事潜力。

在大众认知里，草泽英雄开国创业的历程是以世俗“小契约”之缔结推动“治国平天下”的“大契约”的践行。这些“小契约”关系包括乡党故旧、血缘姻亲、义父子、义兄弟等。例如在汉初故事里，刘邦集团的核心是萧何、曹参、卢绾、夏侯婴等高祖“少小亲旧”；《三国演义》中，刘备的事业起点是桃园结义；《英烈传》里，朱元璋起家的资本是汤和、邓愈、郭英、吴桢等贫贱之交。而高欢的创业模式同样符合此种认知。高欢携亲旧共出乡关，历经征战，最终化家为国。其集团之核心正是他生活于怀朔时结交的党友亲眷，如司马子如、孙腾、刘贵、侯景、段荣、尉景、娄昭等。这些名臣猛将与高欢“始敦乡党之情，终定君臣之契”（《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28]。《北齐书》将他们称作“齐氏元功”，并比之刘邦的“丰沛故人”、曹操的“颍川元从”[8]。

正因高欢与其股肱之臣不仅有君臣之分，亦有亲友之谊，使得高欢与臣下之交往颇具世俗色彩。段荣曾与高欢共同逃难，是高欢的生死弟兄；司马子如可以出入内廷，曾调解高欢、高澄、娄昭君的家庭矛盾；尉景曾与高欢贫贱相依，他因贪污被高澄责罚，高欢亲往抚慰，听其抱怨；彭乐在邙山大破西魏军却放走宇文泰，还向高欢夸耀胜利，高欢喜怒交加，不顾君王体面亲手殴打这位爱将，又“命取绢三千匹压乐背，因以赐之”[28]。可见此二人不似君臣，倒似江湖兄弟。凡此事迹均被杜纲收入《北史演义》中，用以烘托高欢草泽

君王之形象。吕思勉曾批评高欢是不知礼乐的“犷悍之夫”[29]。诚然,高欢不如崇儒好古的宇文泰重礼法、知分寸,但从文学审美角度看,其气质朴野的人物形象对于市井读者无疑更具亲和力与吸引力。

相较之下,宇文泰虽亦起自寒微,但其集团的形成与架构较为特殊。宇文泰的西魏集团是由不同势力组成的联盟,他们因贺拔岳之死、孝武帝西奔等事件聚合于关陇,共推能力出众的宇文泰为领袖,以抗衡称霸山东的高欢。正如吕春盛所言,西魏的诞生是“诸势力从冲突走向妥协,共同创立政权。”[30]西魏集团的核心人物中,赵贵、于谨、李虎、侯莫陈崇与宇文泰同为贺拔岳旧部,地位本不相上下;李弼为侯莫陈悦旧部;斛斯椿、王思政曾是孝武帝近臣;贺拔胜本是北魏封疆重臣,独孤信则是其旧部。他们并非宇文泰的部曲僚属,且各具权势。《周书·赵贵传》载:“初,贵与独孤信等与太祖(宇文泰)等夷。”[31]《于谨传》载:“谨既太祖等夷。”[31]《贺拔胜传》载:“胜至关中,自以平位素重,见太祖不拜。”[31]宇文泰与西魏诸臣保持着共掌政权的等夷关系,甚至宇文泰去世时,“群公各图执政,莫相率服”[31]。直到宇文护改西魏为北周,翦除赵贵、独孤信等勋贵后,宇文氏才实现权力集中。可知宇文泰终其一生都未完成“化家为国”,他同其他西魏重臣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君臣关系。这无疑与“有一代开辟之君,必有一代开辟之臣”[4]的演义书写模式相左,更与大众对君王创业的一般认知相龃龉。对于小说创作者而言,相比于叙写西魏诸势力的妥协与平衡,描绘高欢潜龙升天、群龙相随的图景显然更能取悦读者。

除了集团架构、创业模式与大众认知经验相契,高欢的经历特征也比宇文泰更符合演义的叙事要求。

高欢见于史书的传奇经历与诸多经典叙事母题耦合,能满足大众对草泽君王的浪漫想象。高欢寂寂无名之时,豪族小姐娄昭君就以风尘巨眼识得英雄,以身相许。《北史·后妃传》载:娄昭君“见神武于城上执役,惊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数致私财,使以聘己”[20]。“哲妇识英雄”是为人乐道的叙事母题,更是“寒门发迹”故事的重要环节。高、娄二人的相遇,与《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的柴夫人识郭威、《破窑记》中的刘月娥识吕蒙正、《鹤林玉露》中的梁红玉识韩世忠等异曲同工。杜纲也因此不吝笔墨,以才子佳人笔法将此事敷演为长达三回的精彩内容。

英雄凭借异相、奇遇窥知天命,则是发迹故事中另一重要母题。刘邦斩白蛇后,乃自知是“赤帝之子”;《飞龙全传》中,赵匡胤尚未成名,便已被相士苗光义尊称万岁。《北史·齐神武本纪》也记载了类似故事:青年高欢与友人狩猎于沃野,却逢山野异人。其人“善暗相,遍扪诸人,言皆贵,而指麾俱由神武。”等到高欢意欲回访,方知“本无人居,乃向非人也。”[20]杜纲将其演绎为“骋骑射沃野遇仙”,许宝善则批注道:“正如汉高斩白蛇气象。”[2]史家可能套用了帝王异相的模板来为高欢立传,但其客观效果却使有关帝王发迹的各种母题在高欢故事中得以承继。这些记载虽是英雄出世的常规戏码,但将其写入小说,却可与读者的审美惯性同调律动。

高欢步入乱世漩涡后,正史记载中仍不乏戏剧性场面。高欢遭杜洛周追杀时奔逃惶惶,乃至抛弃长子高澄,幸其被段荣救起。这一幕与汉高祖败逃弃子,夏侯婴救护幼主之情形绝类。高欢在信都时,利用饱受欺压的六镇士兵对尔朱氏的憎恶,告喻众人:“直向西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20]从而鼓动将士举起反旗。此情此景,与陈胜在大泽乡发动戍卒颇为酷肖。直至高欢生命将熄,仍有悲闻《敕勒歌》、遗计平侯景等传奇故事。以上史料,杜纲在小说中或抄掇,或演绎。正所谓“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妙文。”[4]高欢的史料记载已精彩若此,小说家又岂能不对其有所偏好?

宇文泰之史料在丰富性与传奇性上则不及高欢。不论《周书》《北史》抑或《资治通鉴》,对宇文泰的早年经历皆记录寥寥。他归顺尔朱荣之前的史载近乎空白,仅知其曾先后追随鲜于修礼和葛荣。而同时期的高欢,已是尔朱荣的爱将,随尔朱荣进军洛阳、另立新帝、讨平义军,见证、参与了诸多大事件。此后,高欢逐步崛起,最终翦灭尔朱群雄,控制北魏朝廷;同一时段的宇文泰,还在贺拔岳帐下为人驱驰、替人画策。这不仅意味着宇文泰的早期经历不及高欢传奇,更表明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于核心史事无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对历代要事作了“原始要终”的梳理,在《元魏之乱》一章中,高欢已是主要人物,提及宇文泰的却仅有他劝贺拔岳袭取长安这一处[32],足见其在乱世之初的

边缘处境。优秀的历史演义,须能在纷繁史事中抽绎大端、详其本末,将核心事件编织为因果连缀的完整链条。毛宗岗即赞《三国演义》"有追本穷源之妙","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4]欲达臻此境,须使中心人物之生平轨迹与历史主线相契,其视域应囊括较完整的历史进程。由此观之,更早登上乱世主舞台的高欢比长处边缘的宇文泰更适合作为中心角色。

宇文泰的事业轨迹有类《三国演义》之东吴孙氏。割据江东的孙氏集团长期游离于汉末争霸的主战场——中原之外,直到曹操扫平北方,南北冲突正式爆发,孙氏集团才算登上乱世主舞台。所以,纵使不考虑正统性问题,孙吴也难作为《三国演义》之叙事中心。与之相似,宇文泰早年经历不详,归顺尔朱荣后又随贺拔岳西入关陇。而魏季争霸的焦点是北魏都城洛阳,先后有尔朱荣、元颢、尔朱兆、高欢等势力围绕洛阳鏖兵不已。直至高欢扫平山东、剑指关陇后,东西冲突方成北朝主要矛盾。宇文泰至此方有机会登上历史主舞台。可知,宇文泰的视角不足以包纳魏季乱世的主线。而《北史演义》能做到"头绪虽多,皆一线贯穿"[2],写史事"无一漏处"[2],与杜纲选择高欢而非宇文泰为中心人物不无关系。

四、结语

北朝二百年,高氏、宇文氏之争霸尤为精彩,其中又以高欢、宇文泰双雄角力最为奇谲。杜纲演绎此段历史时,选择高氏政权为叙事中心,以北齐奠基人高欢为中心人物,乃是经过史学权衡与文学考量后的审慎之举。高氏王朝霸权衰变、兴亡忽焉的历史充满启示性与戏剧性,杜纲着墨于此,是对传统史学聚焦的继承,亦使小说有雨覆风翻之妙。高欢与其宿敌宇文泰才略不分轩轾,但二人历史评价的不同让重视封建伦理的杜纲青睐于高欢。且高欢经历传奇,史载丰富,其鱼龙腾变的人生正是绝佳的演义素材。杜纲借北齐高氏的"变化之事",书成"变化之文",谱写了一个非正统"霸朝"的兴衰史诗。而借由对《北史演义》的细绎深究,我们亦可对历史演义之创作法则稍作蠡测。演义作者在钩沉史料、选定题材时,会受史观传统、伦理价值、大众审美、文法要求等因素制约。能综合考量诸要素,并借熔裁史料以激发文学表现力者,方可挥成演史佳构。

注释:

① 何德章《北齐书说略》:"唐人本身视东魏北齐为霸朝,即非正统王朝。"参见李学勤、安平秋等著《二十五史说略》,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年,第 218 页。

② 例如,段启明、张平仁《历史小说简史》认为,《北史演义》对"北齐事叙之最详",能"注意情节的主次、连贯,把枝蔓、繁多的事件尽可能地统一到一条情节线上"。参见段启明、张平仁著《历史小说简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08 页。

③ 尤侗《看鉴偶评》并未录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此列举,仅作比较之用。

参考文献:

[1] 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87.

[2] 杜纲.北史演义[M].许宝善,批注.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1-3,68,428.

[3] 欧阳健.历史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335.

[4]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895-987.

[5] 胡寅.读史管见[M].刘依平,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463-540.

[6] 李贽.史纲评要注(二)[M].李勤印,校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53.

[7]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M]//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二九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37.

[8]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115,309.

[9]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235.

[10]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716,3027,5088.

[11] 吴兢.贞观政要[M].骈宇骞,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458.

[1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61,3908-4004.

[13] 王志坚.读史商语[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八七.济南:齐鲁书社,1996:332-338.

[14] 于慎行.读史漫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八五.济南:齐鲁书社,1996:534-538.

[15] 华庆远.论世八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九〇.济南:齐鲁书社,1996:238-240.

[16] 施鸿.澂景堂史测[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九一.济南:齐鲁书社,1996:250–272.
[17] 戴璟.新编汉唐通鉴品藻[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八二.济南:齐鲁书社,1996:671–675.
[18] 尤侗.艮斋杂说续说 看鉴偶评[M].北京:中华书局,1992:248–249.
[19] 朱权.通鉴博论[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八一.济南:齐鲁书社,1996:109–113.
[20]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0–519.
[21]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90–292.
[22] 葛震.诗史[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九一.济南:齐鲁书社,1996:655.
[23] 司马光.稽古录[M]//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一二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80.
[24] 南宫靖一.小学史断[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八〇.济南:齐鲁书社,1996:730,731.
[25] 秦镜.删定通鉴感应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二九一.济南:齐鲁书社,1996:442.
[26] 王应麟.困学纪闻[M]//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五四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06.
[27] 杜纲.南史演义[M].许宝善,批注.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557.
[28]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4915–4954.
[29]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19.
[30] 吕春盛.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M].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61.
[31] 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220–248.
[32]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64:1975.

(责任编辑:白 琳)

The Epic of an Unorthodox Dynasty: The Choice of Narrative Center in Romance of Northern History

JIANG Kaiji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Romance of Northern History by Du Gang of the Qing Dynasty is a later masterpiece among the historical novels. Du Gang chose the unorthodox Northern Qi Dynasty as the narrative center, which has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meaning.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he prosperous and demise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is a historical issue that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since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lthough Gao Huan, the founder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was a dictator, he received a high moral evaluation from historians of all dynasties, which was in line with Du Gang´s ethical pursuit when shaping the protagonist. From a literary point of view,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especially the record of the rise of Gao Huan, are quite rich and legendary. Using them as novel material can cater to the public´s aesthetics and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the narrative. Du Gang´s consideration in choosing the narrative center also shows the general rule of romance creation, that is, when writers cut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y will be constrained by factors such as historical view traditions, ethical requirements, public cognition, and novel grammar. Only by creating works under the premise of taking into account all the elements can a masterpiece of romance be achieved.

Key words: Romance of Northern History; Northern Qi; narrative center; historical tradition; novel grammar

伪本如何进入经典——《四部丛刊》影印缪氏抄本《慎子》始末

李 艳

（福建警察学院 基础课教学部，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四部丛刊》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籍影印典范之作，但也存在少量底本选择失误情况。其中《慎子》所据缪氏蕘香簃抄本出自明万历间慎懋赏刻本，后被证明是慎氏伪造。考其影印入《四部丛刊》始末，反思其失误缘由，有益于当今的古籍整理。

关键词：《四部丛刊》；《慎子》；慎懋赏；缪荃孙；孙毓修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58-07

张元济先生主持编印的《四部丛刊》，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籍影印典范之作，初编、续编、三编陆续出版之后，宋元旧椠、旧抄名校化身千百，成为学人书斋中的常用版本，流布广泛，影响巨大。《四部丛刊》初印成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三百二十三种，共八千五百四十八卷。1926年至1929年重印时，抽换其中二十一种版本，冠以“初编”序次。1934年又印成“续编”，收书八十一种，一千四百三十八卷；1936年又出“三编”，收书七十三种，一千九百一十卷。[1]《印行四部丛刊启》中提出《四部丛刊》有“七善”，即所印皆属四部要籍、皆为未经剪裁的原本、较多旧本秘籍、便于求书、便于庋藏、编印清雅、便于购买等，其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选择版本的精善。然而因书囊无底、商借不易等多种原因，也有若干品种选择底本不甚理想；如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中所举，将《盐铁论》明刻本误认为弘治间涂祯刻本[2]；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选择底本失当举例”中所举，明黄省曾注《申鉴》用嘉靖覆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所用非真金晦明轩本；《欧阳文忠公集》所用元刻本实际是明天顺刻本；《高太史大全集》用所谓明景泰刻本实际是正德、嘉靖间重刻本等[3]。其中尤以《慎子》所用缪荃孙蕘香簃抄明万历间慎懋赏刻本最为人所诟病，使得明人伪造之本经过改头换面被影印入《四部丛刊》。本文依据各家记载，考索《慎子》影印始末，以为今日整理古籍的镜鉴。

一、缪荃孙抄校明慎氏刻本《慎子》的来源

《慎子》原是先秦古书，旧题周慎到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今《慎子》，刘向所定，有四十一篇。”[4]《汉书·艺文志》：“《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5]《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著录十卷，《旧唐书》著录有滕辅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一卷，云“今麻沙刻本才五篇，固非全书也”，“《崇文总目》言三十七篇”[6]。宋末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云：“今三十七篇亡，惟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7]则至宋代仅存五篇。

至于其传世版本，主要有以下数个系统及重要版本：其一、明万历间，无锡人周子义等辑刻《子汇》，所收《慎子》一卷，即传世五篇，又附辑自《意林》佚文十

收稿日期：2022-08-18

作者简介：李艳（1982-），女，汉族，助教，主要从事古代汉语、古典文献研究。

二条。万历间又有冯梦桢辑绵眇阁刻《先秦诸子合编》,收入《慎子》一卷五篇。清《四库全书》本一卷五篇,提要云"此本虽亦分五篇,而文多删削,又非陈振孙之所见,盖明人捃拾残剩,重为编次"[8],除《意林》外,又自《文献通考》辑得佚文二十条。其二、清嘉道间,严可均、钱熙祚从《群书治要》中辑出《知忠》《君臣》两篇,且依据唐宋类书对于传世五篇多所校正,钱氏本后刻入《守山阁丛书》,严氏所辑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其三、元末陶宗仪辑《说郛》一百卷,近人张宗祥据明抄本六种汇校后, 民国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内有《慎子》一卷五篇,有滕辅注。

然而又有明代吴县人慎懋赏(字云台)于万历六年(1578)刻《慎子内外篇》一种,内容较传世之本增加更多。慎氏刻本流传甚稀,未见清人著录,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该本完整者仅著录上海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两家之藏。近人陈乃乾也曾藏有一部慎氏刻本,后经缪荃孙抄写影印入《四部丛刊》。陈乃乾(1896—1971),浙江海宁人,系藏书家陈鳣后人。早岁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预科,民国间曾任职于上海进步书局、古书流通处、中国书店、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偶或参与经营,印行古书。编有《清名家词》《室名别号索引》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任职中华书局,主持古籍影印工作,印行过《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汉唐地理书钞》《清人考订笔记七种》等。

陈乃乾所藏之本,自称是其家旧藏,大约 1914 至 1916 年间售于藏书家张钧衡。张钧衡(1872—1927),字石铭,乌程(今湖州)南浔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经营商业,性喜藏书,藏书处名"适园",辑刻过《适园丛书》《择是居丛书》等。按清代以来,自钱曾《读书敏求记》开古书版本鉴赏风气,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兼载序跋、各为解题的藏书志出现,晚清藏书家不仅多喜编纂藏书目录, 也颇多效仿前人编撰藏书志者。此风到民国时期仍未衰歇,或为藏家自撰,或延请目录版本学者代撰。代撰者如叶昌炽代潘祖荫撰《滂喜斋藏书记》,缪荃孙代潘宗周撰《宝礼堂宋本书录》,缪荃孙、董康、吴昌绶代刘承幹撰《嘉业堂藏书志》,其中尤以缪荃孙(字筱珊,又作小山,藏书处名"艺风堂""云轮阁")代人编撰最多。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云:

> 筱珊晚年以代人编藏书目录为生财之道,人亦以专家目之,造成一时风气,如今之翰林先生为丧家点主题旌然。已刊行之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适园藏书志》,自撰之《艺风堂藏书记》,及未刊之《积学斋藏书记》《嘉业堂藏书志》皆出其手。然筱珊对于此事,实未经心,仅规定一种格式,属子侄辈依样填写而已。[9]

陈氏所举各藏书志代撰情况并非全近事实,如南陵徐氏《积学斋藏书记》并非缪氏代撰[10],钱塘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缪氏仅为编纂协助者[11],其中《适园藏书志》确为缪氏所代撰。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中有较多代张钧衡编写书志的记载。如乙卯(1915)二月九日甲寅:"交《还山遗稿》与石铭。刘翰怡来。石铭订编书之约。"[12]其中所记"订编书之约"即指约定代撰《适园藏书志》。此后张氏时常送来所藏珍善之本,请据以一一撰写书志。如《艺风老人日记》丙辰(1916)五月十八日,"石铭送书来。即编《适园书目》"[12];二十日、廿三日、廿四日、廿五日、廿六日,也均有"编《适园书目》"的记载,所云《适园书目》即《适园藏书志》。当时为求迅速成书,撰好的书志即交付刊刻,以流水线形式作业,才能在两年内编毕刻成。《艺风老人日记》丙辰(1916)十二月八日,"腊八日壬寅,雨。还适园末单书。勘《书目》毕。代撰序言,自撰序言"。十日,"校《适园藏书序》及《适园自序》"。十二日"《适园藏书志》十六卷成,送石铭并书"。十七日,"石铭送编书志修来"。[12]缪氏代撰书志的过程中,遇到佳善之本或罕觏秘籍,常加以传抄。明万历慎氏刻本《慎子》,就是在 1916 年五、六月间抄自张钧衡藏本。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丙辰五月廿三日辛卯,"石铭《慎子》甚佳,是旧本"。六月八日乙巳,"校《慎子》"。九日丙午,"校《慎子》"。十日丁未,"校《慎子》"。十一日戊申,"校《慎子》。" 十四日辛亥,"再校《慎子》"。[12]所谓"校",当指缪氏对抄成之本略作校勘。十八日乙卯,"送弟五单书六十八与石铭。又还《慎子》《平圃遗稿》,发刻之;未还《隋志》《五代史补》;又《陆谨庭年谱》、"月泉吟社"六本、《西吴里语》交刻。《滋溪集》三部。"[12]即将原书及《慎子》书志交还张均衡。

当时缪氏据明万历慎氏刻本《慎子》,曾取《守山

阁丛书》本相校勘,以为高出各本之上,所撰《适园藏书志》(民国五年南林张氏刻本)卷八子部三杂家类著录此《慎子内外篇》明刻本,云:

周慎到撰。赵人慎子之学,观庄周《天下》所称,近于释氏,然《汉志》列之法家。《汉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滕辅注;《崇文总目》作二卷三十七篇;《四库》作一卷。此本作内外二篇,明湖人慎懋赏刻本,较《四库》本、守山阁本均不同。守山阁据《治要》《御览》各书辑为逸文者,此均有之,虽互见《鬻子》《庄》《老》等书,亦诸子之成例,似高出各本之上,而各家书目亦未著录。懋赏号云台,渊博嗜古,读书扬文坞中,广采百家,为之汇正,并为音释两篇。

因诧为秘笈,缪荃孙乃请抄胥抄写一本。该本即《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慎子》内篇一卷外篇一卷逸文一卷,缪荃孙辑,稿本"[12],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该本用"蕅香簃钞"格纸,内篇为抄胥所抄,《知忠》《君臣》两篇及《慎子逸文》可能为缪氏手抄。书中有"荃孙手斠""云轮阁"印,书末有民国五年丙辰(1916)缪氏手跋,略云:

《隋书》《唐志》均十卷,《子钞》《慎子》一卷,《崇文总目》二卷三十七篇,《书录解题》则称麻沙刻本五篇,愈传愈少。《四库》据明人刻本,只有五篇。严铁桥据《群书治要》,有七篇,已多于明本。守山阁刻之,又辑零句四十二条附于后,亦以为搜罗略备矣。今得明慎云台懋赏本,刻于万历戊寅,分内外二篇,内篇三十六条,外篇五十三条,严辑零句,有二十一条在内。雄深雅健,是法家言。与环渊、许犯、田系问答语,楚襄王、孟子、赵王、齐王问答语,均收之。至于字句与他子书相似,则古书旧例,不足为怪,惟无篇目耳。严铁桥、张啸山均未见此本,亦可谓惊人秘笈矣。急为录副,而以《治要》二篇附之,并附逸文于后。岁次丙辰,江阴缪荃孙识。

该跋后编入《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四,文字略有修改。

二、《四部丛刊》影印缪氏抄本《慎子》的经过

《四部丛刊》自 1915 年酝酿,1920 年开始陆续出版。[①]第一期 58 种于 1920 年 6 月出版,至 1923 年 3 月分六期出齐全部 323 种,即后来所称的《四部丛刊初编》。其中《慎子》在《四部丛刊》第二期于 1920 年 11 月印行[②],牌记作"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蕅香簃写本景印原书叶心高营造尺六寸三分宽四寸八分"。影印缪氏抄本后,又附铅字排印之《慎子逸文》《慎子内篇校文》及孙毓修跋。孙跋述此本原委云:

《慎子》刘向校定四十二篇,《隋》《唐志》皆十卷,《崇文总目》二卷三十七篇,是其文代又散佚。《书录解题》称麻沙本五篇,则宋末通行之本已与今同。江阴缪氏蕅香簃藏写本,盖从明万历间吴人慎懋赏刻本钞录者,其书分内外篇,内篇三十六事,外篇五十事,较《四库》本、守山阁本均不同。守山阁据《治要》《御览》各书辑为逸文者,此均有之,似高出各本之上,而从未见收于著录家之目,亦可谓惊人秘笈矣。艺风先生又据《群书治要》补出二篇,并附《逸文》于后,毓修更以《艺文》《御览》及《治要》、守山等本校其异同,缀于简末,《慎子》善本当推此矣。刻成,先生已归道山,辄诵海岳"赏物怀贤心不已"之句,为之慨然。庚申十月无锡孙毓修跋。

可知《慎子内篇校文》乃孙氏所撰。孙毓修(1871—1923),字星如,号小绿天主人,无锡人。清末廪贡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曾任苏州中西书院教习,三十三年(1907)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高级编译。宣统二年(1910)年开始协助张元济辑印古书,对商务出版《涵芬楼秘笈》《续古逸丛书》等多有贡献。孙氏对于《四部丛刊》的贡献较大,据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总结,主要有六个方面:"即选目初稿的拟定,已印、未印、拟印、拟购书目的分类与统计;影印底本的选择审定,缺卷配补;用纸、版式等印刷事宜;与提供影印底本的公私藏家互相联络,商借古书及讨论版本等;受商务印书馆委托,赴各地阅书;对影印底本进行校订,整理或撰写校勘记;撰写解题等。"[12]缪氏抄本《慎子》影印成书是在 1920 年,缪荃孙逝世于 1919 年 12 月,并未及见,所以

孙跋有“刻成,先生已归道山,辄诵海岳‘赏物怀贤心不已’之句,为之慨然”之语。至于借书的时间,检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己未(1919)六月十三日癸亥:

来人陈石遗、孙莘如、刘聚卿,上楼长谈。孙莘如借影钞《孝经》、明刻《子华子》《亢仓子》《鹖冠子》、新钞《慎子》五种。聚卿借影钞元《草堂雅集》去。[12]

则知是在该年六月经孙毓修借给商务印书馆的。按缪氏藕香簃抄本《慎子》实际有两部,其一是撰写《适园藏书志》时请抄胥抄写之本,即《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此后缪氏据抄胥所抄之本又手抄一部,所谓“新钞”,即指后者。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缪氏藕香簃抄本《慎子》,题缪荃孙辑《慎子》内篇一卷外篇一卷逸文一卷,正文中有较多校改,其抄写笔迹与校改笔迹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校改笔迹与《四部丛刊》影印本相似,当同出缪荃孙之手。孙氏借到缪氏新抄之本后,以《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及《群书治要》、守山阁本《慎子》等,校其异同,撰成《慎子内篇校文》,再与该批所借缪氏藏本数种一并于七月交张元济定夺。《张元济日记》民国八年(1919)7月10日记此事云:

星如交来向缪小山处借到《鹖冠子》(明板)、《孝经注》(影宋抄)、《亢仓子》《子华子》《慎子》等,拟先照前两种。至《慎子》只照原书,不印校勘云。[12]

张元济所谓“《慎子》只照原书,不印校勘”,应非不印孙毓修《慎子内篇校文》,当是将缪氏过录《守山阁丛书》本之校勘等删除,仅印缪氏“新钞”本中的正文。

缪氏抄本影印前,孙毓修曾将其与绵眇阁本、守山阁本相校勘,也因其多出的“外篇”而产生怀疑。孙毓修《留庵读书记》之《慎子》条云:

绵眇阁本止存“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守山本从《群书治要》补“知忠”“君臣”二篇,惟此明慎懋卿本多外篇,但郑渔仲所见已止五篇,此盖杂取《鬻子》《墨子》《韩子》《国策》诸书附益为外篇也。③

由“此盖杂取《鬻子》《墨子》《韩子》《国策》诸书附益为外篇”一句推测,孙氏可能是将“外篇”视为慎懋赏辑佚之作,并信从缪荃孙“似高出各本之上”的判断,以为所辑超出他本。

此外,孙毓修应当未见到缪氏所据之明万历间慎氏刻本。比勘慎懋赏刻本与国图藏缪氏抄本、《四部丛刊》本,缪氏在抄写时,已经做了较大改动。一是将慎氏刻本中的慎懋赏序、王锡爵序、汤聘尹后序,及慎懋赏所作《慎子传》《慎子考》《慎子评语》《传补》《外篇直音》等删除,仅留《慎子》内外篇。二是将慎氏刻本的注释删去,如慎本内篇首句“天有明不忧人之暗”有双行小字注解云“天之明无私,照而何忧于暗”;“地有财不忧人之危也”句,注云“地之利,足以养民而何忧于贫”;慎本外篇“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句,注云“天下清宁少事,故车旗无所用,民命无所残也”,并因此将“明吴人慎懋赏解”,改题“明吴人慎懋赏校”。三是过录钱氏《守山阁丛书》本之校语,如该本《民杂》篇“人君自任而务为善以先下”句,过录钱氏校语云:“原刻务作独,依《治要》改。”缪氏又云“此本不误”。四是将《守山阁丛书》本所附《慎子逸文》删减若干条目,附于外篇之后。《守山阁丛书》本《慎子》钱熙祚跋云:“旧本后有《逸文》,不知何人所辑。内有数条,云出《文献通考》,今检之不可得,且郑渔仲所见已止五篇,安得《通考》中尚有《逸文》?寻其文句,盖杂取《鬻子》《墨子》《韩非子》《战国策》诸书,以流传既久,姑过而存之。”可知《慎子逸文》来源已久。五是将《守山阁丛书》本中《知忠》《君臣》两篇补于慎氏刻本外篇之后。此两篇原是钱氏从《群书治要》中辑出的,《四部丛刊》本孙毓修跋所谓“艺风先生又据《群书治要》补出二篇,并附《逸文》于后”云云,当是误读缪跋中“而以《治要》二篇附之,并附逸文于后”之语,遂将所补两篇、所附《逸文》均误归于缪氏名下。此外,缪氏抄本也并未全据慎氏刻本抄录,内篇“桀、纣逆天暴万物”以下七事,慎氏刻本所有者,缪氏抄本却无之[17];“礼从俗,政从上,使从君”以下三事,慎氏刻本所无,而缪氏抄本却有[17]。缪氏增补三事,大概是从《艺文类聚》《文选注》《意林》《太平御览》引《慎子》中辑出。

三、各家对《四部丛刊》影印本《慎子》的辩伪

《四部丛刊》编印之初，曾将拟印书目向多位治目录版本之学者征求意见，《慎子》被叶德辉质疑，理由是“《鬻子》《慎子》本非完书，又非古本，无关考证，可以删除”[18]，但最后仍被收入。《四部丛刊》影印缪氏抄本《慎子》后，起初尚少异议，傅增湘曾在 1927 年 6 月 27 日建议商务重印《四部丛刊》时调整若干底本，其中《慎子》建议改用傅氏自藏明刻本，即以明慎懋赏刻本替换缪氏抄本，并未对慎氏刻本产生怀疑。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八子部二著录该本，云：

《慎子内外篇解》二卷，明慎懋赏解，明万历慎懋赏刊本，九行十六字，注双行。前王锡爵序，次慎懋赏序，次《慎子传》，次《慎子考》。每篇后附直音。钤有“松陵范氏安礼堂收藏图书印”。（余藏）[19]

然而当时商务已经又据缪氏抄本重印过，商务经办人向张元济报告时称“已印，不及改”，故张元济回复傅氏函谓“《诗外传》《盐铁论》《中论》《慎子》《杨仲弘诗》则均已印成，不克更换，甚为可惜”。[20]

学人指出缪氏抄本所据明刻本系慎懋赏伪造的，首先是梁启超。梁启超在 1927 年发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演讲时提及：“再如《慎子》，《汉志》有之，后佚。《百子全书》本乃宋以后人零凑而成，其中一部伪托，一部由古书中辑出。近《四部丛刊》有足本《慎子》，系缪荃孙家藏书，说是明人慎懋赏传下的，显系慎懋赏伪造，为同姓人张目。缪氏是专门目录者，居然相信这种伪书，我们看见之后，大大失望。”[21]此后又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说“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例如最近忽发现明钞本《慎子》一种，与今行之《四库》本、守山阁本全异，与《隋》《唐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所记篇数无一相符，其流传之绪又绝无可考。吾侪乍睹此类书目便应怀疑。再一检阅内容，则可定为明人伪作也。”[22]直接指出其为伪作，但将缪氏钞明刻本称作明钞本，是偶一失察。

慎氏刻本被指为伪书后，最初收藏该本的陈乃乾，又在 1929 年以“中国学会”的名义影印《慎子三种合帙》，包括《慎懋赏注慎子内外篇》《子汇本慎子》《守山阁本慎子》三种，各书牌记有“共读楼校印书”字样。其中《慎懋赏注慎子内外篇》有陈乃乾跋，云：

《慎子》内外篇各一卷，明吴兴慎懋赏云台辑并注。万历戊寅自刻于武康，而附载首尾者，有传有传补，有考有评，有直音有序跋，其致力于是书，可谓勤矣。顾《慎子》原本四十二篇，自宋已散佚，后世所传仅五篇，且脱略不相属。今云台所刻，虽不逮原本，然校通行五篇者，固倍蓰矣。其何自而得之耶？明人选辑古书，皆不著所出，非独云台也。今去云台之世又三百载，其将何所据而究其源。余家藏此书，缪艺风先生叹为秘笈，尝假录正文，而删其注及附录。商务印书馆即以缪钞印入《四部丛刊》中者。墨本既布，学者哗然，指为伪书。余曰：书而伪，其责在云台，无与艺风事。若泯云台之名，而以艺风当之，不可也。夫辨伪书者，其识力有至有不至，非一人一言所得裁定也。且伪书之传世亦多矣，苟其文雅驯，亦足资文章博洽之士，而云台爬罗剔抉之功可念。予故影印此书，将与当世学者共论之。

此篇跋文为《陈乃乾文集》所未收，故全录于此。因跋中有“余家藏此书，缪艺风先生叹为秘笈，尝假录正文，而删其注及附录。商务印书馆即以缪钞印入《四部丛刊》中者”之说，缪氏抄本的来历才得以清晰。

《慎子三种合帙》出版以后，原来仅依靠缪氏抄本的辨伪工作更进一步，直接针对之前难以见到的慎氏刻本。梁启超弟子罗根泽撰成《慎懋赏本〈慎子〉辨伪》，1929 年 12 月发表于《燕京学报》第六期，后收入《古史辨》第四册。该文从八个方面进行证伪：一来历不明，宋元人及明人所见皆剩余五篇，而慎氏本多出十数倍；二与先秦子书所载慎子思想矛盾；三抄袭《韩非子》《战国策》《墨子》《鬻子》《新书》《吕氏春秋》等；四据《意林》及他书所载《慎子》逸文而略有附益；五与唐修《群书治要》所据古本《慎子》不合；六混慎子为禽滑厘；七有晋人所造孟子之字；八尚有严可均、钱熙祚所辑逸文轶出慎氏本。[23]慎懋赏注《慎子内外篇》明刻

本影印之后,罗根泽又于 1931 年在《国学丛编》第一期第四册发表《慎懋赏〈慎子传〉疏证》,进一步证明明人慎懋赏刊本《慎子》全系伪书。其文小序云:“近中国学会印《慎子三种》,亦收慎懋赏本,较《四部》本增多慎懋赏序、王锡爵序、汤聘尹序,及慎懋赏所作《慎子传》《慎子考》(《慎子》书之著录)《慎子评语》《传补》《外篇直音》;由是此惊人秘笈始全暴于世。《序》《考》《评语》皆无关宏恉,《慎子传》全非事实,而与《内外篇》相依为命,故不嫌辞费,再为疏辨驳正之。罗根泽,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识于北平。”[24]

其后又有方国瑜撰《慎懋赏本〈慎子〉疏证》,1934 年 11 月发表于《金陵学报》第四卷第二期。文中将慎懋赏钞袭群书编成该本的来源于每事每段一一寻出,方氏自序云:

> 予暇时读周秦以下诸子百家之书,见其余此本合,辄随手记诸简端。久之,日益多,乃复缮为清本。虽予之所摘,是否即懋赏之所取,不敢自必;而懋赏之所剽窃,与其以意为之增损,予未能悉发其覆而纠其谬者,亦或往往而有;然固已得其十之八九矣,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此书初拟仿孙志祖《孔子家语疏证》例,概括言之。然就其文以证其事,则多为诸子常语,往往互见于各家书,难于质言。盖懋赏钞诸子书,间有附益删节。故具载慎本原文,而录其所出者于下,条举而件系之,一一注明所据本之卷页,以便覆案。其间稍有异同,览者自能知之,不待一一校雠。至钞袭他书而文过长,其书习见者,则于疏证颇加删略,惟校其异文而已。[17]

经过此番疏证,慎懋赏本作伪痕迹昭然若揭,作伪方式得以破解。此后学人研读《慎子》时对慎氏刻本、缪氏抄本更为慎重。如 1935 年,世界书局排印《诸子集成》,所选《慎子》则用《守山阁丛书》本。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中列举《四部丛刊》底本选择不当的例子,说:“《慎子》用缪荃孙藕香簃传抄明万历时慎懋赏刻本,这个本子大部分出于慎懋赏伪造,即慎氏万历时原刻亦无足取,何况是个新传抄本,如一定要用旧本,本可以用明绵眇阁刻本或《子汇》本,如要足本,则不如用《守山阁丛书》本。”[3]间接地也将中国学会影印《慎子三种合帙》的客观意义揭示出来。

四、余论

缪氏抄本之底本、陈氏影印之底本《慎子》明刻本,后随张氏适园部分藏书一起,在 1941 年经郑振铎介绍,售与当时的中央图书馆,1949 年随该馆迁台。《“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卷三子部杂家类著录《慎子》两部:其一为一卷一册,旧钞本;其二为《慎子》二卷附传补一卷二册,旧题周慎到撰,明慎懋赏注,明万历七年武康慎氏耕芝馆刊本。[25]后者当即张氏适园旧藏。而《四部丛刊》所据的缪氏手抄本《慎子》,则最有可能在缪氏卒后藏于孙毓修处。孙氏亦好藏书,其藏书处名“小绿天”(又作“小渌天”)。《小渌天孙氏鉴藏善本书目》著录《慎子内外篇》,云:“周慎到撰,一册,钞本,有校。”当即缪氏“新钞”本影印入《四部丛刊》者。《小渌天孙氏鉴藏善本书目》有民国间排印本,据王绍曾先生推测,当是孙毓修生前自定藏书目录,著录善本书凡 489 种,“其中收入《四部丛刊初编》者十七种,除少数几种未见书目著录外,绝大多数均见孙氏《鉴藏书目》。其身后如果系归涵芬楼所有,则 1932 年‘一·二八’之役恐已成为灰烬”[26]。孙氏卒后,其藏书逐渐散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家人委托张元济主持出售。初由修文堂孙实君、修绠堂孙助廉与孙伯渊三家书商合力收购,后来“陆续为沪上、北京、南京等地藏家购去,故孙氏遗书目前较为分散”[14]。由此推测,缪氏“新钞”本《慎子》如果不是在 1932 年日人炸毁商务印书馆附设东方图书馆被时被毁,就是在五十年代被售出,是否存世,尚无线索。

至于绵眇阁本等为代表的旧本、《守山阁丛书》本为代表的足本《慎子》,则以其流传有绪,且能与出土文献相印证,而愈加受人重视。[27]

当前古籍影印事业承近代《四部丛刊》等余绪,出版规模更大,影印技术更为先进,但在影印底本的选择上,仍存在不够理想的情况。认真总结近代以来古籍影印的成绩,反思古籍影印失误的例子,对于当今的古籍整理而言,无疑是有益的。

注释：

① 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1915 年 5 月 29 日条引《商务印书馆股东会会议记录簿》(未刊本)："现在并拟刊印旧书，定名《四部举要》，计万余卷，积高约百尺以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412 页。《张元济年谱长编》1920 年 5 月 8 日条引《商务印书馆股东会会议记录簿》(未刊本)："从前筹备之《四部举要》(现已改名《四部丛刊》)卷帙浩繁，因连年中国纸张缺乏，价值增涨，故不敢贸然从事。现在本公司备存中国纸张较为充足，拟分期印售一千部，定于本年阴历四月间第一期出书时发行预约券，分连史纸、毛边纸两种。全部共计二千数百册，一售六百元，一售四百八十元。此为保存国粹一方面所用者。"第 593 页。

② 《申报》1920 年 11 月 20 日第二版《商务印书馆发行〈四部丛刊〉第二期书目》："第二期各书计共六十一种、三百六十六册，月内可以出版，兹将书目列下……《慎子》一册，钞本。"

③ 孙毓修《留庵读书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此承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乐怡老师检示。

参考文献：

[1] 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62.

[2]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84.

[3]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29,30.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2347.

[5]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1735.

[6]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92.

[7] 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七五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8.

[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07.

[9] 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M]//陈乃乾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9.

[10] 柳向春,南江涛.整理前言[M]//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

[11] 石祥.八千卷楼书事新考[M].上海:中西书局,2022:175.

[12] 缪荃孙.缪荃孙全集(日记三)[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372,446,475,476,450,450.

[13]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94.

[14] 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1:40,114.

[15] 缪荃孙.缪荃孙全集(日记四)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145.

[16]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11.

[17] 方国瑜.慎子疏证[M]//方国瑜文集(第五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324,326,305.

[18] 王逸明.新辑郎园信札诗文[M]//叶德辉集(四).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397.

[19]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652.

[20]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2.

[21] 梁启超.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48.

[2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1.

[23] 罗根泽.慎懋赏本《慎子》辨伪[C]//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25.

[24] 罗根泽.慎懋赏《慎子传》疏证[C]//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38.

[25]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M].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82.

[26] 王绍曾.小绿天善本书辑录案语[M]//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4.

[27] 单育辰.从战国简《曹沫之陈》再谈今本《吴子》《慎子》的真伪[J].出土文献研究(第 12 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91.

(责任编辑：白　琳)

How Does a Bogus Book Become a Classic: The Process of Shenzi Being Copied into SIBU CONGKAN

LI Yan

(Basic Course Teaching Department, Fujian Police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SIBU CONGKAN is a model work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photocopyi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but there are also a few mistakes in the selection of base books. Among them, the master copy of Shenzi is Miao Quansun´s Transcript that according to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by Shen Maoshang in the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which was later proved to be forged. Studying how it was copied and reflect on the reasons for this mistake is very beneficial to the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 today.

Key words: SIBU CONGKAN; Shenzi; Shen Maoshang; Miao Quansun; Sun Yuxiu

用西洋乐器讲燕赵故事
——钢琴版《燕赵故事》的演奏分析

张雅婷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系，福建 南平 353000）

摘 要：《燕赵故事》是作曲家鲍元恺先生1990年创作的一部集民歌与交响为一体的大型管弦乐套曲《炎黄风情》中的第一组曲。描绘了燕赵大地上人们悲愁喜乐的生活画卷。乐曲2007年由朱培宾执笔改编为钢琴曲。结合原作管弦乐版的创作分析，从民间旋律音调和民族传统乐器的模仿两方面对钢琴改编组曲《燕赵故事》的演奏进行分析。希冀在钢琴教学实践领域获得更加深入的启发，也为钢琴教育的民族化积累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和灵感。

关键词：《燕赵故事》；民间旋律；民族乐器；演奏分析

中图分类号：J2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65-05

一、《燕赵故事》的创作概况

《燕赵故事》（钢琴版）是鲍元恺《炎黄风情——24首中国民歌主题钢琴曲》（由朱培宾改编）第一乐章，其改编源于何处？源头要追溯到作曲家鲍元恺1990年创作的一部集民歌与交响为一体的大型管弦乐套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24首管弦乐曲》（以下称管弦乐版《炎黄风情》）。2007年，与其相对应的《炎黄风情——24首中国民歌主题钢琴曲》（以下称钢琴版《炎黄风情》）改编完成。钢琴版《炎黄风情》原汁原味保留原作管弦乐音响色彩与原作共生，又与其创作背景和改编手法有相通之处。因此，在探讨钢琴版《燕赵故事》演奏分析前，要先了解原作的由来及改编情况。

（一）管弦乐版《炎黄风情》的产生

20世纪70年代，中国音乐深受西方音乐体系影响，中国音乐的发展越来越西方化，导致我国的传统音乐逐渐走向衰退，整个中国传统音乐处于低谷期。在这充满矛盾的大环境中，鲍元恺先生不遗余力的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力图通过“中西融合，雅俗共赏，时空结合”的创作理念及技法，让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被世界所接受。[1]

1990年，鲍元恺在和著名指挥家谭利华的交谈中，提到受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西方音乐与中国听众在空间上距离遥远，存在空间差；中国古典音乐相隔几百年，与听众在时间上相隔久远，存在时间差，认为：“中国民间音乐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审美情趣在世界音乐宝库中绽放异彩，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通过与西方交响乐的融合进一步挖掘其深刻的内涵，让中国听众透过自己所熟悉的民歌曲调了解西方交响乐；同时，也让外国听众通过自己所熟悉的交响乐了解中国民间音乐独特的魅力，便是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2]因此，将民歌改编成管弦乐作品的念头油然而起，便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以展现中国传统音乐为主的《中国风》交响音乐系列的创作，其中管弦乐版《炎黄风情》就是这一系列音乐的首篇，管弦乐版《炎黄风情》的诞生，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带来了一丝曙光。

收稿日期：2021-10-14

基金项目：闽北职业技术学院2021年度教育科研项目（MJKA2015）。

作者简介：张雅婷（1987-），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钢琴教育研究。

(二)钢琴版《炎黄风情》的改编

原作管弦乐版《炎黄风情》自问世以来受到世界各地广泛关注,先后在天津、广州、纽约、巴黎等四十多个国内外地区演出 400 余场,引起国内外听众强烈的共鸣和高度赞扬。2005 年底,人民音乐出版社热情邀约鲍元恺将管弦乐版《炎黄风情》改编为钢琴曲,鲍元恺决定委托其学生朱培宾执笔进行管弦乐版《炎黄风情》的钢琴化改编工作,管弦乐作品中不适宜弹奏的部分,由原作者鲍元恺进行修改,改编工作历时两年,最终于 2007 年底全部完成。钢琴版《炎黄风情》的改编,填补了我国大型管弦乐作品改编为钢琴组曲的空白,为我国钢琴改编组曲的曲库注入新鲜血液。

二、钢琴版《燕赵故事》中民间旋律音调的演奏

河北是人杰地灵的燕赵之地,有景色宜人的坝上高原,又有广阔无垠的平原;有渤海之滨悠缓漫长的海岸线,又有绵延不断的太行山。受地域的影响,河北民歌在表现形式上有抒情叙事的小调,也有粗狂豪迈的山歌,还有铿锵有力的号子,在这些表现形式中曲目最多的是小调。

钢琴版《燕赵故事》选取《小白菜》《小放牛》《茉莉花》和《对花》等以小调为表现形式的河北民歌,最大限度保留原管弦乐作品的音响色彩,充分发挥钢琴这件西洋乐器独有的音乐表现力,通过符合钢琴艺术规律的加花变奏,使钢琴化的演奏织体类型更为丰富,而作品中富含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不仅提高音乐形象的表现力,同时也增添作品的民族意境和神韵。笔者从中梳理并分析出该组曲的演奏大致可分为慢板抒情类和快板节奏类两种类型。

(一)慢板抒情类

以钢琴主题组曲《燕赵故事》中《对花》为例,“对花”是我国民歌中广泛流行的一种传统小调,唱歌者采用前问后答的方式嬉戏娱乐,歌曲的演唱形式多种多样,有用乐器伴奏,有用锣、鼓边舞边歌。[3]《对花》这首乐曲的主题旋律采用河北流传的同名民歌音调,中部旋律源自另一首河北民歌《放风筝》,乐曲生动描绘了热烈、欢腾的对歌场面。《对花》(图 1)中采用以季节为主题,问答花名的对唱形式,通过钢琴音域的变化,来模仿男女间一问一答的对话。谱例中,前两个小节在管弦乐演奏中采用双簧管,在钢琴演奏上则通过中低音区来模仿男声的问“春季里来什么花儿开?”后两小节在管弦乐中采用长笛,在钢琴演奏上则通过高音区来模仿女声的答“春季里开的是迎春花”。在这一问一答中,右手前两小节中用中低音区模仿男声的幽默风趣,左手用中声部八分音符分解和弦作为伴奏织体,使音乐更加具有流动感,紧接着后两小节用高音区来模仿女声的明亮清脆,此时左手八分音符的跳奏,在管弦乐中使用了弦乐拨弦,呈现出一片欢快、热闹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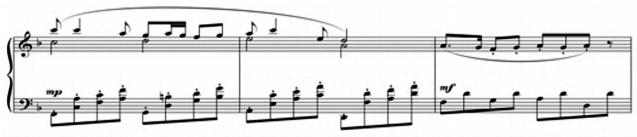


图 1 对花(片断 1)

Fig.1 Can you guess what flower it is

又如,《对花》第 28 小节处开始到第 38 小节处(图 2),这一乐段中,右手旋律在保持四度双音弹奏连贯性的同时还要表现跳音欢快幽默的音乐特点,左手伴奏旋律则使用反复循环的表现方式,反复持续 D–A–C–D 这几个音符,从单音到八度音,高低音区旋律的重复,力度的升华,使旋律的呈现一次比一次生动。弹奏时采用手指指尖肉垫部位“抚摸式”的触键方式,踏板的使用根据连音和跳音的变化交替而不断更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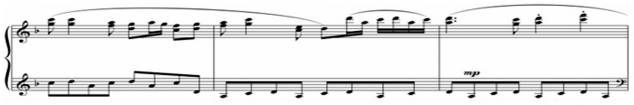


图 2 对花(片断 2)

Fig.2 Can you guess what flower it is

以作品《小白菜》多声部主题旋律乐段(图 3)为例,河北民歌《小白菜》是一首结构简单、篇幅小的单旋律作品。原作者在原民歌旋律的主题上采用了支声部衬腔的手法,反复进行三次的主题旋律变化,每一次声部、力度的变化都使旋律织体更加多样化。

乐曲开始 1–4 小节大二度音程的下行级进,给乐曲增添了凄凉、悲哀的色彩,7–12 小节中高声部两条“线性”旋律的彼此模仿,把作品中表现哀婉情感的主题旋律,刻画的淋漓尽致。在弹奏过程中,特别注意的是手指触键的“抒情性”和“歌唱性”。在触键上,“抒情

性”并不等于“软”,而是柔中带刚。触键的方法:掌关节自然支撑,借手臂力量贴键演奏,下键速度慢,即“揉弦”之感。在“歌唱性”的演奏处理中,要关注高音旋律的歌唱性,还要用类似于女中音稍稍低沉的音色来进行中间右手对位独白旋律的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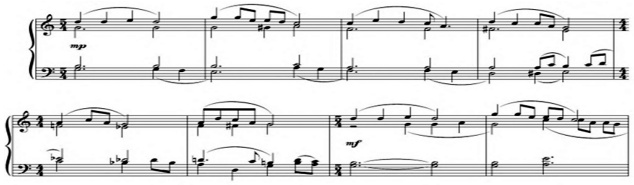


图 3 小白菜

Fig.3 Little Cabbage

再如,钢琴曲《茉莉花》(图 4)基本上完整保留了河北民歌《茉莉花》的民歌旋律,讲述的是少女以茉莉花自喻,表达了对浪漫爱情的憧憬。曲中含有大量的 2 对 3、3 对 4 等左右手不对称的节奏,给作品增添了几分飘逸感和流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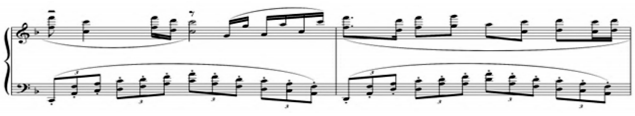


图 4 茉莉花

Fig.4 Jasmine

乐段中,右手采用八度的形式重复乐曲的主题旋律,对旋律声部进行强化,左手则采用三连音双音伴奏。弹奏重点:右手八度旋律线保持连贯,气息拉长,且不能被左手的三连音的伴奏带着走,始终保持旋律的歌唱性,左手三连音双音的跳奏既要跳跃又要保持连贯,既要活泼又不能失大体。

(二)快板节奏类

第四首乐曲《对花》同样给听众展现了具有燕赵大地风格特色的河北民歌。曲子中仅仅 7 个小节就完成 4/4—3/4—4/4—7/8 的四次变化,拍子的频繁变化,铿锵有力的节奏不断交替以及音高材料的重复和反复,使乐曲的律动感明显,第八小节则是以一连串的十六分音符烘托出了主题,渲染了浓厚、欢腾的音响气氛。在演奏时,右手一气呵成的十六分音符快速跑动,左手和弦弹奏的力度触键要“深”,突出重音的效果,在第六、七小节处,采用前十六节奏音型,还需注意音高上细小的变化,力度上强弱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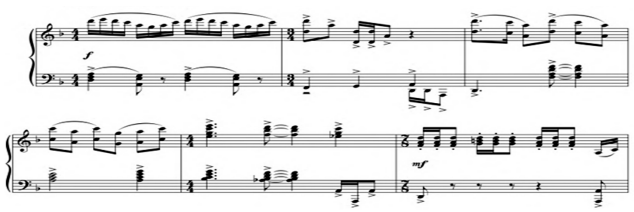


图 5 对花(片断 3)

Fig.5 Can you guess what flower it is

乐曲《对花》的中段部分加入河北沧州民歌《放风筝》的旋律素材,这里是一首“落子”舞曲,落子,是河北省沧州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间舞蹈。沧州“落子”在类型上分为“文落子”和“武落子”。《对花》中段选取民歌《放风筝》素材,该民歌常作为“文落子”的伴唱歌曲。“文落子”在表演时道具的配备上大多用绸绢、板、扇,采用载歌载舞的形式,其中唱歌部分以河北沧州民歌《放风筝》等最为常用,随着沧州落子的传播,《放风筝》等民歌也随之成为有名的河北民歌。“落子舞”在道具上运用简单、轻巧,在风格上“舞多于蹈”,呈现出妩媚、轻柔的舞蹈特点。图 6 中,第 45 小节至 46 小节中快板的四分音符等于慢板的八分音符,二者的速度关系是倍数关系,两个乐段之间的转换容易产生间断感。演奏者在弹奏第 45 小节的休止符处,需严格按照快板速度的休止时间,才能用准确的速度转入第 46 小节的慢板片段,第 46 小节开始采用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两种节奏音型,极富律动性,刻画出一个手执竹板击节入场的女子表演“莲花落”的轻盈舞蹈场面,从中我们也可一窥河北地区的民俗风情。由于北方民歌不同于南方民歌的温婉细腻,在演奏这段“落子”舞场景时,触键上,直白一些,尽可能用手指连奏弹奏,不可过多使用大臂、手腕等力量,不使用延音踏板,真情流露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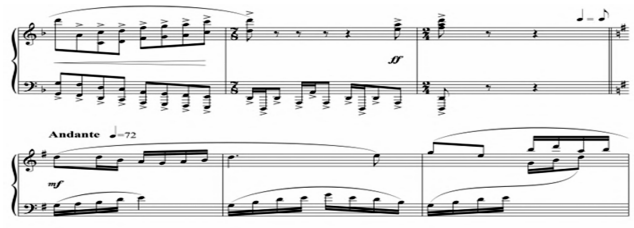


图 6 对花(片断 4)

Fig.6 Can you guess what flower it is

三、钢琴版《燕赵故事》中民族传统乐器的模仿

钢琴版《燕赵故事》巧妙地运用装饰音来模仿民族乐器，塑造民歌中的人物形象，并将民歌中人物的形象刻画的惟妙惟肖，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说书艺人，绘声绘色地向听众讲述“燕赵故事”。组曲中《对花》《小放牛》等分别加入了古筝、笛子、锣鼓等民间乐器，展现出中国音乐独特的“民族性”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式美”。

(一)模仿古筝乐器

古筝这一乐器拥有宽广的音色，虽然音量偏小，但是极具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刮奏技法是其众多演奏技法中最典型的演奏技法，在钢琴演奏中，具有五声民族调式的长琶音，能够较好的模仿古筝行云流水般柔美的刮奏音。

作品《小放牛》一曲中出现的长琶音，弹奏时的音响效果要尽力模仿古筝的刮奏，自由且不适紧凑。在弹奏过程中，手腕放松，指关节坚挺，指尖力量集中，每个音符要做到清晰、流畅，要有行云流水般的起伏，犹如古筝的刮奏一扫而过。(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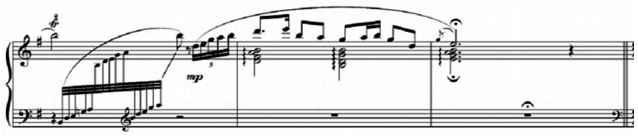


图 7 小放牛(片断 1)

Fig.7 The Cowherd Boy

(二)模仿笛子乐器

笛子是中国乐器中最具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之一，其音色明亮清脆。

《小放牛》中引子部分的高音旋律犹如笛子吹奏般悠扬，描绘出一个阳光灿烂、清风徐徐的清晨，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着竹笛，悠然自得走出村口的场景。演奏时应注意：1)放松。放松包括手腕、手臂、大臂多处放松，简而言之就是指除了弹奏的手指在运动，其余的手指则要放松。所有的颤音都要弹的轻松，听起来流畅，轻松。否则，越紧张越用力，声音就更加笨重。2)均匀。在弹奏颤音时不仅要求弹奏的速度均匀、力度均匀或力度均匀变化，同时也要求弹奏颤音的数量要固定。刚开始练习时先慢练，弹均匀后，再逐步的提高速度。3)独立。手指独立，触点集中，避免声音延留，确保声音清晰。(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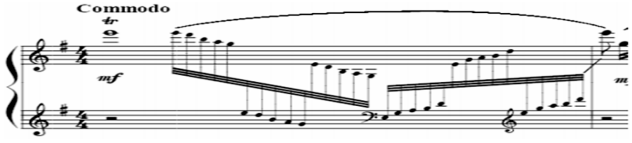


图 8 小放牛(片断 2)

Fig.8 The Cowherd Boy

(三)模仿民族打击乐器

在中国民族音乐的海洋里，民族打击乐器种类众多，包含了钹、大鼓、小鼓、木鱼等，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代表之一。在这些打击乐器当中，鼓占有很重要的比重，人们常用敲锣打鼓来代表喜庆热闹的气氛，锣鼓清脆富有律动的节奏点对气氛的烘托更具有表现力。在组曲《燕赵故事》中分乐曲《对花》《小放牛》均有显著的体现。例如，乐曲《对花》(图 9)中，左右手前十六后八的节奏型不停反复，锣鼓般的节奏，仿佛人群中助威呐喊的欢呼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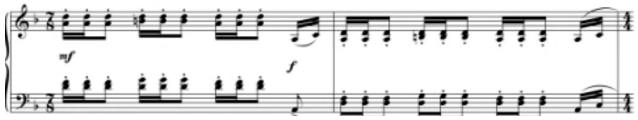


图 9 对花(片断 5)

Fig.9 Can you guess what flower it is

又如，乐曲《小放牛》(图 10)中模仿的是民族乐器中较为典型的锣鼓。在这选段中高低声部的切分节奏以及二度不协和和弦的运用，音响的效果给人更为饱满、密集的听觉冲击，音乐节奏更有律动。在演奏过程中，重音在第二个和弦音符上，双手在进行单音与和弦交替弹奏时，手掌和手指集中发力，协调手腕和小臂力量，适当放松，让和弦的音色更为均匀、集中、饱满，仿佛有律动的敲击锣鼓声。切记直接硬“敲”下去造成音色僵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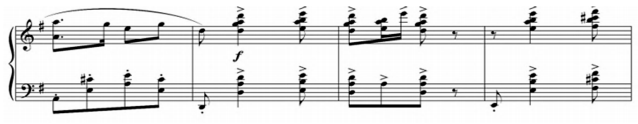


图 10 小放牛(片断 3)

Fig.10 The Cowherd Boy

四、结语

钢琴版《燕赵故事》原汁原味地采用河北流传久

远、脍炙人口的民歌素材,在忠于原作音响效果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西方多声部思维和中国传统音乐线性化的单旋律思维,通过钢琴这一西方乐器与中国朗朗上口的民歌曲调结合在一起,把我们原汁原味的民歌传播出去,使钢琴学习者了解中国音乐的文化精髓,使中国民间音乐走向世界音乐舞台,让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欣赏中国的传统民间音乐。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我国钢琴音乐文献(尤其是钢琴组曲),将一些濒临消失的民间音乐得以延续。

作为演奏者而言,为了能够更好地通过钢琴模仿各种民间元素,从而更好地诠释作品内涵,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音乐表演实践中,应该重视作品的内容、背景等多个方面,从整体上理解作品的文化内涵和作曲家的创作内涵,才能真正掌握整部作品的民族音乐特色;其次,灵活运用丰富的演奏技巧,例如《燕赵故事》中出现的装饰音、八度、音阶、触键方式等各种形式,尤其要注意的是触键方式,这些演奏技巧不仅是能够更好地演奏出富有民族音乐特征最为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增加乐曲表现力和丰富音响效果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鲍元恺.《中国风》的理想与实践[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1):78-80.

[2] 鲍元恺.艺术的出路在于中西融合[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1(3):17-19.

[3] 鲍元恺.炎黄风情:二十四首中国民歌主题钢琴曲[J].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7):163.

(责任编辑:白 琳)

Telling the Story of Yanzhao with Western Musical Instruments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piano version of Yanzhao Story

ZHANG Yat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Minbe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Nanping, Fujian 353600)

Abstract: "Yanzhao Story" is the first suite of a large scale orchestral cycle "Yan-Huang Amorous Feelings" composed by composer Bao Yuankai in 1990. It depicts the sad and joyful life of the Han people in Yanzhao. The music was adapted for piano by Zhu Peibin in 2007.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rchestral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iano suite Yanzhao Story from two aspects: the variety of playing texture types and the prominence of the unique charm of traditional ethnic instruments. It is hoped that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more in-depth inspiration for myself in the field of piano teaching practice, and also provide richer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nationalization of piano education.

Key words: folk melody; ethnic musical instruments; performance analysis

浅议工业产品互动参与式设计及应用的新途径

陈建伟，黎江能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为了探究参与式设计及其具体应用，扩展设计研究范围，丰富产品设计方法，通过对比传统设计与用户为中心设计，从设计思维，网络平台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展开分析，挖掘参与设计的兴起原因及特点，构建参与设计创意流程模型，探寻产品参与设计新途径，指出用户参与设计促进了产品设计的协同体验和互动交流，是产品开发设计中提升产品附加值的一种创新方法。

关键词：参与设计；用户体验；产品设计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70-04

一、传统设计和以用户为中心设计分析

(一)传统设计方式

现代社会物资丰富，生活质量提升，商家逐步重视工业设计为改善产品品质和增加产品附加值所发挥的作用。工业设计起源并服务于工业批量化大生产，传统产品设计由主流市场和大众消费需求引导，设计师根据市场调研和用户反馈信息展开方案创意，随后相应团队完成产品模型和数字样机制作，设计的重点是要确保产品工业化生产制造标准。这种方式中设计师主导创意过程，综合考虑提升产品的实用性、审美性、社会性和认知性等，设计难以全面充分体现用户的反馈要求。

(二)用户为中心设计模式

科技的发展推动材料和工艺创新，丰富了产品的物质形式，用户的消费主张也得到空前满足。产品设计开始关注用户为中心的交互体验需求，以用户使用产品的交互体验和心理感受作为指导思想，包括产品功能实用性的认可，品牌内容的理解以及产品使用环境适应性的评价，意图开发出完全符合用户真实需求的产品[1]。可是不同用户的体验感受不一，需求变化复杂，以及交互情景体验的滞后，严重阻碍了产品的创新。以用户为中心设计难以适应新技术新需求催生概念新产品的开发模式。

二、参与式设计

产品设计需要设计师和用户的协同合作，20世纪60-70年代，参与式设计应运而生。它是一种体现用户声音的设计方法，在整个过程中设计师全面了解并理解用户对产品的交互体验和期望需求，用户参与学习设计手段并借助它们尽量完美地表达各自的期望目标，与设计师协同创意设计。

参与式设计不同于泰勒科学管理理念--利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管理提升效率，它强调发挥参与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借助参与者的经验和技能共同开发并完善；它也不同于以用户为中心设计--只是由设计师代表用户单独完成方案设计；它尊重各方参与者的主体地位，设计方案由参与各方互动学习，共同研究决定并不断沟通交流修正。

收稿日期：2018-08-06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T201266)。

作者简介：陈建伟(1980-)，男，汉族，讲师，主要从事艺术设计研究。

三、参与式设计的兴起和参与方式

图像媒体技术的简易化和智能化降低了专业设计技术门槛，互联网的发展完善为创新创造提供平台,后现代时期人人都是设计师,每个用户都可以定义自己的生活,为原创设计和新概念产品提供自己的智慧,创造体现个性价值的产品,满足自我对文化艺术品味的追求。

(一)互联网为人人参与设计提供平台

个人智能终端和互联网的普及改善给产品设计带来了新的变革。开放的网络环境打破不同行业和专业的知识壁垒,吸纳更广更多的人参与,用户采用多种方式参与产品设计，无论真实的体验还是 VR,MR 增强现实的虚拟仿真,都能直接而全面地向设计师进行第一时间反馈,传统面对面的线下沟通逐渐被轻松便捷的线上参与互动取代[2]。借助互联网平台设计师可获取更完整的信息,发散创意思维,设计各参与方可全面而深入参与产品创意设计和信息数据交流互动。

网络的互联互通,实现了素材资源的共享,创意的收集互补,改变了商家营销制造模式,降低了产品设计开发成本。华为的花粉俱乐部 EMUI 专区,产品设计师会在线上举行一些活动,例如“翻牌吧！花粉”(见图 1) 以问答方式让用户参与每期四天的在线互动,了解用户的需求和产品交互使用体验,用户可以对功能要求在线投票和内测评价,设计师根据用户反馈进行创意设计和功能完善。这种网络社区为所有用户参与产品功能主题定制提供平台,为产品的服务和体验分享数据信息。

图 1 华为花粉

Fig.1 Huawei pollen

(二)单方接受向互动参与思维的转变

传统设计主要从设计方的角度出发,采取意图灌输的方式,将传播信息强加于受众,较少考虑接受者的兴趣、接收环境和行为特征,信息传播达不到良好沟通效果，有时让接收方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情绪。参与式设计尊重参与用户的心理生理需求,关注参与方的个体行为和个性特点,提炼体现部分个体的自我价值,以用户真实体验为基础而展开设计[3]。

优良的设计源于生活需要。传统产品设计虽然有前期的调研和人机分析,但受限于市场趋势和商业制造,停留于人适应产品的时代,难于体现用户的意愿,实现为生活需要而设计。用户参与设计,设计师与用户协同解析生活行为习性,融入用户体验,激发用户深层潜在需求,改善生活方式和解决人们日常生活问题,而不只是为商业价值和潮流趋势而设计。

(三)艺术感染与文化认同的参与

参与式设计不只是一种设计方法和思想理念,更深层次挖掘现代专业学科无法覆盖的隐性文化价值,体现各参与主体对文化的认同,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发展,弥补设计者对文化知识抽象研究理解与用户隐性文化积累的裂隙,促进传统文化融合与继承发展。

中国传统手工艺产品是民间百姓参与创造的瑰宝,通过工匠艺人手工的反复磨练和经验积累延续下来,承载了中国历史长河的深厚文化,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现代人们参与工艺产品设计制作或交互使用体验,从中吸取精神营养,利用新媒介再现传统经典形象。中国明清家具是古代文人和手工匠人共同参与创造的艺术经品,凝聚了艺术美感追求和材料考究制作等多方面的智慧。图 2 作品秉承中国明清家具端庄典雅的特点,采用简约但不失舒适的造型,满足不同年龄阶层用户的文化认同,以及现代材料制作工艺的要求。作品由多个用户共同参与完成,发展了新中式家具中参与式设计的理念。

图 2 中式坐椅设计

Fig.2 Design of Chinese Chair

四、参与式设计应用新探究

(一)参与设计的创意流程模型

日本设计大师原研哉认为:“设计的实质在于发现一个很多人都遇到的问题,然后试着去解决的过程。”[4] 2005 年英国设计协会提出 “双钻设计模型”(见图 3),把设计发现解决问题的流程分为四个阶段: 发现问题–定义分析问题–构思有效方案–交付解决问题。而多方的共同参与互动,可以拓展了设计思维,使创新创意由单一转向跨专业跨领域的多维发散:在发现问题阶段,设计师的调研和用户的使用体验可以还原真实的情景氛围,帮助设计师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准确定位问题;在构思方案阶段,用户的参与能拓宽设计思维,丰富视觉表达方式方法,增添设计创意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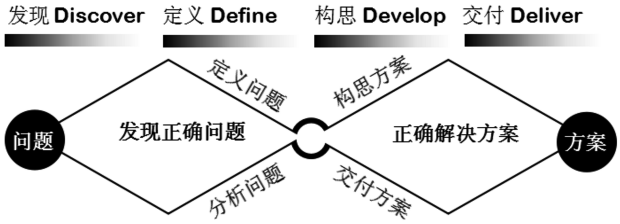


图 3　双钻设计模型

Fig.3　Double diamond design model

(二)参与设计互动创新的新途径

1.源于生活文化的参与设计

设计的解放让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创造,用作品表达生活灵感,解决并服务于生活问题。丰富的生活体验是设计的基础,优秀的设计作品源于对生活的尊重和对日常生活行为方式的真实演绎,而不是权威或专家的评价发布。公园是城市主题文化宣传的窗口,也是休闲娱乐的场所,设计师、在校学生和普通市民共同参与设计公园雕塑摆件, 方案体现了亲民设计理念,以日常生活心情愉悦时的表情为创意形态,提出“每天发呆五分钟,胜吃人参一个冬”设计主题,为行人带来轻松,让小孩倍感亲切,给老人体验悠闲(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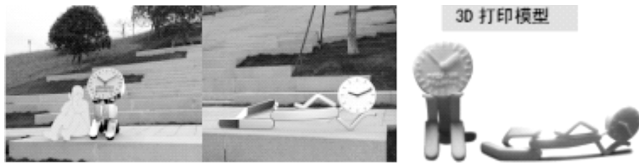


图 4　公园雕塑摆件设计方案

Fig.4　Design scheme of park sculpture

2.参与半成品的后续设计完善

传统设计以人为本,全面服务消费的物质功能和精神文化需求,却难于满足张扬个性和凸显自我价值的非标准化要求。设计半成熟产品,后续由用户参与完善,同时提升过程中娱乐性和参与性,让用户体验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和产品设计文化存在的意义。灯具产品的开放创意设计中采用统一的无线感应底盘,灯具造型可以由用户根据个性需要参与完善。用户以童年游戏为创意源泉,设计了一组充满趣味和个性的床头灯,引发同时代消费者满满的美好回忆和文化认知的共鸣(见图 5)。

图 5　灯具方案设计

Fig.5　Design scheme of lamps

3.变幻的个性模块化设计

模块化设计具有良好的使用环境兼容性,后期维护的可替换性和功能升级的可变更性。不同模块自由组合可以创造式样多变的产品形态,满足不同年龄消费群不同环境不同心情下的使用诉求,提升用户的参与乐趣,受到个性定制消费主张的追捧。

灵感来源于魔方的插座设计,采用模块标准化生产的三角形为单元配件,自由组合不同的造型,打破了外观的单一乏味,增加操作体验的参与乐趣,也满足了不同环境下插头角度旋转和位置变化的使用功能要求(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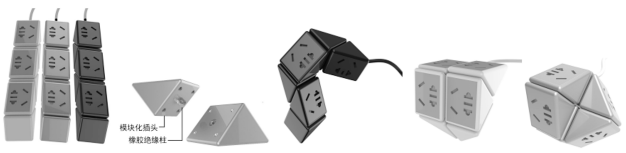


图 6　模块化排插设计

Fig.6　Modular design of plug

4.新技术新材料新需求的设计构想

科技的进步使我们坚信没有实现不了的构想,只

有臆想不到的未来。这些臆想需要集体智慧的创造,跨行业跨领域的大众用户开放参与,众创众筹,数据共享,推动产品创新发展。会说话能交流的服务需求创造了智能家庭机器人, 物联网和 AI 智能感应技术为人类打造生态家居环境,给人们提供图文、视听、娱乐等资源的生态智能服务。

著名产品创新设计公司洛可可,通过众创"洛客"平台与阿里巴巴物流实验室共同设计了菜鸟智能配送机器人小 G(见图 7)。产品可实现自动感知巡航地图,规划优选配送线路,识别各种复杂环境,将快件包裹智能送达收件人手中。

图 7 菜鸟小 G

Fig.7 Smart delivery robot little G

五、结语

参与式设计在产品方案预设时融入设计师的理念构想,在适当的时空中也让使用者带着需求介入产品的决策制定,使产品物性表达实现设计师与使用者的完美接轨。设计与消费互动参与,交互学习,这种良好的反馈方式诠释了产品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意义,支持并塑造了产品设计的用户体验和互动创意行为。方案创意源于生活体验的改良和重新规划,以平民化的艺术形式设计日常生活用品。对产品功能的再利用和物品形态的再定义,增添了产品细节的文艺感,在产能过剩消费变化多样的时代, 既能满足式样创意的消费使用需求,又提升了产品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附加值。

参考文献:

[1] GARRETT J J.用户体验要素:以用户为中心的产品设计[M].范晓燕,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4-10.

[2] 谭嫄嫄,耿道双.互联网时代用户参与制的产品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16(8):82-85.

[3] 吴汉怀,周家乐.从单向传达到交互参与的设计思维转换[J].包装工程,2012(18):23-25.

[4] 原研哉.设计中的设计(全本)[M].纪江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0-24.

(责任编辑:白 琳)

Discussion on the New Approaches of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s

CHEN Jianwei, LI Jiangneng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Z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participatory design and its specific application, enrich product design methods,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design research.By comparing traditional design with user-centered desig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sign thinking, network platform, culture and art, and excavates the reas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se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construct the model of creativ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design and explore new ways of product participating in design. User participation in design promotes the collaborative experience and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of product design, which is an innovative method to enhance the added value of products in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design.

Key words: participatory design; user experience; product design

高校文科类课程翻转课堂适用性的实证研究

陈翠微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翻转课堂教学理念在我国各个教育阶段的教学实践与研究中积极开展。然而，翻转课堂在我国教育的本本土化进程却较为缓慢，有高校文科类课程教师对推广选择使用翻转课堂的有效性提出质疑。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高校文科类课程翻转课堂的适用性进行研究，同时与使用翻转课堂的理科课程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使用翻转课堂的文科类课程师生的焦虑程度不一、满意度并不高、课程学习目标达成度偏低。高校文科类课程教师可以从提升师生对翻转课堂的接受程度、促进大学生深层次学习、强化“教”与“学”的融合及构建合理的课程评价体系等方面来提高使用翻转课堂的可能性。

关键词：翻转课堂；技术接受模型；生成性教学；课程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74-06

自2011年“翻转课堂”引入国内以来，翻转课堂已逐渐成为信息技术推进教学改革的大检阅手段之一，其覆盖面逐渐扩大，已从“新鲜感”转向“新常态”。

翻转课堂是课堂教学方式颠覆性的改革，翻转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和内化，而是重新调整课堂内外时间，将学习主动权由教师转交给学生，突出学生的主体性。这一教学模式重塑了师生关系，重构了课堂教学结构，实现了知识传播手段的升级，拓展了教学时空范畴。高效的翻转课堂组织形式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意识和高阶思维能力。现有研究中，研究者大都集中于课程教学设计[1]、教学模型开发[2]、促学机能等方面，而对其在实践过程中的有效性和适用性研究略有不足。

收稿日期：2022-03-14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部项目（FJ2020X012）；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一般项目（JAS20395）；2019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高校外语教改科研专项）（JZ190089）；武夷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G202105）。

作者简介：陈翠微（1977-），女，汉族，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高校教学管理研究。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翻转课堂作为西方教育技术和商业化的产物，具有美国社会的文化印记和教育背景，在中国本土化的转化进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国内学者研究发现，翻转课堂设想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技能习得水平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3]，而且这一新的教学模式的认可度与接受度也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4]。此外，尝试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教师们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视频制作、优秀资源选择、课堂软硬件环境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诸多原因使得翻转课堂在本土化进程中发展缓慢。关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相关研究从未停止过[5]，不仅是中国，翻转课堂的发源地的美国专家，也对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Harvard开展的研究也认为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并不影响那些能力强的学生，而自学能力弱的学生却因为参与翻转课堂的学习变得更为迷茫，焦虑情绪激增[6]。Atteberry发现学生在参与翻转课堂中所表现出来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态度和考试分数等方面没有太明显

的差异[7]。在教学改革研究领域,各级各类高校仍在大力倡导高校教师建设线上课程,采用已有的优质课程资源或自行录制课程视频,甚至对使用翻转课堂教学的教师给予工作量的补贴,课时量翻了一番。翻转课堂在H高校开展的课程中,得到教师们的反馈有所不同,理科类课程教师和实践类课程教师的反馈满意度明显高于文科类课程教师。文科类课程教师现实教学中出现了课堂“翻而不转”,有的实施完一轮翻转课堂教学后的反馈并不如愿。本研究以某地方应用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使用翻转课堂的情况为基础,采用质性研究范式,探讨翻转课堂在高校文科类学科课程中的适用性及文科课程教师在选择使用翻转课堂时要考虑到的对策。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H高校是一所省市共管的地方应用型高校,地处福建闽北山区,现有学生15000人左右,专任教师800人左右。本研究设计以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汉语言文学专业和物联网工程专业师生为受访对象。受访的师生基本信息如下: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课教师;男性与女性教师各占一定比例;年龄介于25岁到50岁之间;受访的教师有已经使用过一至两轮和正在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授课的教师,也有使用翻转课程申请教学改革立项与结题的教师,其中有的课程被选入校级或省级一流课程,也有正在观望是否使用翻转课堂的教师;受访学生为某专业的大学一年级至大学三年级、参加过翻转课堂学习的男女学生。

采用问卷星设计调查问卷,在线发放给被调查者,以匿名的形式进行。问卷回收后,对问卷进行分析,再对问卷中的某些指标或新发现的问题列出提纲,选择受访对象进行深度访谈。深度访谈主要以一对一的面对面访谈为主。对于受访者根据地理的便宜性确定访谈地点,每次进行不少于四十分钟的深度访谈。访谈开始前,在征得受访者同意之后,对访谈内容进行全程录音。在访谈资料的整理过程中,访谈人员会对受访者进行编号,同时将录音逐字逐句转写成文本资料。

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笔者试图解决的研究问题如下:(1) 翻转课堂教学范式在地方高校人文社科专业的适用性如何?其推广效度如何?(2)为了能更快地适应翻转课堂教学范式,师生应如何做?

三、文科类课程使用翻转课堂满意度并不尽如人意

1.访谈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数据分析

访谈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共284人,收回有效278问卷份,有8位教师和12位学生参加了深度访谈。依据Oxford & Burry-Stock对李克特5级分量表的使用频次分类,平均值介于3.5-7之间为高焦虑水平,平均值介于2.5- 3.4之间为中等焦虑水平,平均值介于1-2.4之间为低焦虑水平,每个维度再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法衡量焦虑水平的高低[8],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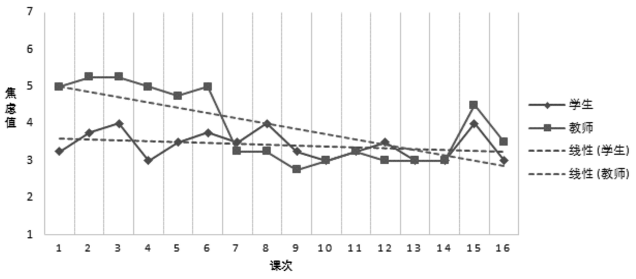


图1 师生焦虑水平追踪

Fig.1 Tracking the anxiety level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纵向追踪发现,该班学生在此课程的焦虑平均值为3.42,标准差为0.37,教师焦虑平均值为3.92,标准差为0.95。通过两条曲线的对比可以看出,在本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焦虑水平较学生焦虑水平更高,波动更大。可见,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方式的改革,对教师教学信念与教学行为的冲击较大,压力明显比不使用翻转课堂的时候更大,而且与学生对比,教师焦虑大于学生。图1数据表明,在前期(第1-6课次)翻转课堂教学时,师生的焦虑值都偏高;在中期(第7-14课次)翻转课堂时,师生焦虑值有所下降并趋于平稳;在后期(第15-16课次)翻转课堂时,师生焦虑值均又有所上升。可见,本课程在使用翻转课堂前期,师生对翻转课堂新形式还比较陌生,学生带着“盼望,希望尝试”的态度进入课堂,教师带着“我选择的教学资源是否能适合每位学生的自主学习”“我组织的课堂教学活动学生是否适应”和“我制作的课程是否优秀”的心

情,所以表现为教师焦虑大于学生焦虑;在使用翻转课堂中期,师生已磨合并适应了新的教学方式,但是翻转课堂要求“以学生为中心”,对学生课前的自主学习要求更高,对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发言”或“小组活动合作”等方式,导致学生焦虑水平整体下降但却略高于教师;在使用翻转课堂后期,处于将要由教师给学生课程综合评价的阶段,也处于期末学生评教的时段,这时师生的“博弈”重新开始了,所以师生双方的焦虑水平有所提升,但在学业成绩评定结束时,师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此组数据分析表明,本课程使用翻转课堂取得了正向效果。

2.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师生深度访谈数据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使用翻转课堂教学的 8 位教师和成绩处于中等的 12 位同学做了深度访谈。本访谈收集了受访师生在谈话中提到的众多的有关翻转课堂的词汇,用词频分析出师生谈到最多的影响翻转课堂效果的词汇总如图 2 所示。师生较多关注的是翻转课程的信息技术的使用,教育理念的更新,学生学习习惯养成、教师教学改革深度及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等。

图 2 师生对翻转课堂中最关注的词汇

Fig.2 Key concepts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most concerned about in flipped classroom

通过深度访谈发现,教师在使用翻转课堂这一新的教学方法效果上,感到如果校方能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资源,那么他们会更乐意尝试使用翻转课堂,学生在课前的自主学习越认真,能给教师翻转课堂中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源;学生若与教师的互动很令教师满意的话,教师可以获得持续性的教学成就感与工作动力,形成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积极互动与教学行为的良性触发,教师甚至可以从教学中获得自身专业成长的力量;学生对网络顺畅度的要求很高,他们不愿意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卡顿的网速上;学生们觉得若在课前的自主学习中,教师对他们提问的反馈速度越快,他们越能有自信心地学习;在翻转课堂现场,教师若能把课前自主学习的重难点与课堂活动融合起来,教会学生深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他们会觉得学有所得,虽然他们在上课的时候是很紧张的,因为要单独回答教师的提问,要与小组成员协作完成任务。在深度访谈中还发现,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互动,也具有“博弈”性。学生会觉得课前的自主学习压力太大,教师布置的任务若过多的话,他们没法完成任务,而教师同时觉得学生在应付,慢慢地当磨合不顺当的时候,最后师生双方总有一方的妥协,有的教师把任务布置的更少一些,难度降得更低一些,甚至就是打个卡,或布置几题在网络上直接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翻转课堂效果和课程的目标要求的达成度并不高,学生对教师的教学精力投入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对物联网工程专业师生深度访谈数据分析

同时,对物联网工程专业使用翻转课堂教学的 6 位教师和成绩处于中等的 15 位同学做了深度访谈。以物联网工程专业《单片机技术》课程为例,该课程的授课教师团队为中高职称,平均年龄在 40 岁左右,内容安排上,基本知识,基本操作,可以观看视频,较好完成课前的自主学习,课中让学生分组讲解练习和讨论,促进学生高阶能力的培养,课后布置更具有挑战性的作业,体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挑战度,高阶性正是现在高校一流课程建设的要求。课堂中,通过学生的讲解,更趋向高阶性的知识讲解,而基本知识更多通过串讲或通过课前任务的学生的疑点的讲解,或以练代讲来检查学生学习情况,或学生分组汇报线上学习成果。另外,在教学协同合作方面更容易组织,同时提升教师团队教学水平,实现以一门课程的增值评价。以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汉语》课程为例,该课程的授课教师为博士,副教授,年龄在 35 岁左右,也从真实的使用翻转课程的过程角度分析为:文科的理论的知识,因学生知识背景,经历,知识储备的不同,学生比较难通过线上自主学习来深刻理解文科的知识,更多需要在面授过程中讲解,启发和点拨,学生学习效果很难在短期内体现出综合能力的提升。另外,在教学协同合作方面因研究方向的不同、教师个人教改投入精力等客观原因很难形成梯队式的教学团队,多

以孤军奋战为主。

通过深度访谈,我们直接切入翻转课堂实施过程的效果的谈论,这种方法不足之处在于,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模式是一种正在时兴的课堂教学改革,对此实施的具体做法、标准各高校都还正在逐步展开,还没有一个规范性做法标准,受访教师本身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施的具体做法,还处在摸索阶段,受访学生也只是被动地在接受访谈时,以现有教师已使用的翻转课堂做法为回答背景,教师的满意度多以自身预期的教学效果为衡量标准,学生的满意度多以自身学习体验感受为衡量标准。

四、文科课程教师需有选择地使用翻转课堂教学

结合上述问卷调查与访谈分析的结果,以下将从“技术接受度”“学生深层次学习”“强化课堂教学”与“课程评价体系” 四个方面具体阐述地方高校文科课程是否适合翻转课堂的教学范式,师生要怎么做才能更快适应翻转课堂教学范式的改革。

1.提升师生对翻转课堂的接受程度,强化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由授课教师选择在线课程资源, 若出现在线课程资源无法满足授课教师的需要,那就需要授课教师根据自己学生的实际来进行录制教学内容。不论是选用现在的在线教学资源还是自行录制课程,教师还需要制作在线测试题及在留言区发起讨论、回答学生问题。教师的焦虑感值上升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使用信息化手段教学如录视频等感觉到阻力,资金投入、个人力量薄弱,要录一段 15 分钟的视频所需要的精力有限,甚至有的教师感到无从下手,他们若是自己录制授课视频,先不提是不是所有教师都有主播能力, 仅编辑视频就是一个技术活,若是求助于专业公司,那么经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学生也是如此,课程过程学习的记录都在教学平台上进行,间或还按教师要求使用像 QQ 等软件,这些教学准备条件对学生的硬件设备提出要求, 几位老师使用的不同的平台或软件的话,他们的“麻烦事儿会更多”。文科类的师生对信息技术的接受能力更弱。

从 20 世纪初开始的“视觉教育”至今,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仍存在“非显著性差异现象”[9],即不同的技术手段在对教育与学习结果的影响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教学成本的投入与教学质量并不成正比,教学范式的改革也并不能提升教学质量。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模式的改革,就像是“本就该走进课堂”,所有教师“就应该使用翻转课堂来教学”,导致作为教学手段的信息化变成了教学改革的目的,成为学校教育的目的,而忽视了教育信息化应该为提高教学质量服的教学本义。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融合促使教师在精通新的教育技术的同时,还必须具备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些技术的能力[9]。

1986 年美国学者戴维斯提出了著名的“技术接受模型”[10], 提出技术系统的使用由人们的行为意向决定,行为意向由使用态度决定,使用态度取决于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个关键因素。前者反映一个人认为使用某种信息技术系统对其工作绩效提高程度,后者反映一个人认为使用某种信息技术系统的容易程度。高校师生接受程度决定了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改革的成效,其中教师对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上更为关键[10]。让高校教师感知到翻转课堂这一教学范式的有用性与易用性。由信息技术支撑的翻转课堂成为学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把信息技术融入课堂并能恰当使用,不仅能提升教学效率,而且也能提高教学质量。要强化教师对信息技术使用意向,在“感知有用”的基础上“感知易用”,让教师“乐于使用”,从而真正掌握翻转课堂这种教学模式, 实施正规的翻转课堂范式,提升对翻转课堂的接受程度。但是,所有的教学模式的改革都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高校教师使用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也是这样。

2.教师进行生成性教学,促进大学生深层次学习

学习的虚拟性使得师生、生生互动始终呈现单向、低频、随机、延时的弱交互状态。流于形式又不具人情味的简单交互让学习者无法真正融入学习情境,让大部分深层探究的尝试无疾而终[11]。虚拟空间去人性化的本质导致工具理性在线上教学过程中过度膨胀,无法承载学习者在深度学习过程中进行社会性交互的愿望[12]。

在对师生座谈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后, 研究发现,理工类课程因其抽象性强、逻辑清晰,有利于学习者通过翻转堂来解决自主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并形成学

习知识的体系;而人文社科类课程文科学科则更需要能过创设、优化优良的情境,促进师生之间情感的传递以及思想的交流,从而提升学习者的思辨能力、培养大学生的人文情怀。

对不同学科的或相同学科的不同课程内容的特点进行适宜的翻转。要建构沉浸感更强的在线学习环境,并能把学习要素、教师、学生、教学活动深度融合,教学内容和学习任务也能有机融入,创造逼真度更高的教学环境,让师生在自然交互的过程中开展线下的教学。对不同类型的课程内容在设计翻转课堂教学时要有不同的考虑,对理论类知识点较强的在课前自主学习时,应设计一些更多背景知识类的学习内容,理论中的重点和难点,需要教师在课上进行讲解,让学生更快内化;对实践类课程可以将方法内容放置在课前由学生自主学习,在课堂上可以重点引解学生学习技巧,这样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大学生创造性地探究学习活动,使翻转课堂教学与课程知识深度融合,创设良好的实时互动人文情境,创造思维深度碰撞的机会,促成高阶思维能力的养成。

3.促成课堂成为生成性教学的阵地,强化"教"与"学"的融合

翻转课堂课前学生自主学习阶段,教师地位弱化、学生学习孤立化,教师的引导、督促、解惑功能弱化。与传统的线下师生处于一样的教学场所,而对面的教学对比来看,翻转课堂学生课前自主学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师生异地,对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造成了难点,这对教学组织形态、师生交流互动以及临场体验等重要的教学要素提出了挑战。课前自主学习教师缺位,学生学习孤立化,学生"隐身听课",把"传、授"交给小视频,来源并不适合学生。师生关系疏远、教与学过程割裂。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明确提出,教育是"导致学习的,有组织的和持续的交流"[13],真正好的教学应该是生成性的,教学过程能构建出一种知智并举的学习形态和教学往环境,以形成一种"学生追求智慧,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是学科知识获得的过程"[14]课前自主学习是翻转课堂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课前自主学习其实就是教师把系统的知识分解成知识点,用十分钟至十五分钟的视频呈现出来,直接"丢给学生自己学习"。学生的深层心智学习因为教师的缺位,而无法形成。在线资源的课程不能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它只是一种客观的对知识的讲解;10–15 分钟对某个专业知识点的阐述,很难做到深入浅出的讲解效果。学生无法真实感知教师与同学的存在,做不到便捷自然地开展互动交流。这种虚拟、非自然的、非社会化的学习环境,都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师生都无法获得良好的教学体现和教学临场感。这些都与教学本义背道而驰。

根据学生学情、课程内容来决定是否使用翻转课堂,减少课程门数或一门课中的比例。教师精心设计教学过程,并能生动、风趣地讲解教学内容,才能保证学生能用较好的精力投入学习,才能保证有较好的学习体验。翻转课堂的课前自主学习,对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的学习效果影响有限。翻转课堂对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一个从自我管理学习能力的训练、学习心理的转变到自主学习行为形成的过程[15]。对于自主管理能力较弱的大学生,需要教师的全程引导,加强其元认识监控能力。教师有目的的针对自主管理能力弱的大学生,借助智能诊断系统及课前知识点线上测验后,有针对性地指导和讲解,这样可以减轻这部分学生的学习负担,降低学习焦虑,让他们更容易获得学习成功的效能感,从而维持学习动力,最终促成自主学习管理行为的养成。

4.构建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的课程评价体系

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是保证翻转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高效的翻转课堂组织形式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意识和高阶思维能力。德国学者埃里克·布莱尔(Erik Blair)等人和国内李赟、林祝亮都发现促进深层次学习的教学设计的缺失、个性化学习尚未落实、学习者学习主动性差及缺乏合理评价机制成为阻碍翻转课堂教学在高校良性发展的瓶颈[16]。

构建健全、多元、公平、合理的课程评价体系,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评价要避免以答案唯一的纸笔测试为主的评测方式,转化为注重过程的形成性评价,最终作出总结性评价。最终的总结性评价的内容通常需涉及批判性阅读能力、复杂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能力等,最后汇总形成性与总结性评价结果,完成对学生翻转课堂学习效果的全面考查。这正是翻转课堂背后

的教育理念所倡导的。趋于多元化、个性化的课程评价体系,能有效激发学生对课堂内容的深思,加深专业知识的意义建构,并构建个人学习空间,完成对知识的正向迁移,这些正是翻转课堂的灵魂所在。健全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包括教师对学生课程学习目标达成度的评价,协作参与度评价、学生自评及同伴的评价等多元内容。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关注课堂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过程,关注教育资源的共享,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宏观层面上由政府和高校促进教育理念深入、教学模式改革创新,微观层面上由教师根据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根据本校学生实际水平,设置一套有据可依的评价量表,指标包含在线学习时间、讨论、提问等量化标,也要包含学生在实体课堂的表现和课程作品质量等。同时,为教师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改革调整内容和教学方法提供依据,为教师课程教学提供教学反思的原汁原味的材料。

五、结语

综上所述,翻转课堂实现了学生主体地位,提升了教师职业素养,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对学生学习成效起到正面影响的作用,最终能为学生带来个性化的、创新性的学习体验。因此,针对本研究提出的两个问题,基于本研究有限样本,我们认为:对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模式不要再停留在"用或不用"上,而是进阶到"怎么用"的理念上。我们应避开翻转课堂的不利的影响因素,用教师的创新教学转换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有目的地运用信息技术,将信息技术与翻转课堂进行有效地融合;教师要结合学科特色和学生个体的差异,探索个性化的教学;高校学生利用翻转课堂这一创新教学改革,在强化自身素质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学习方法,获取成功的学习体验;构建健全的课程评价体系, 提升翻转课堂对地方高校课程有效性,加快促进地方高校的翻转课堂在我国教育的本土化进程。鉴于本研究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还可拓展课程范畴,对更多的课程进行研究,进一步验证翻转课堂在本土化过程中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参考文献:

[1] 汪滢.翻转课堂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述评(2013—2019)[J].红河学院学报,2021(2):124-127.

[2] 孟霆,姜海丽,刘艳磊.美国高校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经验及启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4):80-84.

[3] 马秀麟,赵国庆,邬彤.大学信息技术公共基础课翻转课堂教学的实证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3(1):79-85.

[4] 王素敏,张立新.大学英语学习者对翻转课堂接受度的调查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4(3):71-78.

[5] 黄美初,沈敏敏.翻转课堂与 MOOCs 在开发大学教学中的有效结合研究:太极四重嵌套式的翻转课堂与 MOOCs 相结合架构初探[J].远程教育杂志,2015(2):62-70.

[6] 张麒,刘俊杰,任友群.哈佛"慕课"深度谈:访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包弼德教授[J].开放教育研究,2014(5):4-10.

[7] ATTEBERRY A.'Flipped classrooms'may not have any impact on learning [EB/OL]. (2013-12-05)[2021-12-28]. 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13/10/22/flipped -classrooms-effectiveness/3148447/.

[8] OXFORD R,BURRY-STOCK J.Assessing the use of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orldwide with the ESL/EFLversion of the 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J]. System, 1995, 23(1):1-23.

[9] RENNIE F,MORRISON T M. E-learning and Social Networking Handbook:Resources for Higher Education [M].New York: Routledge,2013.

[10] 杨浩,郑旭东,朱莎.技术扩散视角下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融合的若干思考[J].中国电化教育,2015(4):1-6,19.

[11] 王孝金,穆肃.在线学习中深层次学习影响因素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20(1):45-51.

[12] 刘倩.主动选择:在线课程"高辍学率"的积极理解:基于学习者投资理论的视角[J].网络教育,2021(4):45-51.

[13] 杜静,杜志强.翻转课堂:教学范式的"转型"还是"教学本义"的回归[J].课程·教材·教法.2018.38(3):106-111.

[14] 陈杰.高效课堂读解的六个维度[J].江苏教育研究,2010(35):14-17.

[15] 刘正喜,吴千惠.翻转课堂视角下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J].现代教育技术,2015,25(11):67-72.

[16] 李赟,林祝亮.高等教育翻转课堂教学效果分析与思考[J].电化教究,2016,37(20):82-87.

(责任编辑:白 琳)

(下转第 92 页)

混合式对分课堂教学法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

赵海荣

（武夷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高校思政课因其在立德树人中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采用新式的教学方法提高其教学效果尤为必要。以对分课堂理念为基础，集合翻转课堂、问题链专题教学法、“大班授课，小班讨论”教学法等各种教学方法之长形成的混合式教学方法，注重课前预习和课后小组讨论过程，每位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全程沉浸式参与，能更好胜任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时代挑战，提升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听党话、跟党走，真正实现教学双长。

关键词：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法；思政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80-05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学校思政理论课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了办好思政课对培养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接班人的重要作用。[1]而高校思政课作为中国大学生的基础必修课，在大学生人文社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三观的塑造，人格的成长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等方面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课的内容在不断的翻新、修订和补充，与此相应的是各种新式的教学环境、教学方法、教学工具和手段的更新换代，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各种新式的教学模式中，复旦大学张学新教授于2014年创立的“对分课堂”[2]，由于兼顾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对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各类思政课教学模式实践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绝大部分使用过的思政教师的赞许和好评。学界关于“对分课堂”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万宗瓒的《对分课堂在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中的实践》[3]，苏锳锳的《基于对分课堂的泛在学习模式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4]，陈志超、陈瑞丰的《对分课堂：“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运用于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探索》[5]，陈瑞丰《对分课堂模式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改探索》[6]，本志红的《对分课堂：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探索》[7]。以上各位专家在思政教学实践中通过对“对分课堂”的使用和研究，提出的真知灼见给我们很多启发，但笔者认为仍有不足，如万宗瓒和陈瑞丰的文章对于大班授课人数过多影响讨论效果的问题没有点出并给予解决；苏锳锳的泛在学习模式没有论述学生在“对分课堂”模式下，小组讨论中老师的引导作用；本志红的论文是严格按张学新老师的对分课堂模式展开课堂教学实践和研究探索，缺乏创新。针对以上各专家的研究，结合笔者“对分课堂”实践和探索研究，认为当下的高校思政课教学，应该采用基于对分课堂理念下的混合教学模式，才能真正发挥高校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思想的主阵地作用，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收稿日期：2021-11-09

基金项目：福建省本科高校2019年度教育教学改革一般项目(FBJG20190129)；武夷学院2020年度教改项目(JG202004)。

作者简介：赵海荣(1979-)，男，汉族，讲师，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一、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应用历史中的表现

对分课堂，自2014年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张学新教授创立以来，经全国各类高校各学科教师使用后，获得广泛赞誉。这一教学模式解决了传统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填鸭式”灌输教育,把学生由受教育的客体变成主体，最大化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老师的角色由原来的逼着学生学到领着学生学,学生在学习中既学到了知识也锻炼了各方面的能力和综合素质,是学习和实践完美结合的一种教学模式,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为其走出校门后践行终身学习理念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对分课堂将课堂教学分成讲授、内化吸收和讨论三个环节。讲授环节由教师在课堂上只讲知识框架及重难点,留一半课堂时间给学生展示小组讨论后形成的成果并进行点评，改变了传统当堂讨论的模式;采用课外讨论既节省了宝贵的课堂时间,也让学生有一周左右时间内化吸收教师讲授的知识。围绕问题组成的各讨论小组,查阅资料、互相讨论,互相激发,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互相学习和团队协作沟通能力,做到既学习知识又锻炼能力。教师以每次讨论的记录和上交的讨论成果展示作为评价学生成绩的最重要手段,革除了传统教学中学生平时不学,期末考试突击背考试重点,一考定音,考完全忘记的弊病。把对学生的评价机制移到教学日常,减轻了学生期末考试的压力,把学习任务均匀分配到每周,提高了思政课的教学效果,是对传统思政课教学模式的颠覆性改变。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相对于传统的授课方式虽然有很大的进步和优势,但单一的对分教学模式并不能圆满完成思政课教学的全部任务。思政课具有思想性、理论性、政治性和应用性强等特点,将一半课堂时间对分给学生讨论和展示讨论成果,大大压缩了教师讲授教材内容的时间,在学生课前没有对所讲内容提前预习的情况下，老师课堂只讲授知识框架和重难点,对缺乏知识储备的理工科学生、艺术生等来说,根本跟不上讲授的节奏，无法完全掌握教师讲授的内容,这必将影响学生课后知识的内化吸收和小组讨论的开展。针对此情况,高校思政课教学中使用对分课堂,应配合使用翻转课堂的先学后教模式,强调学生的课前预习[8],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对教师讲授的知识框架和重难点有更好的理解和吸收。在讨论环节的设计上,针对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大班授课、合班授课的特点,讨论不宜安排在课堂上进行。一方面同一小组的学生并不方便都能坐在一起,另一方面由于人数众多,空间有限,教师不易掌控整个课堂讨论,声音嘈杂不但影响讨论效果和课堂秩序,教师也无法对小组讨论开展有效指导。讨论环节只能由小组成员在课余合理安排时间和地点单独进行。因此高校思政课使用对分课堂教学法应该适当修正,吸纳各种新式教学法之长,不断完善,形成以对分课堂理念为基础的新型混合式教学法。

混合式教学法是以对分课堂为基础,融合翻转课堂、问题链专题教学法、“大班授课,小班讨论”教学法、“网络+课堂”教学法、“导客为主”教学法、“全员互动”式智慧教学法[9]和“线上线下”教学法为一体的综合教学模式。教师利用翻转课堂“先学后教”,提前一周把要讲授的内容以专题和问题链的形式上传至网络学习平台,包括教学视频、PPT、教学辅助材料和参考书、专题和问题链内容等让学生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课前预习,在预习完成的基础上以小组为单位选取一个问题进行深入学习和讨论,讨论过程中小组每位同学必须发言并做好记录,讨论中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经过讨论,形成初步讨论意见,小组成员带着自学和讨论知识到课堂听取老师对本章内容基本知识框架和重难点讲解,就知识盲点和困惑向老师请教,在知识内化吸收后再进行第二次小组课后讨论,形成最终讨论成果,做成PPT或其他展示形式,连同讨论记录一起上交老师,老师从上交的展示成果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让小组上台展示并点评。二节连排的思政课,前一节对分给学生展示上一次课的小组讨论成果,起到对知识的回顾和总结作用,后一堂课讲授新一章的重难点和知识框架,如此循环往复。

二、以对分课堂为基础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展示

以笔者讲授的2020级食品安全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为例,采用对分课堂为基础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全方位展现和检验这一教学模式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一)课前准备

2020 级食品安全 1–2 班共 105 名学生。开学初，全班同学以自愿组队的方式组成 5 人一组的固定讨论小组，共有 21 组。小组成员在一学期要共同完成史纲十章内容共十次的问题讨论和成果展示，讨论记录和成果展示人每次由不同学生担任，保证每位同学都有二次锻炼和展示的机会。以史纲第二章“不同社会力量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为例：本章包括三节，涉及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三方面的内容，按教学进度安排，只有两个课时，如果按传统的教学方法，至少得六个课时，采用对分课堂为基础的混合式教学法后，根据本章基本知识框架和重、难点设计了以下四个问题 “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和教训有哪些？如何评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为什么没有成功?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和教训有哪些？”。在讲完第一章内容后，老师布置第二章的问题链，让每组学生按报名顺序选取问题，每个问题平均五组同学选择，问题选取后，老师依托学习通教学平台，将相关资料上传到学习通上，包括史料(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洋务运动文献汇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等)、教材和专著(如罗尔纲《太平天国史》、陈舜臣《太平天国兴亡录》、史景迁《太平天国》、张鸣《天国梦魇》、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邢超《致命的倔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丁俊贤《洋务运动史话》、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汤志钧《戊戌变法史》、杨天石《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等)、论文(包括马勇、雷颐、茅海建、桑兵、罗志田等的研究论文)、影像资料 (包括各类历史纪录片和中国大学 MOOC 武汉大学主讲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和北师大李松林教授主讲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国家精品课)，以及教学 PPT 等，方便学生使用移动终端随时进行线上学习。

(二)课程展开

学生在接收课前预习任务后，围绕以上四个问题，先行学习第二章全部内容，然后再重点学习和回答本小组选取的问题，由第二章讨论成果展示人主持召集第一次讨论。小组成员根据自学心得回答本组选取的问题，就学习中产生的疑问向本组同学请教，小组成员间互相回答和启迪，由讨论成果展示人记录讨论结果。各同学带着讨论中仍未解决的疑惑进入课堂，待老师讲授完本章内容后向老师请教。在两节连排的课程安排下，第一节课由老师选取第一章问题讨论成果展示的小组先进行展示，展示完后由教师一起点评，并就第一章的内容“进入近代后中华民族的磨难与抗争”做总结回顾。第二节课讲授第二章内容，主要讲授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三大运动的基本知识框架和重、难点，不涉及具体的史实细节。由于学生课前已经预习过全部内容，对老师的讲授更易接受和理解，答疑互动更有针对性。课后学生对照老师讲授的内容和自己的预习对知识进行内化吸收，小组成果展示人主持第二次讨论，记录第二次讨论结果并完善和修订小组讨论成果，做好成果展示，连同讨论记录一起上交老师， 第二章内容共收集到 21 篇小组讨论记录， 每篇记录有二次讨论的详细记载，包括讨论时间、地点及内容，字数均超过 1500 字以上。收集到 21 组讨论成果展示作品， 包括 PPT 课件 10 篇、读书报告 5 篇、演讲稿 4 篇、话剧剧本 2 篇。笔者根据讨论记录和成果质量决定每类选一组作为下次课堂展示的代表， 并将选中的小组名单反馈给同学，让其做好成果展示的准备。展示时间规定在 10 分钟内，各小组展示完后，笔者就每组展示进行点评，并对第二章的内容进行全面回顾总结，彻底扫除知识盲点。

(三)课程总结

通过一个学期的使用后发现：学生在后期的讨论记录明显在深度和广度上优于前期，展示的小组成果质量有较大的提高，对纲要课的核心问题“二大任务”和“四大选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部分以前比较腼腆的学生变得更大胆，更敢于在课堂上问问题和公开表达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班级的凝聚力和学风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达到了思政教学的预期效果。

三、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法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启示

基于对分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法是一种综合教学方法，它集各种教学方法之长，并能紧跟时代，做到全方位育人和全过程育人的高效率思政课教学方法。这一综合教学方法的特点是集合了翻展课堂的课前预习，先学后教，保证和提高了教师课堂授课效率；吸纳了“导客为主”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精华，让学生从教学的客体变成学习的主体， 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增进了教学效果；利用学习通等网络教学平台，完美

诠释了“网络+课堂”的教学模式;课前和课后的二次小组讨论,是对“大班授课、小班讨论”教学模式的最好发挥,而小组各位同学都必须全程参与预习、讨论、成果展示、讨论记录等各个环节,杜绝学习中搭便车现象,就是“全员互动”式智慧教学模式的实践;课前预习线上教学资料和课堂上听老师讲解基本知识框架和重难点内容,也是当下流行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的呈现。

作为一种综合教学法,它在实施过程中对学生、老师、教研室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内在要求。它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做学习的主体,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提升实践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它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和敏锐的政治嗅觉,并能准确把握教学重难点和关键问题,用最短时间给学生厘清要讲述的内容;它要求教研室各位老师集思广益,互相砥砺,相互提升和修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不断共同完善这一综合教学法。

(一)对教师综合能力和水平要求更高

该教学法将原来由老师课上讲授内容的一部分移到课外由学生自学完成,虽然大大减轻了教师课堂授课任务和压力,却对思政教师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要求。教师必须对教材内容重新规划和设计,把原来由两节课讲完的内容压缩到一节课,并保证学生能基本掌握课程内容的知识结构框架及教学重难点。这意味着老师要花更多的备课时间精心钻研教材,确定基本知识框架和重难点,围绕重难点设计教学专题和问题链,作为学生课外预习、自学和讨论的中心和指导。确保学生的自学既可成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又能围绕关键问题,掌握教学的重难点。教师课前上传的各种预习资料,直接决定学生的预习效果和小组讨论的成果质量,这要求教师对教学内容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熟悉学术前沿、本领域原始材料、权威专家的专著、论文、影像资料和教学视频等。思政课政治性和时效性强,还要求教师有灵敏的政治触角,能紧跟国家大政方针和政治前沿,在预习材料的选取和问题的设计上必须做到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对一些过时了的观点以及与现实政治有抵触的说法要及时清除和正确引导,防止学生在自学和讨论中走偏方向。学生每次课前上交的小组讨论成果和讨论记录,教师要认真仔细地逐份批阅,并给出成绩和反馈,选定成果展示的小组名单。由于小组讨论成果展示方式多样,学生的思维方式发散,还要求教师具备更高的综合专业素养和鉴别能力。所有的这些都对思政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对学生平时的学习要求更高

和传统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法相比,思政课教学中采用对分课堂式的混合教学方法对学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思政课教学中,学生上课只要认真听讲并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即可,大班授课与教师互动的机会不多,平时主动学习动力不足,甚至部分学生平时根本不学,期末考试根据教师划的重点突击复习几天,考试及格即可。采用对分课堂式混合教学方法后,把对学生的成绩考评分布到每次课。学生按固定小组每周都要完成预习和讨论,且讨论小组人数严格控制在五人之内,防止人数过多讨论流于形式和搭便车的现象;而且要求召集、主持讨论和讨论成果展示人必须轮流担任,保证了每位同学都能得到实践锻炼机会,杜绝小组内一人包干的现象。每次小组讨论由专人记录,防止讨论变成应付。这迫使每位学生必须去自学和互相学习,杜绝平时不学,考前抱佛脚。由于每位同学都有主持讨论和展示讨论成果的任务,这提供了锻炼全体学生组织领导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的机会,培养了他们的团结协作精神。教师通过讨论记录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在课堂上进行思想引导,加强了思想教育的即时性和有效性。

(三)对集体备课,共同研讨要求更高

思政课教学中采用对分课堂式的混合教学方法,将一大部分教学任务由课堂转移到课外由学生自主和合作完成,学生预习式的自学和相互讨论不是自由开放、天马行空的,而是在教师提供的学习材料和指定的专题模块和问题链的范围内的自学,针对性强、目的性明确。为保证学习材料的选取、知识框架和重难点的设计、专题模块和问题链的确定更加科学完善,教研室必须课前定期进行集体备课,就以上内容进行集体研讨、反复打磨、力求精益求精,以求更加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知识水平与能力。课后互相反馈教学效果;互相观摩对分课堂式混合教学方法的使用进展情况;取长补短,就遇到的突发情况和问题进行研讨;共同寻找改进的方法和对策;集思广益,不断提高各自运用这一教学法的能力和水平。

四、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法遇到的问题和思考

因传统的对分课堂教学法和其他各种新式的教学法均有各自的优缺点,为应对不断变化的高校思政课教学任务,笔者通过试验以对分课堂为主、集各教学方法之长的综合式教学法后,发现其能较好的应对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一系列困境和问题,让学生在无形中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效果俱佳,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升明显。但在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实践中依然遇到一些问题:如学生在小组讨论时准备不够充分、讨论不深刻、浮于表面;学生的成果展示形式大于内容;学生抱怨课前预习和小组讨论占用时间太多,影响了专业课的学习,加重了学习负担;除少数对历史知识感兴趣的小组外,部分小组存在应付现象,部分学生在其不是讨论召集、记录人及成果展示代表时对小组讨论兴趣不足和准备不充分,没有深入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动力。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小组讨论成果的质量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针对以上问题,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将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小组讨论的监督指导,对学生上交的讨论记录详细批改后逐个反馈,一旦发现小组讨论不深刻或应付过关的现象将责令退回重新讨论;学生成果展示要求重内容轻形式, 尽可能清楚明确的阐释问题;对学生反映的任务过重,占用时间太多影响专业学习的问题将适当减少各小组负责的问题数量, 做到少而精,重质量,重效果。真正让学生通过讨论和解决问题学会互相学习、共同协作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和终身学习提供思路和奠定基础。对小组成员在自己不是成果展示人时应付讨论现象将采用小组成果综合评分和个人分别打分两种方式来考评学生,杜绝个别学生应付的现象。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改进,相信这一教学方法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将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001).

[2] 张学新.对分课堂: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新探索[J].复旦教育论坛,2014(5):5-10.

[3] 万宗瓒.对分课堂在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中的实践[J].继续教育研究,2021(7):89-92.

[4] 苏锳锳.基于对分课堂的泛在学习模式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J].思政教育研究,2016(1):90-93.

[5] 陈志超,陈瑞丰.对分课堂:“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运用于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探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11):115-118.

[6] 陈瑞丰.对分课堂模式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改探索[J].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16(3):84-88.

[7] 本志红.对分课堂: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探索[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08-112.

[8] 房玫.思想政治教育学导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9] 牛田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法创新模式比较分析及启示[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1):91-95.

(责任编辑:魏 琛)

The Applic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Bipartition Class
——Taking the course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s an example

ZHAO Hairong
(School of Marxism,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Because of its ideological, theoretical, political and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have long been unable to take up this teaching task, and after the creation of the Bipartition Class teaching method,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a single teaching method cannot stand the test of time of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future, the hybrid teaching method,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divided classroom and collects the length of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will become a tre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bipartition class; hybrid metho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大学生金融素养现状调查及路径探究

张 佳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当今时代是金融开放的时代，大学生金融素养对于国家的金融稳定和活力非常重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简要报告》中关于金融素养的定义，从四个维度构建金融素养模块：金融意识、金融态度、金融知识和技能，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验证分析大学生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职业教育、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学历、地域因素等对大学生金融素养有重要影响。针对我国大学生金融素养教育存在知识体系不完整、缺乏教育途径等问题，提出加快金融素养顶层设计，建立多元化的金融素养教育主体，提高农村金融知识可得性等建议，同时探析大学生金融素养教育的路径，提高大学生金钱管理能力、认识金融工具和提高风险意识等能力。

关键词：大学生；金融素养；多元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85-08

学术界对于金融素养的定义非常丰富，其中较为认可的定义是："金融素养是金融意识、金融态度、金融知识和技能的综合，指人们具备一定的金融素养以做出恰当的金融判断和分析，并最终实现个人金融福利最大化。"较高的金融素养水平不仅能够提高金融投资的能力，还能够帮助民众辨别金融诈骗，从而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根据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指数均值为64.77，标准差为17.01，东中西部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经济越发达的区域金融素养指数均值越高，东部明显高于中部，中部又高于西部。（数据来源：http://www.pbc.gov.cn/jingrxfgy/145720/145735/4117932/index.htm）根据《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统计，中国家庭2018年的人均财产（含房产）为20.88万元，比2017年增长7.49%，其中，令人担忧的是房产占比超七成。而除开房产的家庭金融资产比例严重失衡，现金和银行存款比重超过九成。（数据来源：http://chfs.swufe.edu.cn/sjzx/sjsq.htm）老百姓的家庭资产配置选择余地少，资产分布过于单调，使得居民消费相对疲软，无法增加社会活力。要让家庭资产流动起来，促进消费发展，就需要提高居民金融素养，调整家庭资产结构，鼓励家庭优化资产配置。大学生恰是国家的未来，是未来中国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与生力军，研究大学生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可以为我们制定提升金融素养水平政策提供实证依据。了解大学生金融素养，寻找提高大学生金融素养的路径对于国家未来的金融安全与发展有战略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中外学者从多个维度对金融素养进行研究。综合文献所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关于金融素养的认知

Davoli和Rodriguze-Planas认为来自具有"平均"以上水平金融素养的国家的个人比来自低于平均水平的金融素养的国家和个人，更有可能正确回答有关

收稿日期：2020-11-20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JAS171061）。

作者简介：张佳（1980-），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金融、投资理财研究。

通货膨胀,风险多元化的基本金融素养问题[1]。徐佳等认为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及多数东亚国家,中国家庭的金融知识水平很低,其中,老龄群体、女性、少数民族以及低教育程度的个体金融知识最低,与高速增长的实体经济和快速健全的金融市场极不匹配[2]。刘阳等认为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家庭因诈骗产生损失的可能性[3]。孟德锋等认为金融素养对制定家庭理财规划有积极促进作用,在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中都有明显表现,而且女性金融素养提高对其制定理财规划的作用比男性更大[4]。苏芳等认为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较低,且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十分显著,家庭收入水平对于金融资产配置起到重要作用[5]。郑娇娇等人认为金融素养的提高对于居民家庭资产投资行为的有效性合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6]。李庆海等人认为金融素养自我认知对家庭资产配置起重要作用[7]。何昇轩等人认为提高个人的金融素养十分重要,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是居民具有的有效管理金融资源的能力[8]。贾立等认为金融素养能够显著降低家庭主观债务负担和客观债务负担,从而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有益参考[9]。

(二)关于金融素养影响因素探索

Mahadvi 和 Horton 认为年龄较大、家庭收入较高的受访者和获得 MBA 学位的受访者具有较高的金融知识水平[10]。Amagir 等人认为在高中成绩最低的学生,数学能力低的学生,移民学生,SES 较低的学生,母亲没有大学学位的学生以及不与家人讨论财务问题的学生中,金融知识水平较低于同龄人[11]。Popovich 等认为与四年制大学的学生相比,社区大学的学生其学生贷款的违约率更高。增加社区大学生的财务知识,会影响其财务态度以及预算和储蓄的意向和行为[12]。Kadoya 和 Khan 认为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的人口因素;收入和职业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对未来看法的心理因素会严重影响金融知识水平[13]。卢玮楠认为大学生金融兴趣水平、父母学历、专业、对金融素养起正向影响[14]。何昇轩认为个人金融素养、家人的学历、风险承受能力和数字敏感度对个人收入有明显影响[15]。彭积春认为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利于合法合规金融借贷行为的发生[16]。孟宏玮等人认为家庭金融素养可以显著提高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家庭服务型消费支出[17]。张智富等认为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同群体特征对金融行为影响显著[18]。郎慧等认为对家庭创业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有金融素养和资本金的大小[19]。何学松等人认为农村的金融素养相比城市来说是比较低的,农民的金融素养影响信贷的还款率[20]。

(三)关于提高金融素养的方法建议

Batty 等人认为课堂体验式经济让学生在财务知识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进步[21]。Ho 和 Lee 认为标准化的金融知识课程会对大学生产生影响[22]。Koomson 等人认为金融知识培训的受益者拥有理财账户的可能性比没有受过金融教育的要高约 7.2%，而储蓄的可能性要高 8.2%;此外,金融知识培训的受益者更有可能加强他们的金融包容性[23]。Li 等认为金融知识可能会通过提高理解和比较金融资产的能力而产生影响。金融知识可以提高年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的投资收益,同时减少老龄,受过较少教育的家庭的收益[24]。陈福中等认为要加快建立个人金融素养评估体系,开展金融普及教育,提升女性以及低收入群体的金融素养[25]。辛自强等认为我国公民总体财经素养目前仅处在中等水平,应该采用个人、家庭、群体、制度四条路径多方位提高财经素养[26]。许先普等认为为有效提升居民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度,政府应大力推行金融知识的可获取性,从而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27]。张冀等人认为我国家庭金融脆弱性普遍存在且脆弱性程度较高,71.43%的家庭具有较为明显的金融脆弱性;金融素养可以增加家庭的金融风险抵抗度；金融知识水平对低教育水平的家庭金融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最显著[28]。陈雨丽等认为金融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可以显著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且对金融资产配置种类数和风险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比重均有显著正向影响[29]。

二、逻辑框架与实证方法

(一)逻辑框架

如前文所述,个体特征因素是分析金融素养影响因素的一个有效视角,并且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同。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地域、是否受过金融类教育、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父母教育经历等。结合

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从性别、年龄、专业、地域、家庭经济因素、父母受教育程度六个方面构建了金融素养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二) 实证方法

由于考察的被解释变量是大学生的“金融素养”,我们构建虚拟数值变量,使之符合线性回归分析的基本条件要求,本研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的数学模型为:

$$Y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cdots + \beta_n X_n + \varepsilon \quad (1)$$

公式(1)为一个 n 元线性回归模型,式中 y 为被解释变量;X 为解释变量,共有 n 个解释变量;β_0为回归模型的常数项;β_1 、β_2 、…、β_n 为偏回归系数,ε 为随机误差。被解释变量 Y 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 n 个解释变量 X 的变化引起的 Y 的变化, 另一部分是随机因素引起的 ε 的变化。

(三)描述统计

1.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主题与内容, 本研究自 2019 年 9–12 月,以随机抽样为主、典型抽样为辅的方式,对福建省福州市某高校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以下问题:一是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特征信息,如性别、年级、所在专业、每月生活费等;二是金融素养中金融态度的认知程度,包括对日常生活费和压岁钱的处理方式, 是否愿意对日常生活费和压岁钱进行理财,是否愿意延迟消费来扩大理财本金等;三是大学生金融素养教育的实践情况,如是否有理财账户,是否有基金定投,是否了解金融基础知识等。调查共回收问卷 533 份,数据整理过程中,剔除了变量缺失值、异常值,前后答题不合逻辑值, 对收回的问卷进行审核与确认,剔除 62 份瑕疵问卷,获取有效问卷 471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8.37%。

2.描述统计

(1)样本特征

本次调查, 男性被调查者为 252 人, 占比 53.50%,女性被调查者为 219 人,占比 46.50%。年级分布中,大一、大二共有 269 人,占比为 57.11%;大三、大四共有 202 人,占比为 42.89%;金融类专业学生有 243 人, 占比为 51.59%, 非金融类专业学生有 228 人,占比为 48.41%。被调查样本中,城市学生共有 198 人,占比为 42.04%,农村学生共有 273 人,占比 57.96%。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有 171 人,占比为 36.31%; 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下的共有 300 人,占比为 63.69%;从家庭经济状况来看,被调查对象平均每月生活费在 1 000~2 000 元之间的人数最多,共有 174 人,占比为 37.58%;3000 元以上的人数最少,仅有 23 人,占比为 4.83%,生活费其他区间分布较为均衡。由此可见,样本的各个特征指标值具有差异性,分布比较广泛,无明显集中趋势,可用于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2)描述统计及分析

通过初步调查我们发现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大学生金融知识欠缺、金融关注度不高,投资意愿低。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2017 年调查问卷中关于金融知识的问题, 用其对大学生进行测试。调查结果显示,“假设银行的年利率是 5%,通货膨胀率每年是 3%,把 100 元钱存银行一年之后能够买到的东西将更多还是更少?”的问题,有 285 名被调查者(占 60.59%)选择错误或算不出来,如图 1。可见被调查大学生对基础的金融知识掌握程度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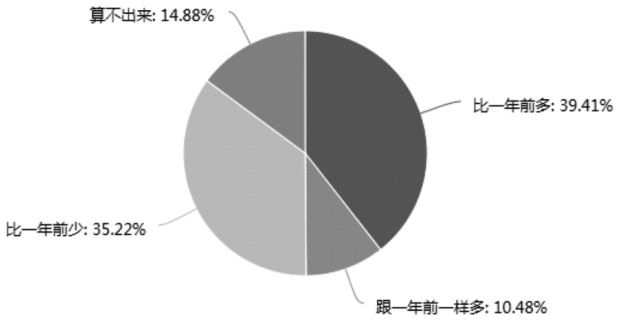


图 1 金融知识计算题答案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answers to financial knowledge calculation questions

针对“当您有足够的闲余资金时,您会去尝试购买金融投资产品去帮助您的资产去有所增值吗?”的问题,被调查者里经管类学生意愿较高,而非经管类学生理财意愿较低,如图 2。说明通过金融类的培训,可以提高大学生的金融投资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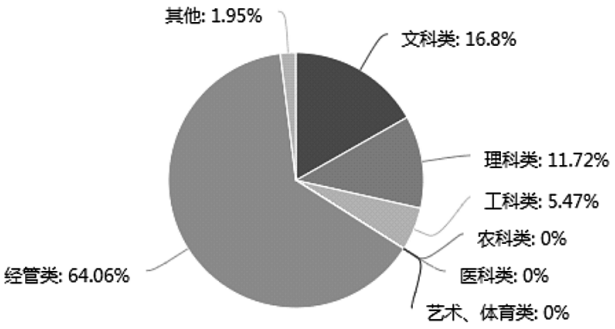


图 2 大学生理财意愿各专业占比

Fig.2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majors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in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对于“金融知识学习的意识或计划”的问题,有 117 人回答“没有”,占比 65%;有 62 人回答“有”,占 35%。针对回答“有金融知识学习意识或计划”的问题,进一步访谈如何实施金融素养教育计划,对金融知识的知晓认知程度不高,甚至存在误区和偏见。比如认为钱很少根本没有必要理财,学习金融知识会被室友嘲笑,容易没有朋友,不如打游戏更合群,钱很少没必要理财等。

第二,学校缺乏大学生金融素养相关课程。

调查“您关注财经类新闻的渠道是?”问题时,结果显示学校课堂只占比 5.56%,如图 3 所示。说明多数高校对于财经类的学习太少。学生更多通过媒体网站等渠道了解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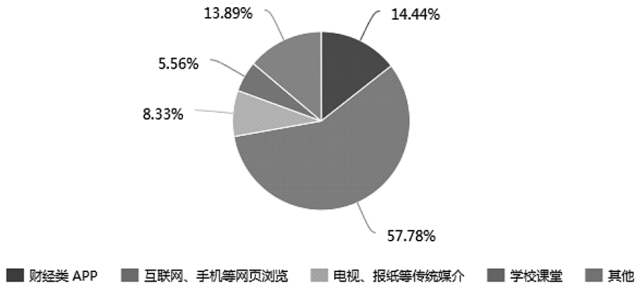


图 3 财经信息了解渠道

Fig.3 Financial information channels

调查发现福州大学生金融素养偏低,对于金融信息关注度和敏感度都不高,非经管专业学生金融知识不足。针对以上现象,笔者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哪些因素是影响大学生金融素养的关键因素。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23.0 专业软件对被解释变量“大学生金融素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中被解释变量“大学生金融素养”依据 CHFS2017 中的金融知识测试题。采用迭代主因子法构建客观金融素养指标。样本总体 KMO 值为 0.65,且通过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P 值=0.000),经研究论证,该样本数据适合因子分析。解释变量通过设置虚拟变量来进行分析,本文中虚拟数值设置如下:性别(男性 1,女性 2),年级(大一、二为 0,大三、四为 1),专业(经管类 1,非经管类 0),依据福州 2019 年个人平均年收入 86100 元为标准[30],设置家庭年经济收入(30 万以上为 8,20–30 万为 6,10–20 万为 4,5–10 万为 2,5 万以下为 0),父母学历(大专以上 1,大专以下 0),城市 or 农村(城市 1,农村 0)。

(一)模型检验

经过六步的渐进式运算形成最终模型,各项检验指标如下:DW 值为 1.931,接近 2,说明残差序列无明显自相关性,回归方程可以说明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规律,选取的回归模型较为合适;在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方面,最终模型 6 的 F 检验统计量为 123.52,收尾概率 P 值为 0.00,小于显著性检验值 α(0.05),说明该模型拟合效果较优,适合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二)回归结果与讨论

按照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将“大学生金融素养”作为被解释变量,而个体特征、学生专业、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学历程度、城市 or 农村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运用逐步筛选策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显示了解释变量逐步的筛选过程以及各个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检验结果。过程经历六步优化处理,最终产生模型六的结果,该模型中包含了“性别”“年龄”“专业”“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学历”“城市 or 农村”六个解释变量。可知,六个解释变量对应的收尾概率均小于显著性检验值 α(0.05),即线性关系显著,可保留在方程中,由此可得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如公式(3)所示:

表 1 回归模型结果

Tab.1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误差	Beta			容差	VIF
(常量)	7.105	0.108		65.914	0.000		
城市 or 农村 X6	4.021	0.214	0.655	18.750	0.000	1.000	1.000
(常量)	4.426	0.272		16.280	0.000		
城市 or 农村 X6	3.007	0.216	0.489	13.945	0.000	0.801	1.248
家庭经济状况 X4	0.695	0.066	0.370	10.548	0.000	0.801	1.248
(常量)	4.450	0.261		17.038	0.000		
城市 or 农村 X6	2.084	0.253	0.339	8.237	0.000	0.536	1.864
家庭经济状况 X4	0.658	0.064	0.350	10.343	0.000	0.794	1.259
父母学历 X5	1.574	0.248	0.249	6.340	0.000	0.588	1.700
(常量)	4.414	0.255		17.322	0.000		
城市 or 农村 X6	1.899	0.250	0.309	7.606	0.000	0.525	1.906
家庭经济状况 X4	0.586	0.064	0.312	9.190	0.000	0.753	1.328
父母学历 X5	1.392	0.245	0.221	5.689	0.000	0.575	1.738
您是哪个专业的学生? X3	0.889	0.178	0.166	4.988	0.000	0.778	1.285
(常量)	3.560	0.328		10.852	0.000		
城市 or 农村 X6	1.797	0.247	0.292	7.277	0.000	0.519	1.927
家庭经济状况 X4	0.563	0.063	0.300	8.944	0.000	0.747	1.339
父母学历 X5	1.346	0.241	0.213	5.583	0.000	0.574	1.742
您是哪个专业的学生? X3	0.984	0.177	0.184	5.562	0.000	0.764	1.308
您的性别是? X1	0.642	0.159	0.120	4.039	0.000	0.952	1.051
(常量)	3.445	0.330		10.446	0.000		
城市 or 农村 X6	1.719	0.248	0.280	6.938	0.000	0.510	1.959
家庭经济状况 X4	0.561	0.063	0.299	8.962	0.000	0.747	1.339
父母学历 X5	1.340	0.240	0.212	5.588	0.000	0.574	1.742
您是哪个专业的学生? X3	0.980	0.176	0.183	5.567	0.000	0.764	1.308
您的性别是? X1	0.637	0.158	0.119	4.034	0.000	0.952	1.051
您的年级? X2	0.393	0.161	0.072	2.438	0.015	0.960	1.041

a. 因变量:金融素养(Y)

$$Y = 0.637X1 + 0.393\ X2 + 0.980X3 + 0.561X4 + 1.340X5 + 1.719X6 + 3.445 \quad (3)$$

式中 Y 为“大学生金融素养”变量;X1 为“性别”变量;X2 为“年级”变量;X3 为“专业”变量; X4 为“家庭经济状况”变量;X5 为“父母学历”;X6 为“城市 or 农村”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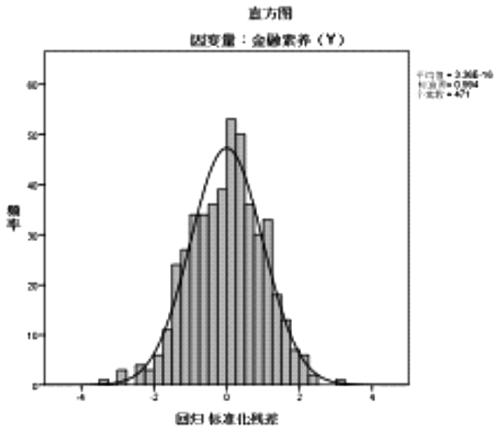


图 4 金融素养影响因素直方图

Fig.4 Histogra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inancial literacy

根据表 1 回归模型结果及公式(3)可知,“城市 or 农村”“父母学历”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时对“大学生金融素养” 产生了显著影响, 影响系数分别为 1.719 和 1.340,表明城市大学生的金融素养要优于农村大学生的金融素养,这一点与路晓蒙等人的研究一致[31]。这说明我们的金融知识覆盖是不均衡的,农村孩子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金融投资意愿要显著低于城市孩子,金融知识易得性差。父母为大专以上学历者的金融素养水平更高,这与何学松等人的研究一致[32]。这表明了家庭教育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要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的作用在金融教育中非常重要。在我们调查中还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学生其金融素养也更好,表明了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其父母的金融素养很可能是比较高的,这与辛自强等人研究一致[33]。这也从侧面反应了金融素养对于家庭经济收入的正向影响。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时“性别”“年级”因素对“大学生金融素养”产生显著影响,女大学生的金

融素养要好过男大学生。这一点与何晟轩等人的研究相一致[34],但与廖理等人的研究相违背[35]。究其原因可能是我们调查的主体是大学生层面,学历和计算能力相似,不存在能力和眼界之类的差异,而单纯由中国传统家庭性别分工引起。研究还发现年级高的大学生金融素养优于年级低的大学生,这也说明随着年级的增加,社会阅历的提高,大学生的金融素养会越来越高。

四、大学生金融素养教育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福州市某高校的大学生进行金融素养抽样调查,分析了解目前大学生金融素养普遍偏低,接着构建大学生金融素养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分析影响大学生金融素养的因素并得到以下结论:

1.大学生自身金融知识认知度低,金融信息关注度不够。

大学生没有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观,投资、消费、支出没有规划。不知道如何理性消费,压岁钱与生活费也基本不做计划安排, 没有主动储蓄或投资的欲望,对金融投资基本知识和投资风险不了解。

2.学校缺乏大学生金融素养教育的课程,金融素养教育缺乏专业指导。

目前,我国的大学生教育基本围绕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展开的,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没有系统的金融素养教育课程, 大学阶段也没有跟上金融素养公共课程。金融素养缺乏专业化师资队伍,教育意识薄弱,教育路径和渠道也比较短缺。

3.家庭对孩子金融素养影响很大。

研究显示,父母缺乏系统的金融素养是目前金融素养教育的一个影响因素。家庭是孩子成长的原生因素,很多家长自身金融素养的缺乏是导致大学生金融素养偏低的原因。调查发现父母学历高,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金融素养相对偏高。

4.农村大学生金融素养相对较低。

农村大学生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及金融素养相对较低。属于大学生金融素养的弱势群体,调查显示在回答金融素养态度型问题中,“您是否愿意将您的压岁钱和生活费进行投资?”农村孩子的意愿要远低于城市大学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的金融素养教育的地域不均衡性,是我们在本次调查中的一个重要发现。

(二)建议

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快金融开放的关键时期,提升大学生金融素养水平不但利于个人金融福祉,而且利于国家系统金融风险的防范, 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建议如下:

1.加快顶层设计,重视金融教育的普及性和公平性。

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快金融素养教育顶层设计,促进金融素养教育内容融入学校课堂。重视金融教育的普及型及公平性。可设置多样化网络课程供大众开放学习。引导大学生学会自主储蓄,懂得财富来之不易,合理引导消费,培养理财意识。

2.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教育主体。

首先,父母的财富观念和行为对大学生金融素养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要夯实家庭作为大学生金融素养教育的基础。其次,学校在金融素养教育方式上要因地制宜、精心设计,将大学生成长的生活体验与金融素养教育紧密结合,培育大学生理性金钱观和消费观,发挥学校金融素养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最后, 激励社会组织和金融机构参与校园金融素养教育,常态化开展理财宣传周活动,承担起理财意识教育的社会责任。

3.强化媒体监管,树立风险管理意识。

宣传理性消费、勤劳致富的美德,杜绝梦想一夜暴富,恶意透支超前消费的不良行为,树立风险管理意识,自觉抵制错误的财富观。

4.加强农村地区金融素养教育提高

了解和重视城乡差异,增强金融基础知识的普及度和易得性。鼓励金融下乡,强调金融机构在落后地区的宣传力度,增强服务,提高金融知识的易得性,普及金融基础教育,提高农村金融福祉。

参考文献:

[1] DAVOLI M.RODRIGUEZ -PLANAS N.Culture and Adult Financial Literacy: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20(78):102013.

[2] 徐佳,龚六堂.金融知识会影响家庭退休安排吗: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的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2):126-137.

[3] 刘阳,张雨涵.居民金融素养与家庭诈骗损失[J].消费经济,2020,36(2):60-71.

[4] 孟德锋,季颖,李丹.金融素养对家庭理财决策影响的性别差异[J].金融教育研究,2020,33(2):12-24,57.

[5] 苏芳,殷娅娟.金融素养对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实证研究[J].金融与经济,2020(1):26-33.

[6] 郑娇娇,宗卫云,李岩坤,等.金融素养对家庭投资决策的影响探究:基于 CHFS2017 数据的实证分析[J].产业科技创新,2020,2(1):50-53.

[7] 李庆海,侯曼曼.自我效能感与我国城镇居民理财规划:基于中国城镇家庭微观数据[J].江汉学术,2019,38(1):15-24.

[8] 何昇轩,李炜.金融素养对家庭和个人收入的影响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0(3):98-107.

[9] 贾立,袁涛,邓国营.金融素养能降低家庭债务负担吗: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0,35(3):98-112.

[10] MAHDAVI M,HORTON N.Financial Knowledge Among Educated Women:Room for Improvement[J].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2014(48):403-417.

[11] AMAGIR A,GROOT W,VAN DEN BRINK H M. et al. Financial Literac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Netherlands:Knowledge,Attitudes,Self-efficacy,and Behavior [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Education,2020(34):100-185.

[12] POPOVICH J J,LOIBL C,ZIRKLE C,et al.Community College Students' Response to a Financial Literacy Intervention:An Exploratory Study[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Education,2020(34):100182.

[13] KADOYA Y,KHAN M S R.What Determines Financial Literacy in Japan? [J].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 Finance,2020,19(3): 353-371.

[14] 卢玮楠.陕西省大学生金融素养影响因素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8.

[15] 何昇轩.家庭成员对个人金融素养影响的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0(5):63-71.

[16] 彭积春.金融素养与家庭借贷行为研究:来自中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查的证据[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1):125-129.

[17] 孟宏玮,闫新华.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调研世界,2020(3):16-21.

[18] 江西省金融学会课题组,张智富.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西省县域调查数据[J].金融与经济,2020(3):52-59.

[19] 郎慧,肖诗顺.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J].中国西部,2019(6):67-79.

[20] 何学松,孔荣.金融素养、金融行为与农民收入:基于陕西省的农户调查[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2):1-11.

[21] BATTY M M,COLLINS J M,O'ROURKE C M.et al. Experiential Financial Education:A Field Study of My Classroom Economy in Elementary Schools [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20(78):102014.

[22] HO M C,LEE D H.School Banding Effects on Student Financial Literacy Acquisition in a Standardised Financial Literacy Curriculum [J].The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2020(2):377-391.

[23] KOOMSON I,VILLANO R A,HADLEY D.Intensifying Financial Inclusion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Literacy Training:a Gendered Perspective [J].Applied Economics,2019(52):375-387.

[24] LI J,LIQ,WEI X.Financial Literacy,Household Portfolio Choice and Investment Return[J].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2020,62(2):101370.

[25] 陈福中,蒋国海.美国个人金融素养现状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清华金融评论,2019(10):109-112.

[26] 辛自强,穆昊阳.财经素养弱势人群的识别与服务:知址必达[J].社会建设,2020,7(4):37-44.

[27] 许先普,陈天鑫.金融素养会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吗?[J].城市学刊,2020,41(1):46-55.

[28] 张冀,于梦迪,曹杨.金融素养与中国家庭金融脆弱性[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60(4):140-150,238.

[29] 陈雨丽,罗荷花.金融教育、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J].金融发展研究,2020(6):57-64.

[30] 福州市统计局关于发布 2019 年福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的通告[EB/OL]. (2020-05-26)[2020-07-15].http://tjj.fuzhou.gov.cn/zz/wjtz/202005/t20200526_3288219.htm

[31] 路晓蒙,赵爽,罗荣华.区域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理性投资吗:基于家庭资产组合多样化的视角[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40(10):60–87.
[32] 辛自强,穆昊阳.财经素养弱势人群的识别与服务:知址必达[J].社会建设,2020,7(4):37–44.
[33] 廖理,初众,张伟强.中国居民金融素养差异性的测度实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36(1):96–112.

(责任编辑:魏 琛)

A Study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and Its Paths

ZHANG Jia
(Business School, Fuzhou Polytechnic,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Today is an era of financial openness, in which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ountry´s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vitality.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financial literacy in the survey report on consumer financial literacy issued by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financial literacy module from four dimensions: financial awareness, financial attitude,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verify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The empirical study finds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par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regional factor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incomplete knowledge system and lack of education channels in financial literacy education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speed up the top level design of financial literacy and establish diversified financial literacy education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explore the path of financial literac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money management, of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of enhancing risk awarenes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 financial literacy; diversified education

---

(上接第 79 页)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College Liberal Arts Courses

CHEN Cui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As a hot new teaching concept in recent years, the flipped classroom has been actively carried out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various education stages in China. However,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is slow in our country. Some college teachers in liberal arts questi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Adop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of liberal arts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and compares it with that of science courses.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re exist various degrees of anxiety and low satisfaction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flipped class of liberal arts courses and low degrees of achievement of course learning goals. The college teachers in liberal arts courses can improve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the flipped classroom from such aspects as improv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acceptance of it, promoting students' deep–level learning,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constructing reasonable course evaluation systems.

Key words: flipped classroom;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generative teaching; course evaluation system

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及路径分析

利亚欣，陈　萍

（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立足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基于问卷调研方式分析大学生垃圾分类的生态共识和执行行为，剖析影响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主要因素，探究增强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路径。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垃圾分类行为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意愿、朋辈影响、学校的政策宣传、配套设施对其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因此，高校应进一步强化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的责任意识；营造大学生垃圾分类的自主性环境氛围；提升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吸引力；推进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方式的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切实推进大学生引领垃圾分类行为新风尚。

关键词：生态文明；大学生；垃圾分类

中图分类号：G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093-07

垃圾分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垃圾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指出：“截至2020年底，基本建立健全垃圾分类标准和分类规则，垃圾分类示范模式应运而生，垃圾分类的回收率超过30%。”[1]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到，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常流的美丽中国。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指示：“垃圾分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2] 截至2021年6月，上海、广州、厦门、杭州、福州等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制定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助力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其中，福州作为全国9大垃圾分类免检城市之一，首创出垃圾分类“三端四定”的工作模式，努力打造福州垃圾分类的2.0版模式，福州市公共领域的垃圾分类覆盖率已达100%，垃圾分类准确率在80%以上，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可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垃圾分类建设取得新成效[3]。

高校大学生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数据统计，2017年我国大学生人数近2690万人，到2020年全国拥有大学学历的约为1.3亿人[4]。数量庞大的高校大学生俨然成为生活垃圾的主要制造者之一。对于社会其他群体来说，大学生的灵活性和可塑性较强，在校接受生态保护教育，能够自觉践行垃圾分类行为[5]，所以大学生能够成为引领社会垃圾分类工作的主力军。因此，提升在校大学生垃圾分类参与度和认同感，对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和城市管理垃圾分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理论模型建构和调查方案设计

(一)理论构建

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指出，个体行为受到个人

收稿日期：2021-10-02

基金项目：教育部2021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02102468051)；福建省教育厅2019年中青年培育项目(JAS19063)。

作者简介：利亚欣(1997-)，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通讯作者：陈萍(1983-)，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的行为判断、情感意愿和个体所感知到的行为影响[6]。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通过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从个人特征、行为态度、责任意识、行为控制、政策宣传和配套设施六个方面设计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而构建出如下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个体特征:个体特征指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不同导致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差异。

行为态度:指大学生垃圾分类的意愿和对垃圾分类行为的价值判断。

责任意识:大学生的主观规范指大学生自身对进行垃圾分类的责任感意识以及周围人的行为决策对其个体行为的的影响。

行为控制:指大学生是否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自控力和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外部约束(如,时间条件、个人能力等)。

政策宣传:指约束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规章条例及对大学生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教育举措、教育内容和宣传力度。

分类标识:指学校分类垃圾桶使用效果及垃圾分类标识是否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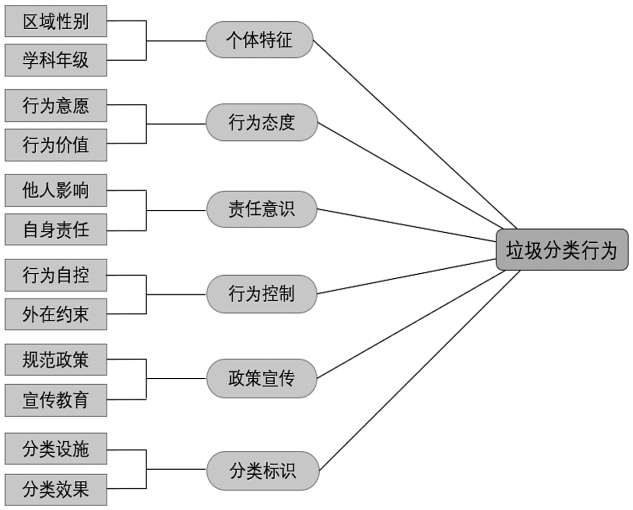


图 1 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

Fig.1 Concept model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二)研究设计

以福建省三所高水平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为例,调查在校大学生的垃圾分类行为现状,分析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为体现调查数据的真实客观性,在开展调查前通过实地考察和随机访问,以此确定调查问卷的问题设置(如表 1 所示)。本次问卷调查于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2 月在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三所高校依次展开, 采用随机抽样法和访谈法,邀请调查对象填写并提交在线问卷。发出问卷 1200 份,回收问卷 12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1131 份,有效回收率达 94.25%。后期数据经统计、整理后进行分析。

表 1 问卷设计

Tab.1 Questionnaire design

	项 目
个体特征	性别:1 女 2 男
	学科类别:1 工科类 2 文科类 3(农)理科类 4 艺术体育类
	年级:1 大一 2 大二 3 大三 4 大四 5 研究生及以上
	年龄:1 20 岁以下 2 20—25 岁 3 25—30 岁 4 30 岁以上
	生源地:1 大城市 2 中小城市 3 小城镇 4 农村
行为态度	是否会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1 每次都会 2 经常会 3 偶尔会 4 从不会
	是否认为垃圾分类是一项有益于环境和社会的活动:1 完全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完全不同意 5 无所谓
责任意识	周围人是否会自觉进行垃圾分类:1 每次都会 2 偶尔会 3 经常会 4 不会 5 看具体情况而定
	周围人对垃圾分类的态度和行为对自己的影响:1 影响很大 2 影响一般 3 不会影响
	生活垃圾分类是一种负责的行为:1 完全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完全不同意 5 无所谓
行为控制	是否清楚了解可回收垃圾所包括的内容及所属类别:1 非常清楚了解 2 一般清楚了解 3 比较清楚了解 4 不太清楚
	了解垃圾分类后, 是否愿意在垃圾分类设施完善后参与垃圾分类:1 非常愿意 2 视具体情况 3 不感兴趣
	您进行垃圾分类的制约因素:1 分类设备不齐全 2 自身分类知识的缺乏 3 分类标识不清楚 4 占用时间和精力 5 分类意识不强 6 其他
政策宣传	学校是否具有关于垃圾分类的规章条例或管理机制:1 有却是粗略规定 2 有且十分详细 3 没有制定 4 不太了解
	专业课程是否涉及生态文明知识:1 相关性强 2 相关性弱 3 不涉及 4 不清楚
	学院是否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1 经常且形式多样 2 偶尔且形式单一 3 较少 4 无
	了解垃圾分类的渠道(多选):1 报刊、读物 2 上网 3 电视 4 朋友或家人 5 学校宣传教育 6 不关注此类知识
分类标识	学校的垃圾分类配套设施是否完备:1 分类设施相对完善 2 一般 3 分类设施偏少,不完备
	学校的垃圾分类标识是否清晰:1 非常清晰,大多数人按照分类说明扔垃圾 2 有点清晰, 有些人按照分类说明扔垃圾 3 不太清晰, 大多数人不遵循分类说明扔垃圾 4 标识清晰度一般,很少有人按照分类说明扔垃圾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垃圾分类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在行为态度方面,33.60%的大学生“经常会”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偶尔会”分类投放的占 50.04%,每次都分类投放的仅占 7.61%。表示“从不会”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的占 8.75%;针对“垃圾分类是否有益于环境和社会” 的问题,96.55%的大学生选择 “同意”,2.30%的大学生表示“不同意”,仅 13 人对垃圾分类的意义并不关注。数据表明,垃圾分类行为得到大学生的广泛关注。

在责任意识方面,其一,针对“垃圾分类行为是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这一问题,超过 86%的大学生选择“同意”,约 14%的大学生选择“不同意”;其二,在问及 “周围人是否会自觉实施垃圾分类行为” 时,39.17%的大学生认为身边多数人会进行垃圾分类,51.99%的大学生认为身边少数人会实施垃圾分类行为, 认为身边人不会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占比为 8.84%;其三,90%的大学生认为周围人的态度和行为会对自己的垃圾分类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仅(10%)大学生认为周围人的态度和行为不会对自己产生影响。

在行为控制方面, 其一,41.02%的大学生认为自己了解可回收垃圾包含哪几类及所属的类别, 其中 7.60%的大学生非常了解垃圾分类的基本知识,48.10%的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知识 “了解一般”, 仍有 123 人选择不了解可回收垃圾的类别;其二,在“有基本的垃圾分类知识储备、分类设施健全的情况下,参与垃圾分类的意愿” 问题上,72.68%的大学生表示十分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实施,25.64%的大学生认为“会看情况而定,有时间精力就参加”,此外,1.68%的大学生对垃圾分类不感兴趣。总体上看,大学生愿意进行垃圾分类。

在政策宣传方面,首先,在学校是否具有关于垃圾分类的规章条例或管理机制问题上,41.11%的大学生认为学校有相关的规定但只是粗略地规定,24.67%的大学生认为学校的垃圾分类有关规章十分具体详细, 但是仍有 22.81%的大学生不知晓此类规定,仅 11.41%的学生认为学校没有制定相关管理条例;其次,29.18%的大学生认为学校经常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且形式多样,44.65%的大学生表示学校的相关教育偶尔进行且形式单一,26.17%的大学生表示学校垃圾分类教育活动开展频率较少,其中 5.39%的人选择“学校从未开展”活动;再次,在所学专业是否涉及生态文明知识的问题上,60.30%的大学生表示所学专业与生态文明知识不相关或相关性较弱, 只有 28.29%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所学专业与生态文明知识的相关性较强;最后,大学生获取垃圾分类知识的途径依次是浏览网页、电视广播、报纸书籍、学校的宣传教育、身边朋友,其中占比最高的是“浏览网页”,约 83%的大学生选择,这表明网络是大学生了解垃圾分类知识的主渠道之一。

在分类标识方面, 有 23.34%的学生认为大多数人按照分类扔垃圾, 使用效果不错,58.81%的大学生认为部分人按照分类说明扔垃圾,垃圾分类桶的使用效果一般, 仍有 18.04%的大学生表示学校垃圾分类桶使用效果较差, 大多数人都不遵循分类说明扔垃圾;78.07%的大学生认为学校的垃圾分类标识清晰或非常清晰,21.93%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垃圾分类标识一般或不太清晰。

(二)垃圾分类行为的交叉分析

1.个体特征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分析

在个体特征方面,将“性别、生源地、学科门类”作为自变量,以“自身垃圾分类频次”为因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得出:

从性别上看, 每次都会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约有 12%的女生,情况要好于男生(4.90%);且 37.41%的女生经常会践行垃圾分类行为,男生则有 31.37%,说明女生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表现要好于男生。这与女性更具有社会责任感是密切相关的[7]。

从生源地看,“经常会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大城市人口比例(40.17%)比中小城市(39.57%)、小城镇(26.30%)或农村(20%)高;在“从不会”实施垃圾分类行为中,生源地属于农村的占比最高(28.57%),远远高于中小城市(5.35%)、小城镇(12.24%)及大城市的(3.42%)。这说明学生生源地所在城市的级别越高,其垃圾分类行为表现越好,更愿意实施垃圾分类行为。

从学科门类看,每次都会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文

科类（7.94%），略高于农理科类（6.85%）、工科类(6.35%)；横向来看，各学科门类学生“偶尔会”实施垃圾分类频次占比较高；纵向来看，“经常会”实施垃圾分类中，艺术体育类占比较低为(23.68%)，说明相对于其他学科，艺术体育类的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需要加强。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垃圾分类行为受到性别、学科门类、生源地等个人特征方面的影响。

2.行为态度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分析

在行为态度方面，将“是否赞同实行垃圾分类是一项有益于环境和社会的活动”与“垃圾分类实施频率”进行交叉分析(如图 2 所示)。纵向来看，随着大学生对“进行垃圾分类有益于社会和环境”的价值认可不断提高，大学生进行垃圾分类的比例也在增加。认可“实施垃圾分类是一项有利于环境和社会的活动”的大学生每次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8.50%)高于不认同这一行为价值的大学生比例(4.71%)。这说明认同垃圾分类价值的大学生更有可能进行垃圾分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对他们的垃圾分类行为有积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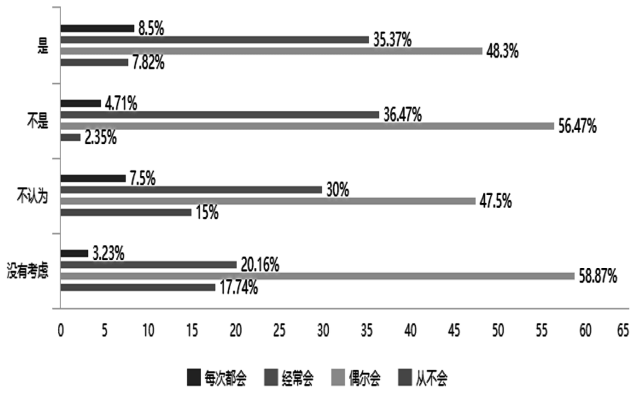


图 2　价值判断与垃圾分类行为的交叉分析

Fig.2　Cross-analysis of value judgment an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3.责任意识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分析

在责任意识方面，将“身边的人是否会进行垃圾分类”定为自变量，“自身垃圾分类实施频率”作为因变量，对其进行交叉分析得出：身边人“每次都会实施”的大学生，他们的垃圾分类行为表现为“每次都会实施”的比例为（38.60%），情况好于周围人偶尔(3.23%)践行垃圾分类的大学生。表明周围人“经常性”进行垃圾分类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实施垃圾分类。

“周围人的态度行为对其实施垃圾分类的影响”与“垃圾分类实施频率”进行交叉分析(如图 3 所示)：“每次都会践行”的部分大学生(10.62%)认为身边人的态度和行为对自身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每次都会践行”的部分大学生(9.73%)认为身边人的态度和行为对自身影响一般；仅有(4.77%)的大学生表示身边人的态度和行为不会对自己实施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大学生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及身边人的态度、行为和决策对大学生实施垃圾分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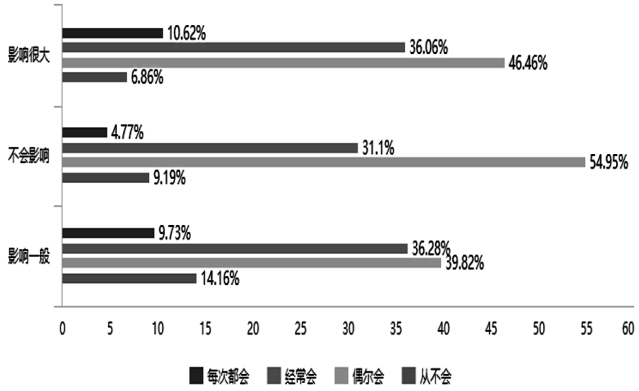


图 3　他人影响与垃圾分类行为的交叉分析

Fig.3　Cross-analysis of others´ influence an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4.行为控制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分析

在行为控制方面，将“有一定垃圾分类认知后的参与意愿”与“垃圾分类实施的频率”进行交叉分析(如图 4 所示)：在对垃圾分类有基本认识之后，大部分大学生愿意实施垃圾分类，“每次都会实施”者居多(8.88%)，远高于“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进行垃圾分类”的大学生(4.14%)；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强烈的大学生更有可能经常性定期实施垃圾分类(38.56%)，效果好于“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进行垃圾分类”(20%)。

由此可见，大学生自身的行为控制影响其垃圾分类行为。参与垃圾分类意愿较强的大学生更可能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有垃圾分类知识且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垃圾分类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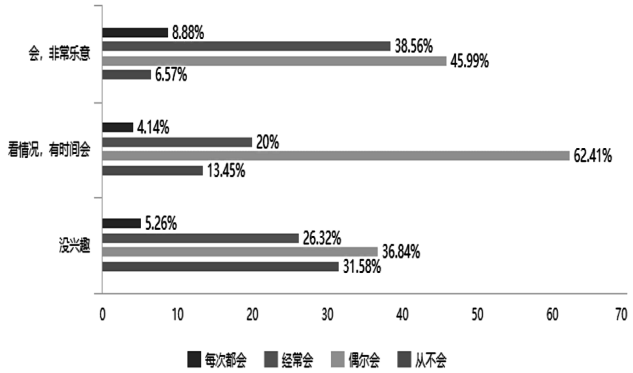


图 4 分类意愿与垃圾分类行为的交叉分析

Fig.4 Cross-analysis of classification willingness an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5.政策宣传和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分析

将“学校的垃圾分类教育活动举行情况”与“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频次”进行交叉分析(如图 5 所示):纵向来看，学校经常举办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活动,大学生“每次都会”进行垃圾分类占(13.94%),实际分类效果远好于学校偶尔进行宣传教育活动且形式单一(5.15%)、较少举办垃圾分类教育活动(4.26%);横向来看,学校垃圾分类相关教育活动经常性开展且形式多样,大学生“从不会”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最低(4.85%)。因此,学校垃圾分类教育的开展形式多样更有利于大学生践行垃圾分类行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学校垃圾分类的政策宣传和教育活动显著影响大学生垃圾分类实施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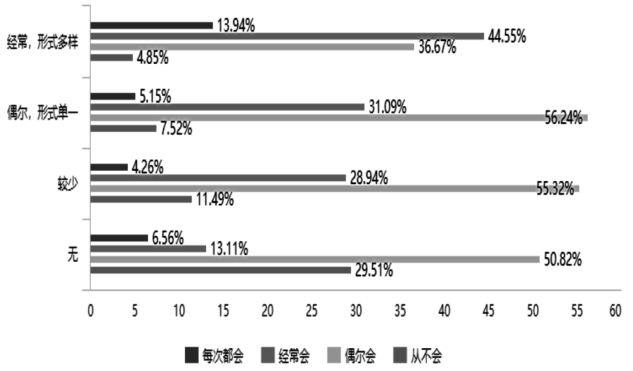


图 5 宣传教育形式与垃圾分类行为的交叉分析

Fig.5 Cross-analysis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orms an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6.分类标识和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分析

“学校垃圾桶分类标识是否清晰”和“自身垃圾分类的频率”进行交叉分析(如图 6 所示):纵向来看,垃圾分类标识“非常清晰”的大学生“每次都会”践行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最高(8.50%),垃圾分类标识“不太清晰”的大学生“每次都会”践行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最低;横向来看,学校分类标识“一般清晰”“非常清晰”的大学生“经常会” 践行垃圾分类行为的占比分别为 (35.37%)和(36.47%)。这说明学校的垃圾分类标识是否清晰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生实施垃圾分类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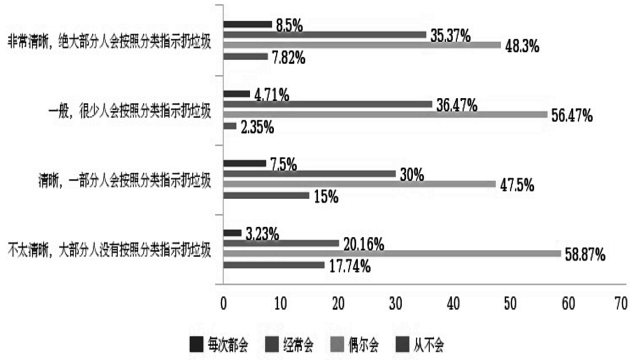


图 6 分类标识与垃圾分类行为的交叉分析

Fig.6 Cross-analysis of class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三、结论与建议

笔者以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状况为基础,分析其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影响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六个特征如下:(1)性别。相比男生,女生更倾向于实施垃圾分类。(2)价值判断。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着更高的价值认同和责任意识。(3)朋辈影响。周围人经常参与垃圾分类。(4)行为意愿。对垃圾分类有一定认知、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5)政策宣传。学校垃圾分类相关政策及宣传教育到位。(6)硬件设备。校园垃圾分类标识明晰,分类设备齐全。

基于上述调查分析,提出推动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建议如下:

(一)强化大学生对垃圾分类、节约资源的责任意识

“垃圾分类引领绿色生活的新风尚。”[8]大学生进行垃圾分类的行为态度直接决定其对于垃圾分类行为的接受度和践行度。从学生个体的角度来看,加强垃圾分类的实施促使大学生对垃圾分类有一定的行为动机。

养成垃圾分类回收的良好习惯。大学生理应懂得

垃圾分类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们是有着高素质水平的群体,思想开放包容,应主动接受“垃圾分类”的新理念,自觉学习“垃圾如何分类”基础知识,提高垃圾分类意识。

树立资源再利用的生态意识。大学生的生态意识是增强生态文明意识的基础,只有树立了节约意识、生态意识,才能从垃圾分类的小事做起,使之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学生的一言一行都彰显了高校的德育及素质教育是否到位,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有责任承担“垃圾分类”这份责任,担当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带头兵”使命,推动垃圾分类行为普遍化、常态化。

(二)营造大学生垃圾分类的自主性环境氛围

这里所提到的学校环境因素不是指学校营造的垃圾分类环境,而是指学生的垃圾分类行为发生的环境是否具有足够的自主性和民主性,拥有自主性环境的人执行动力越强。

拓宽学生垃圾分类的渠道。单一的渠道给人以强制性的印象(例如:仅是在宿舍楼下设置分类垃圾桶而取消走廊上的垃圾桶),这种行为会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大大降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因此,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的垃圾分类链:从宿舍到宿舍楼道到楼下的环环相扣的处理设备。

扩大学生垃圾分类政策的民主参与和监督。给予学生更多的民主性和自主性,培养他们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通过他们在垃圾分类政策实施中的参与度,提高其垃圾分类的动机和执行力。

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充分运用校内资源,在垃圾分类志愿活动中筛选出一批对垃圾分类有强烈责任感的学生,组建垃圾分类志愿监督小队,发挥他们的榜样作用带动全体学生,提高大学生参与垃圾分类活动的积极性,形成自身实施垃圾分类且监督别人分类的和谐局面,以榜样同学为关键,辐射性地影响其他学生,规范他们不良的垃圾处理行为,吸引更多的大学生主动参与垃圾分类行动。

(三)提升垃圾分类行为对大学生的吸引力

行为吸引力,指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实施诱因和动机,包括:校园环境和朋辈影响等“看不见的手”和校园垃圾分类相关的规章制度、奖惩机制等“有形的手”。

开展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教育。一方面,宣传垃圾分类的可操作性知识,通过讲座、标语、文化墙、宣传栏等方式进行教育,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垃圾分类行为和国家生态环境环保、资源节约等问题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增加朋辈影响力。周围朋辈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行为对大学生开展垃圾分类具有带动作用。通过评选垃圾分类优秀标兵、宿舍长等形式,达到老生带新生、优异表现者带动身边人实施垃圾分类的效果。

完善和落实垃圾分类管理工作。首先,加强校园垃圾分类配套设施建设,做到及时维护和更换。高校应综合考虑校园各个区域的垃圾类别,针对性地安排标识清晰、数量充足的垃圾分类设备,科学安排垃圾分类设备的摆放位置和垃圾桶的放置布局,进一步优化垃圾分类标识的设计,做到简洁易懂,建立“垃圾分类输送、分类处理”体系[9],为大学生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提供前提保障。其次,建立健全垃圾分类管理的奖惩机制。校团委、学生会、社团要定期表彰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积极主动、有突出贡献的志愿者,以此激发学生参与垃圾分类管理的热情;对有良好垃圾分类行为的宿舍或班集体,可以给予表扬和鼓励,对绩效较差的群体进行批评和教育,从而实现校园垃圾分类行动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垃圾分类工作长期有效开展。

(四)推进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方式的现代化、信息化

加强媒体生态舆论引导。我国现阶段的生态文明宣传手段较为局限,在信息化时代,充分发挥互联网媒体的优势,网络宣传比传统宣传方手段更快捷、涉及范围更广。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可以制作与生态保护相关的生态纪录片、微视频等进行广泛传播,“互联网是全球沟通达到生态文明共识的最佳工具”[10]。总而言之,利用“互联网+”这一载体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更能深入人心。

依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业化建设。建设垃圾分类相关教育和教材数据库,实现教学资源共享。根据不同的专业设置,个性化地开展垃圾分类教育,用好各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另一方面,创新垃圾分类教育教学活动,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开展多样化的校园垃圾分类文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如“绿色校园”摄影展、垃圾分类周、带领学生参观生态建设示

范地等实践活动,提高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知行合一”,营造浓厚的垃圾分类校园氛围。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7〕26 号)[EB/OL]. (2017-03-18) [2018-08-15]. http: //www.gov.cn/ zhengce/content/2017- 03/30/content_5182124.htm.

[2] 刘力波,黄炜熔. 以垃圾分类工作为契机系统推进生态道德教育[N]. 西安日报,2019-09-02(009).

[3] 新华网.福州打造“2.0”版垃圾分类模式 [EB/OL]. (2020-12-22) [2020-12-22].http://www.fj.xinhuanet.com/zhengqing/2020-12/22/c_1126891049.htm.

[4] 高书国,李捷,石特.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战略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2019,13(3):1-9.

[5] 李晓非,李达.大学生环保行为的经济学实验研究[J].生态经济,2018,34(2):124-129.

[6] AI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2):176-211.

[7] ALP E,ERTEPINAR H,TEKKAYA C,et al. A survey on Turkish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Environmental Friendly behaviors and Associated Variables [J]. Environment Education Research,2008,14(2) :129-143.

[8]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20-01-01(001).

[9] 孟小燕.基于结构方程的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J].资源科学,2019,41(6):1111-1119.

[10] 袁继池.生态文明简明教程[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77.

(责任编辑:白 晔)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s of College Students´ Garbage Sorting Behavior

LI Yaxin, CHEN Ping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cological consensus and implementation behavior of waste separ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research, analyze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waste separation behavior, and explores the ways to enhance waste separation behavior.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ir value recognition and behavior willingness, peer influence, school policy propaganda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waste separation behaviors.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college students´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for garbage sorting; create an autonomous environmental atmosphere for college students´ garbage sorting;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garbage sorting behavior;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methods,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to lead a new trend of garbage sorting behavior.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llege students; garbage classification

高校基层党组织创建标杆院系的实践和成效

——以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党总支为例

郑雪琴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安全与环境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工作是高校基层党组织坚持从严治党，深化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有力抓手，是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全新探索。以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为例，聚焦“五个到位”，以提升组织力和干部队伍建设为重点，探索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创建举措，从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起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取得良好成效，推动了学院“双高”建设。

关键词：高校党建；标杆院系；样板支部；“双高”建设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100-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全面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战略性回答了新时代高校党建发展的方向，为做好新时代高校党建和教育工作奠定了根本性基础。新时代孕育新要求，新要求引领新方向。作为“全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党总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新时代高校党建“双创”工作、学校“双高”中心工作要求，聚焦“五个到位”，通过“党建+好制度”“党建+好班子”“党建+好队伍”“党建+好党员”四项举措，厚植党建根基，勇于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党建与思政工作成效，高质量推进“双高”建设。

收稿日期：2021-12-22

基金项目：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公布首批全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样板支部和“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培育创建单位项目（闽委教组〔2019〕5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首批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标杆院系、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项目（教思政厅函〔2021〕2号）。

作者简介：郑雪琴（1967-），女，汉族，教授，主要从事党建思政方面的研究。

一、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党总支创建标杆院系的背景

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高校党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开展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2018年，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技术与环境工程系第二党支部被列为全国首批新时代高校党建“双创”工作培育的“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开展福建省高校“十百千万”工程创建工作的通知》，2019年，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党总支（时称安全技术与环境工程系党总支）被列为全省首批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根据培育创建要求，党总支制定了两年建设周期的建设计划，落实分层次分步骤的建设任务，坚持培育为基、重在建设、典型引领、整体推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质量攻坚为动力，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以推动事业发展为落脚点，严格对标看齐，勇于改革创新，努力创新党建工作新机制，打造党建工作优秀

品牌。

安全与环境学院党总支设总支委员 5 名，其中，总支书记 1 名、副书记 1 名，组织、宣传、纪检委员各 1 名，并配备专职组织员 1 名。党总支书记既是党建带头人，又是专业带头人(教授)。学院现有党员 50 人(含学生预备党员 17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13 人、讲师 13 人、助教 4 人；博士 6 人、硕士 27 人，是一支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队伍。以教研室为单位设置 3 个教师党支部、1 个学生党支部，每个党支部均选优配强支部书记和组织、宣传、纪检委员，“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 100%覆盖(如图 1 所示)。安全与环境学院党总支 2016 年荣获“福建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福建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2016、2017 年所在院系连续 2 年获福建省“五一先锋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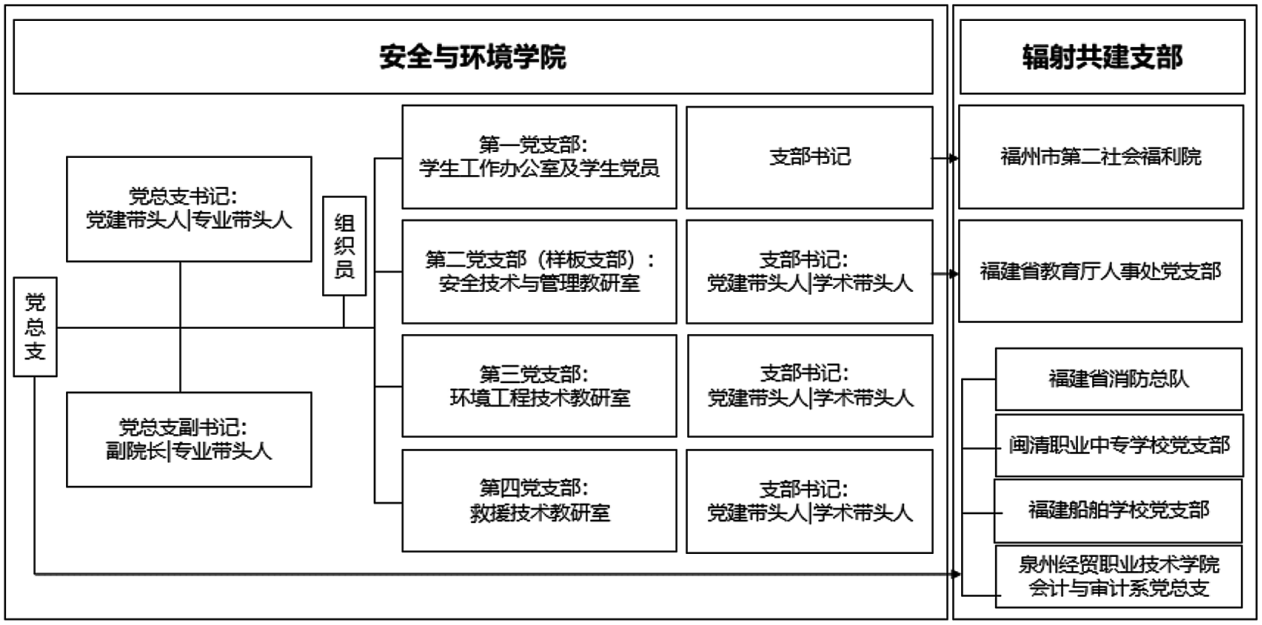


图 1 安全与环境学院党组织结构

Fig.1 Party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the School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二、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党总支创建标杆院系的实践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指导下，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按照新时代高校党建“双创”、学校“双高”重点工作要求，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聚焦党建工作短板和瓶颈，实施“党建+好制度”“党建+好班子”“党建+好队伍”“党建+好党员”四项举措，担当政治使命，筑起党建标杆。

(一)分层订立标准，以“党建+好制度”提升党建水平

党总支完善议事决策制度、标准、流程，做到“四个保障”，落实“四个到位”。有效发挥党总支“研究决定、前置讨论、政治把关”的作用，制定和完善“三重一大”制度 10 多项，完善党政联席会议议事决策规则，有效解决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虚化、作用弱化的问题。

创建并全面实施基层党支部评星定级积分量化标准化管理制度。对照党建工作要求和特点，将工作细分为 6 大模块、20 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支部创星达标拉练考核”活动[1]。一是由支部领走党建工作责任书，设定标准，量化指标，形成部署、跟踪、反馈、追责、问责的闭环链条，真正让党员干部做到履职尽责、将工作落实落深落细。二是将党建工作业绩纳入学院年终绩效考核体系，以支部为单位，制定 7 大类 69 个小点的考核指标体系，做到季度有小结、半年有中期、年终有总结，不断增强党建工作执行力。三是将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结果作为干部提拔任

用、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真正做到“述出责任、评出压力、考出动力”。

（二）壮大“领头雁”，以“党建+好班子”领跑基层党建

党总支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属性，着力配好班长、建设好班子、培养好梯队，打造一支敢担当有作为、过得硬打胜仗的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总支—支部—党小组”“双带头人”全覆盖，有效破除“两张皮”。党总支书记既是党建带头人，又是专业带头人（教授）。党政领导交叉任职，院长（副教授、博士）兼任党总支副书记、一名副院长兼任工会主席、另一名副院长兼任组织委员。通过着力配好班长、建设好班子、培养好梯队，有效强化党总支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属性，打造一支敢担当有作为、过得硬打胜仗的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

把教师党支部建在教研室上，实现“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全覆盖。第二党支部（安全技术与管理教研室）建成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坚持和加强党对业务工作的领导，把党建贯穿于科研、教学、育人、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工作全过程，“一岗双责”履行到位，充分发挥教师党支部在专业建设的战斗堡垒作用和教师队伍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三）筑牢团队根基，以“党建+好队伍”发挥堡垒作用

党总支始终以提升组织力、干部队伍建设为重点，以支部党员队伍建设带动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一支占教职工总数 86%、平时叫得响，关键时候顶得住，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能起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队伍，其中国家应急管理专家组专家 1 名、省政府安全生产专家 1 名，福建省杰出优秀教师 1 名、福建省教学名师 1 名。

发挥“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勇创“安全技术与管理”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广泛开展党员先锋岗、党员“双高”项目负责制等争先创优主题实践活动，打造党性强、师德高、能力优、协作好的国家级教育教学创新团队 1 个、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 个、校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2 个、校级科研创新团队 2 个。组建“安全环保党员服务先锋队”，以“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做奉献”为载体，组织党员进社区、福利院、乡村、企业，开展了“河小禹”护河专项行动等社会服务 30 多场，精准扶贫、持续攻坚，在学院形成了想做事、能做事、做成事的氛围。近年来，党员教师获福建省优秀教师、福建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省直机关”三八”红旗手、福建省“五四”青年奖章、福建交通运输系统先进个人、第十五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等荣誉 6 人次，校级优秀教师、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班主任、优秀辅导员等荣誉 100 多人次。

（四）培养先锋能手，以“党建+好党员”引领示范效应

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和高质量社会服务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施“竞进服务工程”。以国家级教学成果总结与奖项申报、国家级教育教学创新团队的创建、“平安交通”课题研究与实践等为着力点，攻坚克难、破解专业教学改革难题，荣获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项、福建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1 项、省级以上信息化教学能力比赛奖项 11 项，职业技能竞赛奖项 18 项，全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竞赛奖项 6 项。

成功申报 1 个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课题研究项目、1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15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完成 3 个环保类“1+X”证书标准编制、2 个省级产教融合基地及企业培育建设、2 个省级教学资源库。与福建省消防救援总队签订共建合作协议，联合成立“消防救援学院”，开展“二元制”人才培养合作，共同打造新时期消防救援队伍与高职院校联合人才的“样板”工程。此项共建合作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也予以报道。该模式也得到其他相关院校的认可，加入探索开展消地融合共建行列。

三、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党总支创建标杆院系的成效

党总支围绕高校基层党组织“五个到位”的要求，创新“一心双高三提升”党建工作机制，打造“双创四优护红线”党建品牌，破解“中梗阻”难题，坚持以党建带动专业群建设，推进党建与事业发展的融合，从三

个维度全面提升三全育人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发挥示范引领辐射作用,提升影响力。

(一)创建"一心双高三提升"党建工作机制

一心:以党的建设为中心,确保党组织领导、政治把关和制度执行到位;双高:党建引领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与高质量社会服务,确保推动改革发展到位;三提升:全面提升全员育人的广度、全过程育人的深度、全方位育人的厚度,确保思想政治工作到位[2](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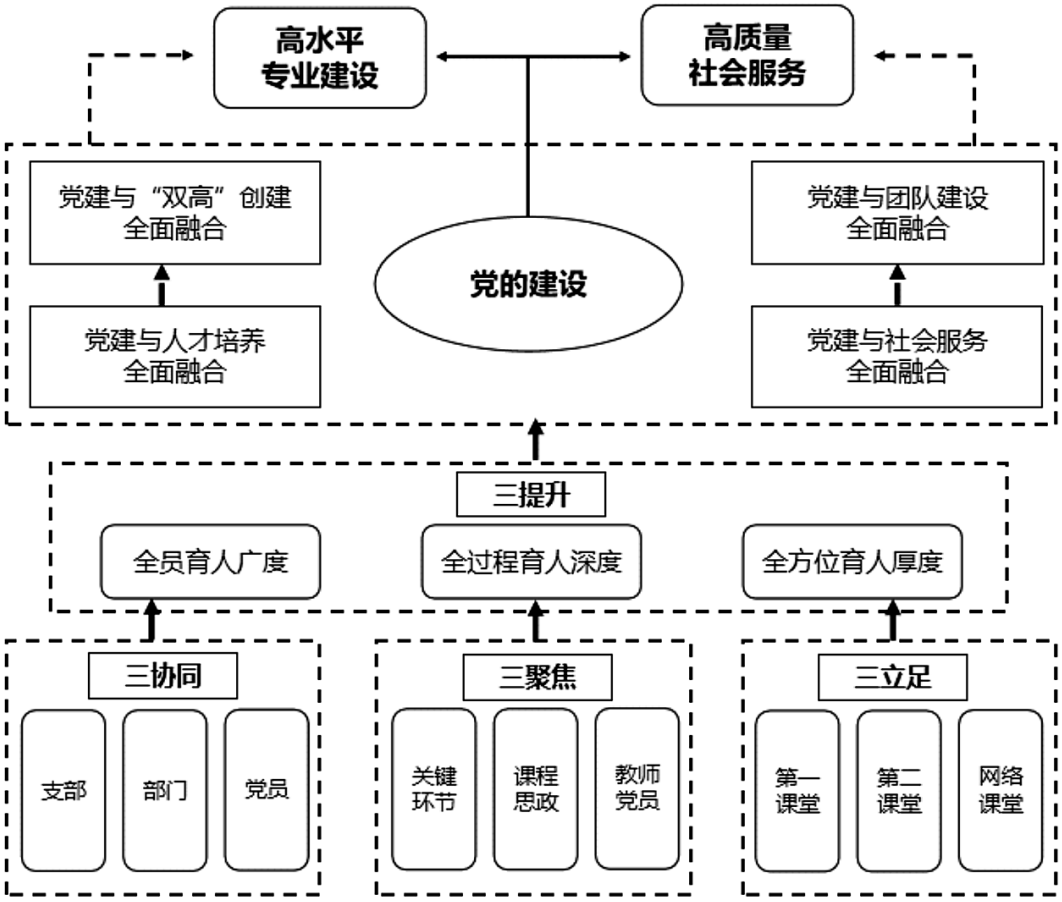


图 2 "一心双高三提升"党建工作机制

Fig.2 "One center, double quality construction, trible promotion" party building work mechanism

党的建设与"双高"创建、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相融合,坚持教育服务社会、服务行业、服务脱贫攻坚,在专业建设和社会服务方面获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通过"三协同、三聚焦、三立足",全面提升了三全育人的整体成效,从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突破。2019 年"安全技术与管理"专业群入选国内唯一安全类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专业群, 全国首批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第二党支部 2021 年通过考核验收。

(二)打造"双创四优护红线"优秀党建工作品牌

贯彻"职教 20 条"等重大职教改革文件精神,以党的建设带动专业群建设,推动高水平、高质量发展。严格对标"五个到位",创新"一心双高三提升"党建工作新机制,以"串线式、编织式和麻花式"组织建设方式,持续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竞进服务"强化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三协同、三聚焦、三立足"全面提升全员育人的广度、全过程育人的深度、全方位育人的厚度,打造党建机制优、组织建设优、竞进服务优、育人模式优的"双创四优护红线"党建品牌[3],在省内外共建支部及"群、团、工、妇"组织中全面发挥辐射和示范带动作用,获优秀党建工作品牌,在"学习强国"平台上报道。

(三)党建引领事业发展,解决"两张皮"问题

通过推进党建与专业建设、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深度融合,推动业务发展取得突破性成效,有效解决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问题[2](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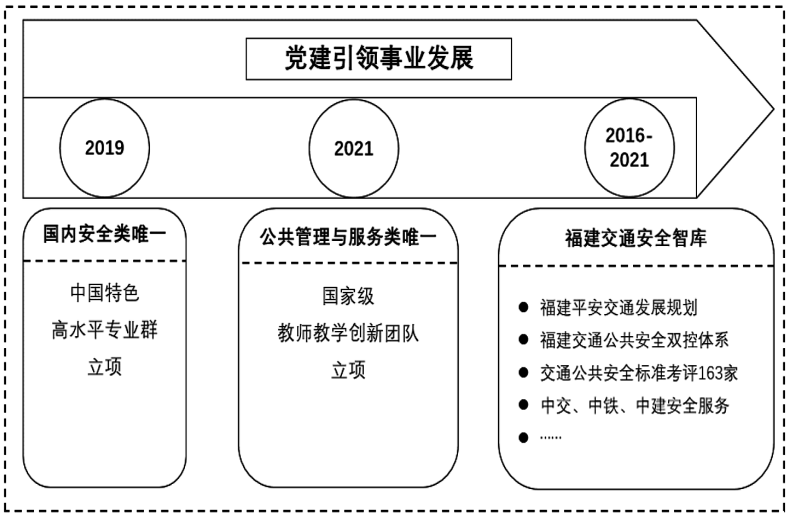


图 3 党建引领事业发展

Fig.3 Party building leads career development

第一，党建引领攻坚克难，获国内唯一安全类“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立项。通过党建机制创新实践，以“串线式、编织式和麻花式”组织建设方式持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攻坚克难，以“先锋竞进工程“激发党员活力，克服安全技术与管理、环境工程技术作为交通类院校非核心专业的劣势，2019 年专业群获 “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建设立项（国内安全类唯一）。

第二，党建引领创新发展，获多个国家级项目立项。将支部建设在教研室上，发挥“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的引领作用，2021 年，以“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融合建设的教学团队获“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国内公共管理类唯一）、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课题研究项目---新时代职业院校公共管理与服务专业领域团队教师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与实践立项。

第三，党建引领科技服务，成为福建交通安全智库。通过实施党员“先锋竞进工程”和“双带头人”工作室，搭建全国交通安全标准化考评一级机构（全国首批、高职首家）、“交通土建与绿色建造国家职教创新行动计划协同创新中心”“交通运输安全评估与控制省级应用技术工程中心”及省级安全培训机构等多个平台。骨干党员受托为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福建平安交通发展研究》《福建交通行业安全隐患排查及风险管控双控控制研究》等行业发展政策研究支持；为中交、中建、中铁等央企子公司和福建高速技术咨询公司等地方交通行业企业提供安全标准化考评、安全咨询等技术服务近 5 年服务企业 163 家，完成各类攻关科技与社会服务任务 63 项，经费突破 600 万元，成为福建交通安全智库，有效助力行业安全发展。

（四）发挥示范引领辐射作用，提升影响力

党总支严格对标“五个到位”，始终坚持党的建设与业务工作相融合、双促进，形成了一套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典型经验。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加强宣传工作，通过校内外媒体进行党的建设、办学举措、产学研合作成果、社会服务、典型案例、优秀榜样的宣传报道，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扩大了社会影响力。近两年在人民网、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福建教育微言 APP、新福建 APP、学习强国 APP、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网站、党建先锋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平台广泛宣传，提升社会影响力。

表 1 宣传平台及报送总量

Tab.1 Promotion platform and total number of submissions

序号	宣传平台	推文数
1	人民网	1
2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	55
3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网站、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党建先锋微信公众号	35
4	学习强国 APP	3
5	福建职业教育、新福建、福建教育微言	3
6	船小安----安全与环境学院微信公众号	368

表 2 有代表性的宣传成果

Tab.2 Representative publicity results

序号	宣传平台	文章标题
1	人民网	党建巡礼---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党总支：用高质量的党建引领“双高”建设
2	学习强国 APP	福建探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第二党支部打造“双创四优护红线”党建品牌
3	学习强国 APP	党建巡礼---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党总支：用高质量的党建引领“双高”建设
4	学习强国 APP	多彩校园----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团委持续开展“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系列活动
5	福建职业教育 APP	党日活动---林和平厅长参加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主题党日活动
6	新福建 APP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党总支：用高质量的党建引领“双高”建设
7	福建教育微言	党总支书记郑雪琴就“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发言交流

表 3 标志性成果

Tab.3 Iconic results

序号	标志性成果
1	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安全技术与管理专业群(2019 年)
2	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安全技术与管理教学团队(2021 年)
3	国家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交通安全虚拟仿真实训基地(2021 年)
4	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课题研究项目---新时代职业院校公共管理与服务专业领域团队教师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与实践(2021 年)
5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基于船政文化精神的德技并修,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与实践(2018 年 12 月)
6	福建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基于船政文化精神的德技并修,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与实践(2018 年 7 月)
7	福建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成果导向双循环高职人才培养质量管理模型的研究与实践(2021 年 7 月)
8	福建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一经一纬四纵四横” 文化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2021 年 7 月)
9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 (2018 年首批,已通过验收)
10	全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2019 年首批)
11	福建省先进基层党组织(2016 年)
12	福建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2016 年)
13	党建宣传片---支部建设七有力, 助力 “双高” 促发展(2020 年)
14	党建宣传片---高质量的党建,引领“双高”建设(2021 年)

四、结语

高校基层党组织通过创建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创新党建工作思路方法,在破解高校党组织“中梗阻”、党建业务“两张皮”等难题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不仅使党总支建设水平和能力得到全面提升,而且促进了国家“双高”专业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一心双高三提升” 党建工作机制、“双创四优护红线”党建工作品牌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下一步将不断总结经验,推陈出新,以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标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 黄端华,郑雪琴,陈明仙.基于高校党建“双创”背景下党支部“五化一体”党建机制的探索与实践[J].时代人物,2020,25(4):124-125.

[2]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学院党总支: 用高质量的党建引领“双高”建设[EB/OL].(2021-04-13)[2021-12-10].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788883785644425404&item.

[3]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安全与环境第二党支部打造“双创四优护红线”党建品牌[EB/OL].(2021-02-08) [2021-12-10].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10186144535335023801&item.

(责任编辑:白 晔)

The Practice and Effect of Establishing Bench-Marking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by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the General Party Branch of Institute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in 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 as an example

ZHENG Xueqin

(School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It is a new exploration to strengthen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in the new era that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sist on strict party governance and deepen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Institute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in 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 as an example, focusing on the “Five reaches the designated position”, Institute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enha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 and cadres team, explores bench-marking measures in new era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 result, it comprehensively promotes the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demonstration leading role, good achie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ge “Double Height Construc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Party construction; bench-marking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model branches; “Double Height Construction”

关于高校保卫处改为安全处职能转变的思考

潘志光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安全处，福建 厦门 361001)

摘 要：当今许多高校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将原校内保卫机构改为综合安全处，并对新的机构职能重新界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职能实施过程存在诸多的问题。从历史发展来看，高校保卫组织是维护高校乃至国家稳定的重要力量，是国家公安机关不可缺少的基层组织，是高校校园综合治理的主要职能部门，为维持国家稳定、社会安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进入新时代，高校保卫工作的职能随着形势发展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了“防范、管理、教育、服务”四位一体的工作新思路、新机制，高校从保卫职能向安全职能的转化和提升也由此应运而生。

关键词：保卫处；安全处；教育

中图分类号：G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2)10-0106-0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1]时下各高校在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安全重要指示中，都纷纷把原有高校中的保卫处机构改设为安全处，以适应新形势下对安全工作的要求。笔者试就保卫处改为安全处后职能转变做些探索。

一、安全处和保卫处职能界定区别

高校安全处和保卫处共同的职能都有负责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法制、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保卫工作的宣传教育，增强师生员工的法制观念、政权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协助国家安全、公安机关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负责维护稳定和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落实综治工作责任制，负责办理校综治委的日常事务。负责学校治安保卫制度的制定，落实安全保卫责任制和安全技术防范措施，防止盗窃、破坏和治安灾害的发生，调解处理学校内部治安纠纷，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治安问题组织专项治理；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和领导报告校内发生的相关事件或者案情具体情况；保护好案发现场，并做好协助调查与事件相关人员有关情况，打击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指导基层治安保卫工作；协助公安机关整治学校周边环境，维护校内秩序。负责全校消防安全工作，落实各项消防法规，培训义务消防队员，定期修改完善有关消防制度，及时巡查消防设施以及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并对存在的问题督促整改；负责全校教职工和学生户籍管理，协助人事处做好出国人员政审工作；及时了解、登记在校内从事各项工作的相关人员，登记好流动人口；依据学校有关规定对校园秩序进行有效管理；负责联系社区居委会，做好纠纷调处工作等职能。改为安全处后其职能显然要比保卫处扩大许多，否则，就有换汤不换药之嫌，改名就没有实际意义了。至少，以下几个层面保卫处时代职能所没有涉及，或是很少主动介入，提前加以防范。一是意识形态领域，如网络安全，师生中在网络上有不当言论，涉及宗教进校园，有境外组织进校园传播宗教，周边宗教场所的监控，信教师生的调查、转化等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工作；二是工地施

收稿日期：2022-02-17

作者简介：潘志光(1963-)，男，汉族，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高校行政管理研究。

工安全,生产作业安全是第一要务,在安全处架构下,其职能中明确阐明必须对工地安全生产进行监督管理,如涉及使用明火的电焊,就需要安全处审批;三是食品安全监督。以往若没有发生食物中毒之类的恶性案件,保卫处是不会主动介入食品安全问题的,如定期对食堂留样饭菜,冰箱、仓库的库存食品,商超货架上的食品是否过期等都需要做定期检查监管;对广大师生进行安全防范教育等。凡此种种,安全处职能大大超越了保卫处职能,简单说,保卫处有的职能,安全处都应该有,新形势下,强调的是大安全概念,因此职能扩展了许多。但在转变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有些是老问题,此处一并点出,并提出个人看法和见解。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思想观念跟不上

近年来,高校的发展与改革以及规模、职能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影响着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职能。而某些高校的相关领导部门以及部分领导的思想观念未能适应形势要求,往往习惯于老思维、老办法、老经验来解决新的问题[2]。只有在事情发生了,再考虑如何处置,安全防范意识很淡薄。部分教职员工和广大师生,甚至是有些中层干部脑子中根本没有安全意识,或者安全意识很淡薄,只是有时候布置了某项任务,如签订综治安全责任书,一签了事,其它工作认为是安全处专职干部的事。也有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能躲就躲,蒙混过关,认为许多安全措施都是多余的,甚至埋怨、诅咒,认为小题大做、浪费资源、劳民伤财。

(二)职能扩展意识不到位

随着高校安全保卫工作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些分管安全的领导干部也对高校安全保卫工作认识不足,部分从事安全工作的专职干部对自身素质提高的重要性认知度不够,欠缺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思想观念转变也没有适时跟上,还完全停留在仅仅保卫层面上,没有大安全概念,甚至认为有些工作管多了,越权了。如,食堂的食品安全、工地施工安全,意识形态领域的网络安全、宗教信仰等问题,在原先保卫处职能中很少去过问,只有出了问题才会介入,而不是主动地做好这方面的安全防范排查工作。当然,有些受干部管理和相关待遇、制度机制不够健全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有些从事安保干部思想意志就不够坚定,没有脚踏实地的务实工作精神,没有主动的工作创新意识,服务意识淡薄,严重影响工作状态和效果[3]。另外,以政府购买服务式的安保相关人员的业务、素质、能力都亟需提高。但最主要的还是指导安保工作队伍的安全处专职干部,必须跟上形势要求,不能只按老套路出牌,包括政治站位方面,业务能力方面,特别是,对于信息化建设方面和安保工作作用的认知方面。现在许多高校信息化运用,如车辆识别系统、人脸识别系统、远程预约系统、智慧消防等等,早已在高校广泛应用,遗憾的是许多高校的领导,或安全保卫干部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运行机制不顺畅

虽然现行高校安保工作的体制与机制以及工作格局没有统一规定,往往造成盲目管理、随意管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校园安全实质性问题[4]。从现状看,目前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基本上接受教育、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和协调,这种体制机制本身就存在着交叉、重复,有时甚至出现多头管理,看似工作上指导有力,实际上由于他们没有事先协调达成统一意见,要求不一,让安全处无所适从,而安全保卫部门囿于自身的条件,有些是很难完成目标任务的。高校安全保卫部门没有执法权,一般性的案件处置都显被动,如,涉及学生违反学校规定,晚归、爬墙等,安全部门无权处置,就很难对学生形成震慑力。涉及刑事治安案件也只能交由公安部门处理,但有些却又难以给案件定性,公安部门也由于警力不足,往往推给学校自行处理,由此造成的尴尬,时有发生。同时,新形势下,安全处职能架构下所接受的指导部门,远不止上述部门,如环保部门、食品卫生监督部门等,许多高校安全处机构都没有主动对接,有时就难免造成工作上的被动,这些都是体制机制上所造成的弊端。

(四)制度落实不到位

许多高校安全制度不落实,职责不清,职能交叉。有些高校虽然制定了许多安全工作制度,但大部分职能部门或二级学院仅仅是把制度挂在墙上,并没有把工作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居多都是应付了事,或者干

脆不做。特别是有些演练方面的制度要求,更是被许多人认为多此一举。安全工作涉及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领域,“一岗双责”未能有效落实,有些部门负责人缺乏担当精神,认为安全工作就是安全部门的事。还有就是某些领域工作交叉重叠,没有明确界定,如学生宿舍用电改造,是学工部、后勤处,还是安全处?谁也不敢轻易介入,出现无人管的真空地带。

三、认真履职,责任到位,开创工作新局面

面对上述困难和问题,我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强化工作。

(一)促进思想观念转变,推进管理模式创新,突出服务和教育职能

1.在思想认识方面

一定要主动跟上新形势发展需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从保卫处到安全处职能转变要求,重新界定职责范畴,修订新的工作计划,使工作真正到位而不越位。

2.在防范职能方面

强化政保管理、治安管理、消防管理、校园秩序管理,从打击违法犯罪为主过渡到预防为主、打防结合阶段。适时开展各种演练,提高安全干部队伍及安保人员的素质。

3.在管理和服务方面

强化安全服务能力,寓管理于服务中,由保护个体安全拓展为师生提供安全有序的校园环境,安全保卫工作从单纯以涉案师生为管理对象扩大到将全体师生作为服务群体,师生由被动管理对象变为服务主体。

4.在宣传教育方面

强调对全体师生员工的安全宣传与培训,通过安全教育活动、安全知识宣传、安全知识授课等形式强化教育职能,并将安全教育与安全防范、管理、服务融为一体,形成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安全保卫工作机制。

学校安全保卫工作主要体现在预防违法犯罪、净化校园环境和加强治安防范、保证校园平安等方面[5]。安全保卫干部和安保队伍要确立“防范、管理、教育、服务”的四位一体工作职能,防范,就是要做到未雨绸缪,工作要有前瞻性,一切未发生却有可能发生的事都要有预案;管理,就应该对职责范围内工作履职尽责,全面管理到位,不出纰漏;教育,就是对全体师生进行有效的宣传教育,要把安全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结合各种班会,讲座等,不厌其烦地灌输安全理念;就其整体功能而言,服务是最充分、最具代表性的职能,为师生提供服务是安全保卫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安全保卫工作中的具体体现[6]。我们一定要适应新形势要求,及时转变思想观念,创新管理模式,开拓新的工作方式方法,为广大师生提供安全的环境。学校领导层面要发声,党委每年至少一到两次专题听取安全工作汇报,研究安全相关事宜。只有领导重视了,能够以学校名义,开展各种声势浩大的安全培训教育,才能引发广大师生对安全工作的重视。

(二)跟上时代步伐,提高工作效率,推进工作现代化

新时期安全工作,许多高校运用了数字化智能设备,如人脸识别系统、车辆识别系统,监控等设备,但要真正实现智能化,远不止这些设备,如智慧消防、远程预约来访装置、一键报警等,有些高校领导认为投入这些领域不值当,学校有更多领域需要资金建设,安全嘛,不出事就好,何必花费这么多钱?因此,有些高校不愿意在信息化建设上多投入,信息化手段依然很落后。安保也与物业混杂在一块管理,安保队伍专业化水平极低。事实上,只要经过科学的论证,一般情况下,投入与收益是成正比的。安保与物业分开招标,这样有利于安保队伍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管理手段一定要跟上信息化步伐,舍得投入,就会有回报。有些高校还专门设立了安全体验室,师生安全意识得到强化,虽然看不见,但成效常在无形中。

(三)推进安保队伍建设,转变工作职能 ,为人才培养提供保障

人才队伍建设是职能转变的关键,没有高质量队伍,就难以实现从保卫处到安全处工作职能的转变和工作层次的提高。因此根据新形势要求,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科学定编,优化岗位设置,合理配置干部。选拔身体好、素质高、业务强的安全保卫干部,组成一支高效、精干的高校安全保卫干部队伍,有效提

升安保队伍整体素质。二是建立运行有效的工作机制,如周例会制度,让每个安全保卫干部所做的工作都在周例会平台上展现, 也可以发挥集体的智慧,共同讨论协商安全保卫相关事宜等。要对安全处干部合理分工,但分工不分家,设立 AB 角,互相补位,努力做到工作无死角。努力与高校各职能部门的实现良性互动、整体优化。三是合理改善高校保卫干部的学历、知识、年龄结构,培养出一批年轻、有朝气、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技能的新型安全保卫干部。不要用老观念,认为安全保卫干部就是一介武夫, 不需要太多知识文化,而是要配备知识化、专业化的年轻干部,优化整合现有队伍,采取稳定骨干、引进人才、分流转岗等措施,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和整体工作水平。四是对招聘的保安人员培训要建立起常态化、制度化机制,极力提高保安队伍素质,在招标采购中,明确物防设施一定要到位,做到软硬件两手抓、两不误,这样才能保证安全保障工作不掉队,不拉学校发展的后腿。

总之,既然要把保卫处改为安全处,自然有其用意和深刻内涵,一定要适时适应形势变化要求,及时调整思想认识,树立大安全观念,转变工作职能,才能做好新时代高校安全保卫工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N].人民日报,2020-12-13(001).

[2] 田伟.众创时代下高校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祖国,2019(13):226-227.

[3] 王常宝.浅析学校安保工作与保安管理[J].魅力中国,2020(7):171-172.

[4] 陈泳鹏.基于高职院校“三防能力”系统性提升安保管理的思考[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28-130.

[5] 戴志强.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常态化思考[J].决策探索(中),2019,603(1):13-14.

[6] 何文,刘海宏,尹长源,等.湖南校园安全保卫工作对策研究[J].国际公关,2020(11):245-247.

(责任编辑:白 晔)

Thinking about the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the University Guarding Department to the Security Department

PAN Zhiguang

(Department of Security, Xiamen Ocean Vocational College, Xiamen, Fujian 361000)

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ing needs of the new situation, today ,many universities have changed the original campus guarding department into the security department and have redefined the new institutional functions, putting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But there are indeed many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security organization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universities and even the country, an indispensabl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he main func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campus governa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n escort to safeguard national stability,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fter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function of the security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undergone a major chan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In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it has gradually formed a new idea and new mechanism of "prevention,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service". Thu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on of universities from guarding function to security function has also emerged at the historic moment.

Key words: guarding department; security department; education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No.10 Vol.41, Oct., 2022

On the Aesthetic Culture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Jianzhan ····· LI Xiuxian, WANG Xiaodong(1)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olk Dance in Northern Fujian from th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 YAO Mingjun, PAN Shuxian(7)
The Third Allocation Drives th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 ZHANG Xian(12)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a Better Life ····· REN Jing(17)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Forest Health Research ····· LI Hongyun, WAN Quan, XU Hong, WANG Lanlan(23)
The Effect, Predicament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Sports Tourism in Sanming 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rest Health ····· ZHANG Lingge, MA Rongchao(3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Silenc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Employees in Selected Enterprises ····· LIN Sidi(36)
A Research on the Intertextual Strategies for COVID-19 Reports in Official Discourses ····· YANG Xin(41)
A Continued Study of Banning Qian Qianyi's Works by the Emperor Qianlong ····· WENG Hui(46)
The Epic of an Unorthodox Dynasty: The Choice of Narrative Center in Romance of Northern History ····· JIANG Kaijie(51)
How Does a Bogus Book Become a Classic: The Process of Shenzi Being Copied into SIBU CONGKAN ····· LI Yan(58)
Telling the Story of Yanzhao with Western Musical Instruments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piano version of Yanzhao Story ····· ZHANG Yating(65)
Discussion on the New Approaches of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s ····· CHEN Jianwei, LI Jiangneng(70)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College Liberal Arts Courses ····· CHEN Cuiwei(74)
The Applic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Bipartition Class
——Taking the course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s an example ····· ZHAO Hairong(80)
A Study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and Its Paths ····· ZHANG Jia(85)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s of College Students' Garbage Sorting Behavior ····· LI Yaxin, CHEN Ping(93)
The Practice and Effect of Establishing Bench-Marking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by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the General Party Branch of Institute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in 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 as an example ····· ZHENG Xueqin(100)
Thinking about the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the University Guarding Department to the Security Department ····· PAN Zhiguang(106)